

# 鳳凰週刊



## 非洲投資 「大躍進」

埃塞：中國模式非洲奇遇記  
蒙內鐵路：中國速度遭遇非洲民主

大陸政治捐款在澳引風波 | 境外NGO面臨監管嚴冬 | 大陸千萬丙肝患者獲藥受阻

康弘药业 KANGHONG PHARMACEUTICAL 贈閱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 更多资讯 更多阅读方式 尽在

## 鳳凰週刊

**新媒体**

New Media

### 微信

微信客户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搜索香港凤凰周刊  
添加我们的公共账号吧  
每天为您播报更多资讯



### 新浪微博

用新浪客户端  
扫描以下二维码  
赶紧 @ 凤凰周刊  
随时获取更多即时资讯



### 亚马逊电子书

扫描以下二维码  
即可购买凤凰周刊  
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  
获取更多资讯



### 官方网站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您可以无障碍在线浏览精华内容  
或在线订阅《凤凰周刊》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 2015 现正公开 征订

540元/每年 | 每月3期 全年36期 每期15元

订阅热线:【华南】0755-25934567(69)【华北】010-65281005(06)  
24H传真:【华南】0755-25934579【华北】010-65590266

- 【银行划款】 开户名称: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账号: 4000024819200010053  
开户行: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红宝支行(请将电汇单及客户资料传真至0755-25934579或010-65590266)
- 【邮局汇款】 ①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901室 收款人: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邮编: 518001  
②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06室 收款人: 《凤凰周刊》 邮编: 100005
- 【网上支付】 登陆网站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进入在线订阅平台支付

\* 杂志订阅不包括VIP网上阅读包月服务, 如需开通此项服务, 请登录官网付费开通  
\* 需要挂号邮寄的订户, 按邮局统一规定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54元, 全年108元  
\* 以上均以人民币计算

##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另有VIP网上包月服务| 每月20元)  
[www.ifengweekly.com](http://www.ifengweekly.com)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记者部主任 段文  
主笔 叶润洋 魏恭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主任记者 钟坚 李光 张弛 秦轩  
记者 湛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林子敬 曾鼎 赵新宇 李克难  
张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张一泽 马茹均 莫文辉 张宝荣

##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 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 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 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 邮编 518001  
电话 86-755-25934567(订约热线) / 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 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 100005  
电话 86-10-65281005/65281006(订约热线) / 65211745(办事处)  
Email: 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 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安徽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 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 200042 电话 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青岛易城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青岛市香港东路79号海金花园凤凰楼 电话 0532-88707398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 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 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边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 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 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 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 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 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层(邮编 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 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 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权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 00852-22008790 传真 0755-25934579



# 食品安全建设任重道远

□ 周兼明

今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引发大陆媒体热议的是对食品安全的强调。“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等提法，让饱受有毒有害食品侵害的民众看到了希望。

大陆食品安全问题这几年可谓天怒人怨。虽说这两年各地也开始建设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但由于遵循的目标、原则和标准不尽相同，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并不统一，已开始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信息内容和采集流程的混乱，不同地方和部门的系统之间无法实现信息与资源的交换与共享，有些地方甚至更像是为了应付社会与媒体的质疑而做的表面文章，等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食品安全的监测与实时监管。这大概也是今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信息平台的原因之一。

要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首先需要农业部门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起，共同制定出一套农产品信息追溯的采集与交换标准，在全国推广，逐步落实。

这个标准既要包括对农牧林副产品源头信息的采集，如种子或种苗来源、土壤或水源状况、栽培或养殖方法、到施肥农药、收获时间等信息，也要有包装、加工、运输、销售过程的信息采集。源头信息的真实性很重要，一旦某地出现严重污染，执法部门不仅可根据信息跟踪执法，市场也会自发检出并淘汰该地产品，有助于生产地形成良好的生产规范。当然，食品生产后续环节也同样重要，如今食品行业跨地采购极多，食品加工和运输者常为食品保鲜或美观添加大量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保证这个过程的信息真实，将有助于减少食品的不安全因素。

同时，要加快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相

关立法。

中国在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立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涉及食品追溯制度的法律。拿美国举例，2009年媒体曝出某品牌花生酱沙门氏菌污染事件后，震惊全美。此后，《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先后出台，美国的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由这几部法案获得了保证。而大陆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连“食品安全追溯”的字样都没有，正在修订的二审稿，也只明确了“国家建立食品全程追溯制度”，相关的实施细则与追溯体系、标准何时能推出，仍遥遥无期。没有相关的立法，只依靠国务院文件，变相抑制了食品追溯制度功能的发挥。

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只要发现对民众健康存在危害的信息，政府就可采取预警措施。这可以说是现代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步。西方国家的食品追溯与预警机制，采取的多是责任倒置的司法原则，只要发现某食品的成分或生产程序可能存在风险，即便在科学上未证明其实质性的危害，政府也要进行预警，直至当事人进行科学举证证明其产品无害，预警才可解除。

当然，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诸事都不简单。政府的政策出台了、系统开建了，农产品安全的问题并不能够马上得到解决——因为还有两个严峻的挑战，必须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消化和解决。

大陆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农产品生产者多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全国大市场的矛盾，是建立食品统一信息平台面临的最大挑战。信息采集难、安全防范难……要想统一规范生产—运输—销售这三个环节的信息采集标准，制定出统一的信息接口，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政府必须加大对食品追溯体系的科研与资金投入，以及

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将与此有关的专项资金纳入到农业补贴中，激发农产品生产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参与到体系建设中去；同时，多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不论管理体系还是相关的技术代码，都要做到全国统一、并能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样，大陆农产品的质量才能逐步提高，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拥有质量与安全保障。否则，最近曝出的山东蒜农2200吨大蒜因斑麻点超标，被韩国退回这类案例还会不断发生，大陆农产品终难取信国际市场。

农产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大陆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当农产品赖以维系的水源、土壤被严重污染后，资源的贫瘠、生态环境的破坏、病虫害的肆虐等，都加剧了农业生产者为求收成而对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依赖——而生态环境的治理不仅是最难的，也是最慢的，还是最根本的。这就需要政府在制定食品信息安全平台的时候，不停留在“标”的层面，还要针对“本”狠下工夫，既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必要的情况下，在土地和水源污染严重的地区，也要像沿海“休渔”那样，适度推出“休农”政策，给生态以恢复期。环境关过不去，其他都是海市蜃楼。

可见，食品安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任重道远，事关民生，不可不急；但因为牵涉范围太广，小到农户个体原子般信息的搜集整理，大到环境污染、治理生态、恢复平衡，无不需要长时间循序渐进，因此又不可太急，以免再入急功近利误区。尤其是，这还是一个民心工程，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无论是对有毒有害产品的宣传和抵制，还是加强对生产—运输—销售过程的法律意识与监督机制，乃至从价值观上形成健康重于金钱的共识，都需要每个公民积极参与进来，身体力行。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才有望真正得到解决。●





## 20 非洲投资“大跃进”

COVER  
STORY

“来晚了”的中国，正在非洲大陆掀起一轮投资、基建的“大跃进”，转移国内产能，建造全新非洲。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重建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红雲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 卷首语 Editorial

3 食品安全建设任重道远

###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  
阅读/军事】

###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22 非洲基建投资“大跃进”检讨  
28 蒙内铁路：当中国速度遭遇非洲民主  
34 埃塞：中国模式的非洲样本  
38 “中国标准”强攻非洲  
41 张霖：中国模式助力埃塞经济发展

###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4 北京职住失衡解析  
48 境外NGO面临监管严冬  
50 报告：农村进城女性从事性工作原因探析



50 ▲

### 报告：农村进城女性从事性工作原因探析

大陆首份由女性工作者团体做出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城后从事性工作的原因的一个全新视角。

52 中国加强多边援助再进一步

53 大陆政治捐款在澳引风波

### 台港澳 Taiwan Hong Kong & Macau

56 频繁空难重创台“空中巴士”

### 观察 Observer

58 全面深化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还不够

### 特别报道 Feature

60 大陆千万丙肝患者获药受阻  
64 美国FDA原法规审评督察官姚大林：  
中国应为短缺药品制定专门法规

### 国际 World

66 日东京大学“解禁”军事研究  
68 印度平民党重取新德里  
70 金砖国家：准备好应对多极化了吗？



## 军情 Defense

72 美智库为台“国防改革”支招

## 财经线 Business

74 大陆资本外流恐成“新常态”

76 中国重建外资法律体系

78 财经资讯

## 历史档案 History

79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殉难记

82 微史记

## 图谋天下 Galleries

84 她

## 文化 Arts & Culture

90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

93 中国外宣的困境与出路

——专访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主持人库恩

96 为什么必须取消高考加分?

99 邓力群去世

## 行走 Traveling

100 萨拉热窝：电影里的旧城

## 三地书 Books

103 余秀华是中国的什么人?

## 48

### 境外NGO面临 监管严冬

大陆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拟确立公安部门为登记机关，并加强对境外NGO资金来源及使用的管理。

## 56

### 频繁空难重创台“空中巴士”

2007年以前，岛内最便捷的南北交通方式是飞机，但高铁建成后，台湾岛内航班便成明日黄花，风光不再。



###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 传奇人生

90  
▲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 大陆千万丙肝患者获药受阻

60  
▲

只要新型丙肝药物能够在中国上市，千万丙肝患者就可不再受传统疗法副作用的折磨。然而，这道曙光却被大陆现行药品进口制度所阻挡。



## 广告目录

新媒体 / 封二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周刊征订 / 1 5X冬虫夏草 / 16、17  
芬迪 / 19 凤凰书 / 47 红云红河集团 / 53-57  
《凤凰周刊·生活》 / 81



MOMENT

# 瞬间

伊拉克 2015 / 02 / 01

伊拉克纳贾夫, 什叶派士兵进行野外训练。  
这些什叶派士兵加入伊拉克军队,  
为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做准备。





下杂志  
XIAZAZHI.COM





## 2014年中国慈善家 八成善款捐给海外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日前公布2014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即中国捐款最多的100个慈善家的名单。这100个慈善家总共捐出304亿元人民币。

304 亿元  
人民币

捐给大陆内地的慈善机构，  
以高校学术机构最受宠。  
大陆官方管理的机构，只获得1.18%的善款。



捐给大陆以外的地区，  
包括香港、澳门和外国机构。

NO.1



马云

169 亿元  
(以股值估算)

NO.2



蔡崇信

72.4 亿元

NO.3



何享健

4.25 亿元

数据来源：法广网 2月8日

1

路透社

2015/02/11

### 中美将就遣返中国外逃嫌犯举行磋商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称，中美高官将在8月举行会谈，磋商遣返携款潜逃美国的中国官员的可能性。中美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导致此事成为棘手问题，也使得其成为对中国外逃官员有吸引力的地方。中美两国官员1月在菲律宾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院负责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官员鲁纳表示，会谈后双方同意8月重返菲律宾在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内部进行更正式的磋商，届时美国代表团可能包括来自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鲁纳称，两国执法机构官员将就具体案例、联合调查嫌犯及赃款事宜进行磋商。

2

印度《经济时报》

2015/02/11

### 中国首次证实协助巴基斯坦建6核电站

中国官方首次确认，协助巴基斯坦建造了至少6座核电站，并可能会继续向巴基斯坦输出核反应堆。目前，中国正与数个国家洽谈输出核电设施。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日前表示，中国协助巴基斯坦建造的6座核电站发电量为340万千瓦。其中，两个300兆瓦和两个320兆瓦的核反应堆位于巴基斯坦的Chasma，另外两个1100兆瓦的核反应堆将在卡拉奇建造。印度和美国此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核电合作表达了隐忧，因为核供应国集团(NSG)并没有对此予以谴责。中国在加入NSG时，仅申报了协助巴基斯坦在Chasma建造的两个核电站。

## 资本主义的意外英雄： 激进投资者

•《经济学人》/ 2015.02.07

→ 上市公司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产物之一。IPO有助于创新，上市使公司面临各方审视，普通人也有机会投资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机器。但过去15年给上市公司蒙上了一层阴影，安然和雷曼兄弟的财富创造没有面临仔细审查。公司治理因被动式指数基金的繁荣而弱化，这意味着很多公司的最大股东如同软件程序。

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稍有危机迹象时便卖出股票，而不是解决问题，因此首席执行官们痴迷于季度盈利，竭尽所能地攫取薪酬和权力。私募股权大佬们称其集中所有权模式更有效。一些政府称，公司需要国家的坚定领导，但实际上存在一个更好的方式。激进投资者买入公司的小规模股份，他们行动起来如同一场政治运动，寻求赢得其他股东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提名董事会成员、削减成本、分拆、向股东返还现金。上市公司老板厌恶激进投资者，认为他们好斗，同时是机会主义者。但老板们错了，激进投资者事实上是公司难能可贵的拯救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激进投资者开始涌现，在美国的规模前所未有。他们运营的基金资本至少达到1000亿美元，2014年吸引了全部对冲基金流入的五分之一。去年他们针对上市公司发起了344场运动。过去五年，标普500成分股中半数公司的股票登记册上都有激进投资者的身影，七分之一的公司遭遇过激进投资者的攻击。与80年代不同，今日的激进投资者通常寻求改善董事会，而非觊觎公司资产。他们与其他股东协同，引入长期资本，进而扩大了投资视野。欧洲和亚洲投资者称他们不需要激进投资者，因为他们相比美国投资者在高管薪酬和任命上有更大权力。考虑到文化原因，数量不多的欧洲激进投资者在行事上更老练，更具咨询色彩。然而，上市公司本不该成为官僚机构，激进投资者的反叛将有助于给其注入新活力。



上市公司老板厌恶激进投资者，认为他们好斗，同时是机会主义者。但老板们错了，激进投资者事实上是公司难能可贵的拯救者。





## 在台外籍人士80万 外劳占近七成

● 中央社 / 2015.02.08

→ 台湾“内政部”统计指出, 2014年底在台湾外籍人士(不含大陆人士)计80.1万人, 82%来自东南亚国家; 持居留签证者66万人, 持停留及其他签证者14.1万人。与2013年底相较, 在台湾外籍人士增加7.6万人, 其中以持居留签证者增加6.8万人最多, 主要为外籍劳工增加。

进一步分析, 2014年底在台湾外籍人士以外籍劳工55.2万人占68.9%最多, 尚未归化取得“国籍”的外籍配偶4.3万人占5.3%次之, 两者合占在台湾外籍人士的七成四。

与2013年底比较, 外籍劳工人数增加6.2万人(12.8%), 其增加人数为产业外籍劳工占84.3%, 社福外籍劳工占15.7%; 在台湾尚未归化取得“国籍”的外籍配偶人数增加2000人。2014年底外籍劳工以印尼籍占41.6%、越南籍占27.3%及菲律宾籍占20.2%较多; 与2013年底相较, 以越南籍增加2.5万人、菲律宾籍增加2.3万人的变动较大。在台湾尚未归化取得“国籍”的外籍配偶以越南籍占36.6%最多, 泰国籍占14.6%次之, 与2013年底相较, 以越南籍减少最多。

## 港珠澳大桥2016年通车目标难达成

● 《星岛日报》/ 2015.02.11

→ 已动工5年的港珠澳大桥通车遥遥无期。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2月10日透露, 由于主桥的海底沉管工程出现“比飞船对接还要难”的情况, 分析了3个月还未能得出结果, 预计港珠澳大桥难以达到2016年底全部建成通车的目标。

李春洪表示, 港珠澳大桥的难度在于要在海底基床再往下挖45米, 沉放6.7公里、每个重达8万吨、总共33个的沉管。目前33个沉管才安放了14个, 原计划在去年10月安放第15个沉管, 但由于该位置

的泥沙淤积量和前14个完全不一样, 工作团队已经通过各种模拟、卫星分析, 以及气象潮汐分析, 甚至利用了超级计算机, 还是没有确定是哪些原因综合作用。

李春洪坦言, 港珠澳大桥要在原计划的2016年底全部建成通车, 困难“很大很大”。港珠澳大桥在2009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 受环评报告等影响, 香港段拖延至2011年12月正式动工。建成之后, 大桥全长5664米的海底隧道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

## 港比特币平台关闭吞30亿 疑涉传销骗局

● 《南华早报》, 节选 / 2015.02.09

→ 香港一个比特币支付平台近日突然关闭, 估计有近3000名投资者随时可能血本无归, 涉及金额或高达30亿港元。此事牵出疑为比特币传销骗局, 其中一名81岁的老妇, 耗尽300万身家, 损失了一百多万, 也有曾经在投行工作的人士和内地投资者中招。突然关闭的香港比特币交易平台名为Mycoin.hk。该平台声称, 投资者以大约40万购买比特币采矿合约, 每日赚取比特币, 约4个月可回本, 一年可额外赚取60万, 多名投资者被游说投资了过百万。但该平台近日突然关闭, 资金全部被冻结。

据港媒2月8日报道, 一批香港比特币投资者到访有关交易平台的办公室时, 发现已人去楼空, 疑涉及欺诈与层压式推销, 估计各“苦主”损失的总金额高达30亿。他们集体报警求助。立

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 早前收到近30名市民求助, 声称在氢能集团投资比特币时怀疑受骗, 部分人血本无归, 而这些投资者都没有签署过任何合约。Mycoin.hk是氢能集团旗下的比特币网上交易平台。

其中81岁陈姓老妇表示, 2014年6月, 有房地产经纪游说她, “日后如果一年满期你可以赚两间屋”。我问是什么屋, (她说) 鲷鱼涌的小房子, 二三百万那种”。结

果陈姓先后投资300万, 购买了7份比特币合约, 期间曾经套现180万, 尚有一百多万未能取回。

另一名“苦主”是从事过投资银行的刘小姐。她去年9月到律师楼买楼时被游说。刘小姐称, 自己对比特币有基本认识, 但当时律师楼文员(香港称为“师爷”)只讲解她能赚取多少花红, 没有解释投资计划详情。刘小姐称银行户口现金不足拒绝开户, 但之后“师爷”当晚就擅自用了刘小姐个人资料开户买了4份合约, 并向其家人索取支票, 涉及130万。

还有受害投资者来自内地。林小姐称经朋友介绍, 投资了一百

多万元人民币购买了4份合约, 至今只取回十多万, “这些比特币是可以提取出来, 没想过会陷入骗局。”据“苦主”介绍, 比特币平台的介绍人游说投资时, 提到涉及发展“下线”以缩短回本期, 怀疑其中涉及传销案。据受害人描述, 介绍人说, 向氢能集团旗下氢能云矿中心, 以90个比特币价钱租用云矿机一年, 以2014年比特币平均市值4400多元计算, 设份租机合约价值40万, 每份合约每天可以开采0.63到0.7个比特币, 大约4个多月就可以回本, 一年可以赚取近60万。

投资者可以将采得的比特币通过Mycoin.hk放售, 售价与市值挂钩, 或转账到其他网上比特币钱包, 或“钱滚钱”, 将采得的比特币转买新的采矿合约。介绍人会游说投资者自行或介绍他人购买多份采矿合约, 如主合约旗下有3份子合约, 其中2份“下线”子合约会向“上线”祝贺月, 分别提供20%和30%的花红, 回本期提早大约15天。







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

##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02.10

→ 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运动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运动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败甚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反腐败运动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之后也是如何预防腐败。总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反腐败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

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

“法制”则指的是一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法治”的前提。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

第二，反腐败不能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必须转化为制度建设。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收敛，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法不当，整个党政官僚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

抵制的方法。今天，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高层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反腐败由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对查处腐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做得不够。这使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些制度演变

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这次反腐败以来，呈现权力集中的趋势，即中央层面和省部级的反腐败由中纪委来负责。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符合国际经验，也已经显示出其高效率来。不过，从制度建设的情况看，重点仍然在新制度的设置，而不是旧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两点是必须考量的。第一，光做减法不会有太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增加甚至强化“外部多元主义”，设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和公众来参与反腐败。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外部反腐败，就很难真正有效和实现可持续性。（郑永年）



## 中国多地建红军小学

• 法新社，节选 / 2015.02.09

→ 身着与毛泽东的部队衣着一致的短上衣和腰带的孩子们唱道：“我们是新一代红军小战士，前进的步伐无比坚定！”

身着天蓝色军装的他们像是中国国共内战时期的共产党员。但实际上这些少年是一场教化心灵的现代运动的对象，教室就是其“战场”。北川红军小学的校歌是与革命史一同教授的。

自2007年起，全国各地建起了近150所红军小学——出资人是中国革命年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四川省北川县高低起伏的山丘在上世纪30年代曾庇护过躲避国民党对手的共产党人，如今则回响着学生们的歌声：“红星闪闪……我们要让祖国更加强盛。”

随着学生冲向教室，原本紧凑的队形散开，化作喧嚣的海洋。

唐近平（音）老师边操控一块电子白板边说：“看看这张红军过草地的图片。”他问自己照管的孩子：“你觉得老一辈和毛爷爷怎么样？”一名12岁的学生像游击队战士一样迅速举起手。这个男孩说：“我觉得红军很伟大。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这些学校建在“革命老区”，这些地方曾是共产党起义的摇篮，但现在往往仍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这项工程并不直属于解放军，但其网站上说，工程的目标一是“改善”这些地区“落后的教育条件”，一是“传承红军精神”。该网站说：“当前‘一切向钱看’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树立革命理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还说，红军小学“对于宣传我们党的历史，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

中国近些年来再次加大了意



识形态教育的力度。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呼吁小学，甚至幼儿园重新开始关注历史教育。中国19世纪被欧洲列强部分占领的历史——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会有以《不能遗忘的屈辱》为题的一章。40年代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努力也是课程的核心内容，而共产党当政被描述为富国强国的一段时期。美国塞顿霍尔大学的专家汪铮说：“这场运动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告诉大家，是共产党

救的中国。”

北川县农村的人均收入只有每月540元左右，这促使大部分孩子的父母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中去挣更高的工资。学校负责人李桂兰（音）说，2012年成为红军小学为这所小学带来了教育补助，包括20万元的额外资金和教师工资上涨。寄宿学校的生活并不只讲纪律，学生们说他们的爱好包括踢足球和看漫画。但他们的历史观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 在华美企感觉不受欢迎 须适应“新常态”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5.02.11

→ 在中国政府对外国企业发动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调查之际，2月11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称，大多数在美国的企业感到自己被当局“盯上了”。调查发现，有57%的受访企业相信，外国企业在中国反价格操纵、反垄断和反腐败运动中正被特别挑出来加以惩处。有65%的企业表示，担心这样的运动会对本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几乎一半的在华美国企业（47%）表示它们感觉自己在华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高于去年

的44%。

对美国在华企业来说，2014年是近些年来在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方面最具挑战的一年。超过30%的企业没有制定在2015年扩大投资的计划——这一比例是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最高的。但中国美国商会商业环境调查统计出的这些数字只道出了部分真实情况。其中有些数字与其说与经济问题有关，不如说与中国推行困难重重但十分必要的经济模式转型有关。随着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该国政府试图

引导经济增长及预期下调至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常态”。中国美国商会一半会员认为，主要机遇在于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国内消费的增加。从事服务业的会员对在华经商环境的看法要积极乐观得多。

因此，虽然新投资计划与过去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但美国企业正在充分利用在华经商的机会。如今1/3会员在华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通过在当地设计、研发或量身订制产品及服务来实现的。至于研发密集型产业或较传统的资源和工业等行业，有近一半企业已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中国的改革议程尚未实现全部愿景，但已取得进展。比如

说，86%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报告说，过去5年来，知识产权执行情况有所改善。中国当局承诺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表达了他们的意图。最近公布了一项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草案，虽说并不特别具有雄心，但还是为加大开放力度奠定了基础。一项高质量、“负面清单”上受限行业较少的条约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利用好外国的资本和专长，还会降低在华经商的复杂程度。确保达成这项条约并不比推行中国的改革议程容易，但美国企业准备予以支持，并打算从中国经济继续转型中获益。





## 世界已不能再依赖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节选 / 2015.02.10

→ 有一个全球经济学家期待总是落空的预测，

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刺激对策。随着经济减速迹象不断加强，市场一直能听到期盼经济刺激对策的声音，但中国却并未采取大规模对策。非但如此，中国领导层将增长放缓称为“新常态”，对经济减速采取了容忍姿态。中国领导层一直表示这是力争经济结构由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因此对投资扩大持慎重态度。那么，原因果真如此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4%，降至2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等地有观点认为政府将出台经济刺激对策。中国明显面临通货紧缩压力，但目前并未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在经济增长率出炉的第2天，1月21日官方媒体转载了一篇评论文章，提出警告表示不应要求增长加速和数量的扩大，同时表示经济运营的重点并非经济刺激政策，而在于质

量和效率的提高。评论认为，随着服务产业的增长，新增就业人数也已充分扩大。笔者认为可以把这篇文章定位为反映中国领导层经济判断的评论。

在看到这些理由之后，感觉令人信服，但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难以理解的问题。为了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就必须淘汰以往效率低下的产业。而为了缓解失业率提高等改革的阵痛，财政刺激政策就将不可或缺。成为打击腐败对象的煤炭产地山西省以及国有企业众多的黑龙江省的增长率被认为低于7.4%。为了缓解通货紧缩压力，或许还需要灵活的货币宽松政策。

要理解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刺激对策持慎重态度的背景，英国渣打银行的报告或许能成为参考。该银行的研究部门每年都公布各主要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这个指标指的是，政府、企业和家庭收支的债务合计相当于GDP的比

例。截至2013年6月底，日本达到409%，最为突出，另一方面，中国则高达208%。而到2014年6月底，中国迅速提高至251%，正在逼近美国和英国的水平。

2008年底中国的这一比率仅为147%，但是最近6年却迅猛提高。实际上可以说该比率迅猛膨胀是2008年之后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中国政府提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被认为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渡过了全球经济低迷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丸红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铃木贵元认为：“中国一直进行在并不增加中央政府债务的情况下完成经济刺激政策”。

重视财政健全性的中央政府不愿扩大财政赤字，并未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从银行贷款，不断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4万亿元项目财源的一半以上实际上都是借款。此外地方政府通过旗下的融资平台持续增加借款。2013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从2010年的11万亿元左右膨胀至约18万亿元。

如果银行收紧融资，融资平

台和开发公司就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公司债，自行从民间筹集资金，从而导致影子银行急剧膨胀。雷曼危机后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企业的债务猛增，而不是政府。表面上看中国政府的债务余额在GDP中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雷曼危机之后也没有大幅上升。不少经济学家表示，即使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比例也仅为60%-90%。

与日本的230%相比，中国的财政似乎十分健全，但如果加上企业的债务余额，情况则截然不同。大肆举债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旗下的融资平台。上述公司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寻求中央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救助。实际上，2003年银行处理不良债权时，中国政府就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金。

如果考虑到这些被“转移”的债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GDP的200%。这一数字甚至高于希腊的175%。虽然领导层闭口不言，但是已经意识到庞大的债务余额。由于认识到债务继续膨胀极为危险，因此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免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似乎更接近事实真相。

受中国经济减速影响，石油、煤炭和铁矿石等资源价格下跌，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市场的经济也出现恶化。甚至有观点认为可能出现以中国为开端的全球性需求不足，引发类似1930年代那样的全球恐慌。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呼吁中国实施与经济规模相符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呼声可能日益增强。但中国的真实想法或许是：“雷曼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如果再不计后果地实施经济刺激，崩溃的将是我们”。

世界已经不能再依赖中国。  
(村山宏)



## 中国老龄化吸引投资者涌入

• 路透社 / 2015.02.11

→ 面对中国几亿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投资者蜂拥进入中国蓬勃发展的医疗保健业，推动该行业并购交易规模超过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行业。随着中国去年放松外资入股限制，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速，TPG资本等私募股权公司，以及马来西亚IHH Healthcare Bhd等医疗保健业者纷纷投资中国的医院、制药公司和医用设备制造企业。

2030年时中国65岁或以上人口预计达2.23亿，如此前景对这些企业充满了吸引力，尽管也有显而易见的风险：医院基础设施落后、估值升高以及医生匮乏。这些企业已经开始调整与本地合作伙伴的关系，以招募到医生；并推动加快获得当地许可证，以开始实施原定项目。中国已经预计，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未来

五年民间部门、国有企业和消费者的医疗保健支出将增长两倍，至8万亿(兆)元人民币。

“我七成的时间都用在物色中国医疗行业交易，”位于香港的私募股权公司松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汪国兴称，“这真的是中国一个热门领域，可与移动互联网比肩。”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经过数年的稳定成长，中国医疗行业并购规模增长逾一倍，2014年达到创纪录的185亿美元。单是今年1月，并购规模就达69亿美元，并购活动加速预示着今年又是风光无限的一年。涉及中国电子商务、互联网软件、服务和基建的并购交易在2014年同样创下纪录，但179亿美元的总额不及医疗业。

中国2009年开始放开医疗业，但直到2014年才允许外资独



资医院，并进一步放松药品价格管制，出台规定加快医疗设备的审批进程。这种乐观情绪已经推动一些公司的估值稳步升高。中国最大私营医院集团凤凰医疗在2013年12月香港上市时，预估市盈率为25.1倍，现在股价市盈率约为35倍。

对于潜在投资者而言，其他风险包括医生人力不足以及医院执照审批流程冗长。“是否能招聘到医生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当你研究医院和医疗供应行业情况时，”咨询公司Bain &

Co合伙人Vikram Kapur表示。

“因此，需要管理的风险就是，要确保民间医疗机构能招聘到足够的医生。”

TPG、黑石集团和中国制药商复星医药均已投资入股中国的医院、医疗设备制造商以及医疗服务企业。“我们对中国持非常正面的看法，特别是医疗行业，”高盛首席中国策略师Kinger Lau表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医疗行业改革的概念从投资角度而言非常有吸引力。”

## 在华外籍员工来少去多：中国变贵欧美复苏

• 《华尔街日报》 / 2015.02.09

→ 优移物流公司每年帮助全球逾26万家庭迁往异国他乡工作。据该公司消费者数据显示，2014年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是前往中国的外国人的两倍。该公司称，人员流出现象可能与劳务合同到期挂钩。外国人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2年到3年。但也有其他原因：生活成本上升、回归总部的渴望，以及可怕的污染。就连北京市长都说北京目前“不能称之为宜居”。

该公司说，造成这股趋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风向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率创下2009年

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跨国公司销售业绩下滑，迫使部分企业重新考虑在华经营策略。

随着中国制造业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公司放弃中国，把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地方，例如马来西亚和越南。优移物流公司亚太区总经理史蒂夫·刘易斯说：

“我们接了很多从中国迁往马来西亚的订单，因为一些人选择在那里从事研发和制造工作。”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经济复苏是吸引外国人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据刘易斯介绍，优移物流公司的绝大部分客户(93%)是跨国公

司员工，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向该公司咨询搬迁服务。

尽管该公司的报告并未提及缘于强势反腐运动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经营受阻等因素，但一些最近已离开和很快就要离开的外国人来说，这些确实是影响他们作出离开决定的因素。

对于离开中国内地的人来说，西方目的地占主导地位。美国排名第一，其次是德国、新加坡和法国。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亦是进入排名前十位的亚洲地区，分别排在第六和第十。2014年从美国移居中国的人数比前一年减少22%。据该公司数据显示，今年是连续第二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人多于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华美国人的数量下降。尽管美国的管理人员和其他跨国公司员工离开了中国，但最近有大量年轻工人涌入中国，其中许多人并未使用物流服务，因此优移物流公司的数据无法反映这部分人的情况。

除美国外，对中国内地输出人员最多的几个经济体是中国香港、荷兰和新加坡。这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业员工，包括银行业、酒店业和制药业。离开香港的企业员工同样也比前往香港的要多，但金融、法律和酒店业仍在向该地区派遣管理人员。然而，去年前往日本的人是离开日本的人的两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与前一年持平。





## 未来机器人将“占领”东亚制造业

•《金融时报》/ 2015.02.10

→ 一项新研究显示，未来几年，机器人将取代自动化和电子产品等行业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表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去年增长23%，到2018年将翻一番，这将令很多制造业领域发生彻底变革。

尽管机器人在工业中的使用已有几十年时间，但最近科技的进

步降低了机器人成本并提升了其性能，此际新一代可再编程的多用途机器人正投入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价格一直在稳步下降，过去4年已累计下跌14%左右，至13.3万美元，同时性能一直在提升。一些机器人的价格甚至更低：Rethink Robotics的Baxter机器人基础定价为2.5万美元，让那些可能很难投资于之前几代机器人的较小公司

也能买得起。预计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5国将占到未来10年工业机器人投资的80%左右。

先进的机器人旨在降低成本并提升生产率，从而减少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同时提高现有员工所需的技能水准。它们还可能会在制造商做出投资目的地决定时，让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不那么重要。BCG估计，去年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20万台左右，高于2013年的16.3万台，到2017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升至40万台。

在最容易实现自动化的制造

业(包括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电脑、电子产品和电器设备)，约85%的工作可能会由机器人完成。未来几十年，这些行业使用的机器人可能会最多，但化工和金属等其他行业使用这种更为新颖灵活的机器的做法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情况将会因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薪资成本以及劳动力监管规定——这些规定可能会限制雇主用机器人取代员工的能力。BCG预测，韩国、泰国和台湾地区将是最快使用机器人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拥有大量能够实现高度自动化的行业，劳动力成本高于一些低薪资竞争国家，而且就业保护有限(就业保护将阻止裁员)。

预计其他使用工业机器人相对迅速的国家将是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BCG称，最慢接纳新一代机器人的国家可能是那些欧洲监管较严的经济体，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还有巴西和印度。

## 尽管生活方式发生巨变 人类进化仍未停止

• 英国《独立报》/ 2015.02.07

→ 尽管现代化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医学科技以及丰富多彩的饮食已经让大多数现代人不用在生死线上挣扎，也不用担心被大自然淘汰掉，有研究表明，人类进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科学家指出，250年前工业革命初始至今，西方世界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家庭规模的缩水并没有阻止达尔文进化理论影响人类基因库。

研究人员对18世纪初芬兰七

个教区的1万名居民的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记录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尽管经历了文化巨变，人类进化仍在继续。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伊丽莎白·博隆德说：“我们仍在进化。只要有些人生的孩子多，有些人生的孩子少，就有进化的可能。只要人类在繁殖后代方面有差别，生育成功率就有差别，而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仍在起作用。”

有科学家认为，农业、医疗科学以及现代化科技的发展已使得大部分人类可免受物竞天择、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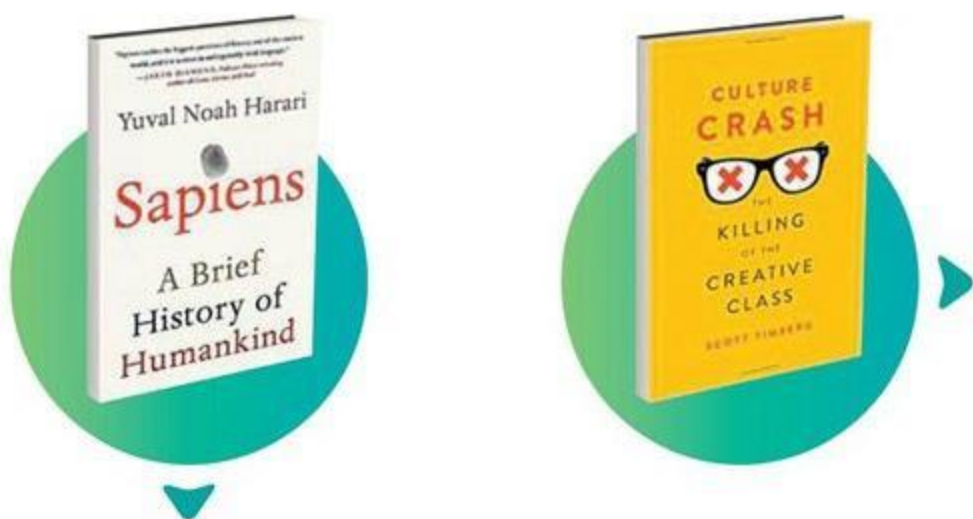
者生存的生死考验。以芬兰人为例，19世纪60年代出生的婴儿中，约有2/3能够活到成年，而到了上世纪40年代，这一比例大幅增加，约有94%的婴儿能够活到成年。同时期，由于避孕措施等文化因素的介入，芬兰人的生育率从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5个孩子降到了1.6个。

不过，博隆德和她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以及芬兰图尔库大学的同事发现，社会文化影响并非全部，基因遗传的影响虽只是一小部分但却相当重要。研究人员发现，在个体寿命、家庭规模、生育首胎和末胎子女的岁数差异中，有4%-18%是受到基因影响的。博隆德说：“这很令人兴奋，

因为如果基因会对个体差异产生这样的影响，那么就意味着它们自身也会根据自然选择而发生改变。”她说：“然而我们清楚，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我们对这些复杂特性的遗传基础及其在进化中不断演变的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人员在《进化》杂志发表的论文指出，实际上就现代社会而言，基因对一个人的成家时间、所建立家庭的最终规模的影响要比18和19世纪大。科学家说，由于人类通过不同个体的基因差异来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做出反应，因此可以说，现代人或许仍在进化。





## 《智人：人类简史》讲述人类如何征服世界

•《华尔街日报》，节选 / 2015.02.06

→ 人类学家告诉大家，人类在几万年前有了语言。说出的第一句话大概是很实用的话，比如“狮子冲过来了！”或者“你的头发着火了！”但不久之后就说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从此以后，智人，这个自恋狂群体，就一直在思考他们的历程。

尤瓦尔·诺厄·哈拉里的《智人：人类简史》用这个书名提示人们，很久以前，世界有好几个人种，其中只有智人存活至今。哈拉里说，我们这个人种可以追溯至连续不断的三场革命：认知革命（我们变得聪明）、农业革命（让大自然为我所用）和科学革命（我们变得强大而危险）。哈拉里预见，人类将目睹又一个划时代事件。我们将在几个世纪后消失，要么因为我们获得了神明般的力量，变得难以认出，要么因为我们对环境管理不善而自我毁灭。

智人在20多万年前出现。“认知革命”一词反映了许多人类学家都持有的一个观点，即在那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种只是在东非游荡觅食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群体。哈拉里说，然后，“从大约7万年前开始，智人开始做非常特殊的事情”。在这场如贾里德·戴蒙德所说的“大跃进”中，我们的祖先突然克服了惰性，走出非洲，并发明船只、战斧和美妙的艺术。发生了什么？哈拉里认为，一个尚未发现的“知识突变树”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内部连线”，使我们得以“利用一种全新的语言交流”，一种使人类能够在群体内合作的全新语言。突变后，人类在地球各处迅猛发展。

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哈拉里的笼统概述散布着一些错误并不令人惊讶。《智人：人类简史》知识丰富、发人深思、表述清晰。但它对农业革命的看法无疑是有问题的。

人们对这场革命已经了解很多，农业改变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生态学家说，得益于农业，这个行业现在吸取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初级生产力。哈拉里认为，这个观点不好。农业增加了食物供给，但繁荣的结果不是幸福，而是“人口爆炸和骄奢的精英”。农耕者比四处觅食者更加辛苦地

劳作，但饮食和健康却要糟糕。哈拉里认为，“农业革命是历史最大的骗局”。

但这是真的吗？进行农耕的易洛魁人的境况要比在他们北部四处觅食的人种糟糕很多吗？在讨论人类学家中早就存在的有关最早期的采集狩猎者生活在“和平的天堂”还是“异常残酷暴力”的环境下的争论时，哈拉里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来自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贫乏数据不足以刺穿笼罩人们最遥远祖先的“沉默帷幕”。

据《智人：人类简史》说，哥伦布与新大陆的接触是一个转折点，是“科学革命的基础事件”。发现古人所未知的大陆不仅教会欧洲人重视当前的观察而非过去的传统，而且征服美洲的渴望迫使欧洲人快速探寻新知识。欧洲的探险者——征服者是新鲜事物、“罗马人、蒙古人和阿兹特克人贪婪地征服新大陆，为的是寻找权力和财富而不是知识。与此相反，欧洲帝国主义者前往遥远的海岸，希望获得新知识外加新领土。”

## 互联网“杀死”创意产业

•《洛杉矶时报》网站 / 2015.02.11

→ “在过去10年出现了一场反精英的、愤怒的市场民粹主义和企业整合的完美风暴，同时伴随着大学中传统人文学科的崩塌，甚至文化被厨房味道所取代。”斯科特·廷伯格认为，美国的创意阶层即将被当今的“胜者为王”经济所毁。他来自音乐、出版、报纸、电影和建筑业等各方面的实证支持自己的论点，并在新书《文化碰撞：消灭创意阶层》中警告说，艺术经济——我们当中那些靠发明以及引领理念和文化为生的人——正在“消融”。

廷伯格解释说，从音乐家到小说家，到图书编辑到音像店的店员，再到建筑设计师，我们整个创意阶层都处在危机之中。不过他承认，可能仍有一些轰动一时的艺术家在赚大钱，但绝大多数创意者在苦苦挣扎。廷伯格写道，我们的文化碰撞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互联网，它令知识工作者为计算机所取代。

作为一名记者，廷伯格尤其清楚报业的崩溃。他说，随着过去10年“几万个”工作岗位的丧失，报业“自己把自己屠杀了”。他解释说，问题在于，互联网存在一个尖锐的商业模式问题，在线广告的收入无法聘用高素质的记者。他警告说，结果就是广告和采编之间的“政教分离墙”倒塌，出现一个新的腐败博客主阶层和一群越来越无知的公众。但杀死创意阶层的不只是技术。他警告说，当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很可能更沉迷于他们消费的咖啡豆和散养鸡来自哪里，而不是诗人W·H·奥登、歌手鲍勃·迪伦和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



今天,冬虫夏草的多重应用价值已被现代科学证实。西方学者研究揭示,冬虫夏草是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宝库,价值珍贵。诸多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冬虫夏草价值的认识惊人的一致!

## 纵观冬虫夏草吃法的进化, 有两个重大发展趋势:

一是从配伍吃到单独吃。随着对冬虫夏草阴阳同补、自成天然大复方这一独到特点研究与认识的深入,发现其独特功效来自于已知与未知的上千种成分自成体系的协同与相互作用,天然的精妙配方,任何添加都可能是多余的。

二是从高温加热吃到直接生吃。加热超过 60 度,冬虫夏草中的活性酶类、真菌多糖等会被破坏,功效明显下降。常温生服,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追求:多吸收,好吸收!

执著于它的宝贵价值,人们孜孜求索,渐行渐近… …



## 冬虫夏草低效利用阶段的五大误区

### 1、小钢磨打粉吃 (错误指数: ★★★★★)

小钢磨打粉无法打破冬虫夏草的细胞结构,将蕴含在细胞内的精华释放,因而达不到期望的明显提升服用效果的目的,简易设备制粉时的高温还会造成精华的流失与破坏,降低功效。

现场打粉未清洁不灭菌、泥沙残留、重金属超标,吃了有极大健康隐患,打粉后也极易发霉、变质、失效!

### 2、每天几根泡水嚼着吃 (错误指数: ★★★☆☆)

不卫生,危害大。致病细菌、霉菌、寄生虫(卵)杀不死。难洗净,泥沙残留、重金属超标!泡水喝、嚼碎吃,人体能够吸收的精华成分很有限,要想真正吃得有效,每天几根的量远远不够!

《中国药典》的建议服用量为3-9克,3克相当于10根以上中等大小的原草。

### 3、每天三、五根炖着吃 (错误指数: ★★★☆☆)

加热会破坏冬虫夏草的多种重要精华成分,比如,冬虫夏草中的一种具有抗肿瘤作用的酸性非限制性内切酶,在80℃下加热15分钟就会彻底失去活性;具有免疫调节和抗肿瘤作用的虫草多糖成分,在大分子情况下才有作用,加热和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都会使多糖水解,分子变小,其作用下降甚至消失。

而且,根据药典和专家的建议,每天三、五根的量是远远不够的。量不够,吃了也难以获得期望的效果!

### 4、洗洗直接吃 (错误指数: ★★★★★)

不密封的脏虫草,未经深度清洁灭菌,绝对不能常温生服!

冬虫夏草表面的“脏东西”与体表粘性极强的菌膜紧紧附着,而且虫体的皱褶内也隐藏粘附着大量“脏东西”。即使刷洗也很难洗净,致病细菌、霉菌、寄生虫(卵)难去除,泥沙残留、重金属超标。浸泡刷洗超过3分钟,部分精华成分将损失50%以上,效果降低。

### 5、虫草发霉,处理一下继续吃 (错误指数: ★★★★★)

无药效,易致癌!

霉变物质的毒性强烈,简单加热或酒精处理去不掉,洗洗、晒晒更不可能消除。

研究表明,霉变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是强致癌剂,毒性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而且,需要280℃以上的高温才能被破坏。



# 冬虫夏草·现在开始含着吃



草是草

区离粉碎增溶技术



双层片



虫是虫



## 极草 5X 冬虫夏草纯粉片

1. 区离粉碎增溶技术，针对虫和草物质结构的不同，运用区离粉碎增溶技术，实现均匀破膜破壁，使虫和草分别达到精华充分溶出区间，虫破膜，草破壁，冬虫草精华成分释放提升至少7倍。

发明专利 ZL200710048651.8 冬虫草粉碎方法及制剂

2. 纯粉多维成型技术，无任何添加，按虫和草的天然比例制成纯粉双层片。特别利于含着吃，部分精华通过口腔黏膜毛细血管直接吸收，实现口、咽、胃肠多部位的高效利用。

发明专利 ZL200810303308.8 冬虫草微粉片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承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极草产品上市至今五年多，未接到一例赔偿申请，未发生一起赔付案件。青海春天郑重向消费者承诺：极草·5X 冬虫草均由 100% 冬虫草制成，如有不实，假一赔百。

全国尊享专线：400-888-9991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冬虫草有什么用，怎么用，用多少等信息，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极草官方微信







## 克里米亚事件后 中乌舰船合同遭搁置

●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 / 2015.02.09

→ 俄中就建造12322型“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达成协议。该项目本来是中国和乌克兰的，登陆舰由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大海”造船厂建造。但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中合同就被搁置。有消息人士透露：“与过去的合同一样，

克里米亚企业将在中国建造登陆舰。只是之前操作此事的是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如今则变成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

2014年春天之前，中乌“欧洲野牛”合同可谓一波三折。问题在于乌克兰没有独立建造和出售该舰的许可证，其知识产权属于俄

罗斯。本世纪初，乌俄曾缔结三方合约，向希腊供应4艘“欧洲野牛”，由乌俄分别制造。但当中国也对该舰表现出兴趣后，基辅赶忙背着俄罗斯向中方提供产品。

《莫斯科防务简报》主编、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介绍说：“我们与中国就供应‘欧洲野牛’谈判了许久。但俄罗斯很强势，试图让中方以应有的价格大批量购买。于是中国转向乌克兰，并以低廉得多的价格与后者签约，规定两艘登陆舰从乌购买，两艘在中国建造。”

2009年传出了北京与基辅达成协议的消息，这令俄方大为光火。首先，俄罗斯金刚石中央设计局是登陆舰的研发单位和知识产权所有者。其次，最糟糕的是，乌克兰不仅对华低价出售盗版产品，还答应转让设计资料。到去年春天，乌当局向中方交付了两艘登陆舰，而且第二艘是赶在克里米亚举行独立公投前交付的——基辅认为莫斯科会阻挠发货，因此加紧了

合同的履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中合同无法像过去那样履行，何况还有位于基辅控制地区的企业参与供应。

克里米亚工业政策部部长安德烈·斯克伦尼克去年11月宣布，中国拖欠克里米亚企业造船费，是因为乌政府也索要这笔款项而无法支付。“中方拖欠‘大海’造船厂第二艘‘欧洲野牛’的建造费约1120万美元，拖欠为项目提供自动化系统的辛菲罗波尔市‘费奥连特’机械制造厂约260万美元。中国准备支付，但在俄中乌三方谈判中很难达成妥协。”

卡申指出：“形势要求重新敲定合同，这次俄罗斯让中方同意了哪些条件对外保密，但我希望会有进一步合作的意向。”有俄方专家表示：“无论如何，乌克兰已经给俄造成损失，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显然，我们只能从中方获得剩余资金，现在将按新条款帮他们造船。此外我认为，中方有意购买更多登陆舰。”

## 日本经援扩至支援外国军队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5.02.11

→ 日本安倍内阁2月10日通过名为“开发合作大纲”的对外经援方针，重点是今后对外援助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允许向外国军队提供物资与技术支持。这是日本战后实施对外“经援”政策以来，首次扩大到军事范畴。舆论认为，这个转变是要配合首相安倍的“和平积极主义”战略主张。这一转变也显示，经济能力大不如前的日本必须以其他形式来丰富其外援内容，以继续发挥对外影响力。

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ODA)计划从1955年开始实施，

目的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计划的一贯操作方式是只提供经济资金，排除一切与军事有关的项目。新大纲列明“允许向他国军队提供民生用途与灾害救援等非军事领域物资；对军队的援助项目可按照其意义作个别探讨”。其中没有提到“非军事领域”具体指什么，只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例表示“支援对象必须具备与日本等同的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新大纲舍弃了只援助经济弱国的原则，认定“符合日本战略范畴的他国都为支援对象”。

在这同时，新大纲列明了许多“利己”原则，说明“日本将基于安全以及经济增长两大目的，对外积极作出贡献”。它阐明经援必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重视有日本企业和地方产业的参与。这是日本第三次修订对外经援方针，之前两次是在1992年和2003年。安倍上台之后在2013年发布“国家安保政策”时，就表明必须对对外经援进行“改革”。他当时说：“要具战略思维地活用对外经援，从而配合放宽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武器三原则。”

日本舆论认为，此次修改是为了配合安倍在对外政策上提出的“和平积极主义”战略主张。

《朝日新闻》指出，出炉的新经援大纲虽言明了是“非军事”领

域，但条文内增添“对外国军队进行援助”，就是对以前明白禁止的军援作了“解禁”，与他之前松绑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同出一辙。该报道指出，允许向他国军队提供物资以及技术，很难确保受惠国家最终不会将这些援助转用在军事上。

《日本经济新闻》引述一名日本外交官员的话说：“能在经援配套内纳入军事物资，是对外扩大影响的有力手段。在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下，可通过安保合作强化与各国的关系国。”报道称，执政党感到焦虑的是，经济停滞使得日本经援预算大减，早已远落在中国之后。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 FENDI



下杂志  
XIAZAZHI.COM

产品垂询热线: 8621-53859078



# 非洲投资“大跃进”

“来晚了”的中国，正在非洲大陆掀起一轮投资、基建的“大跃进”，转移国内产能，建造全新非洲。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重建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得失值得关注，规则亟待重建

## 中国非洲基建投资“大跃进”检讨

记者/漆菲（发自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2015年2月1日，有“非洲屋脊”之称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迎来历史性时刻——全国第一条城市轻轨终于成功试运行。位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南郊的卡力提环岛车站被围观的当地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利亚姆身着米黄色西服、顶着东非高原特有的烈日，率领1200名社会各界人士试乘了轻轨列车。

“能在我这个年纪看到轻轨线路的启动，即将到来的时代真是不敢想象，让我们觉得仿佛置身于新世界。”来自当地的老人安亚乐说。

这个“新世界”不仅针对非洲而言，对大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如此——轻轨项目既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承建的第一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也是中国大陆企业第一次对外输出轨道运营管理技术及服务。

相比对非洲有着殖民历史和深刻影响的西方国家，“来晚了”的中国，正试图借由向国外进行产能转移的经济推手，在非洲大陆掀起一轮基建项目“大跃进”的浪潮。但由于参与基建项目的中资企业多为“国字号”，所以常被西方指责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遭到不利对待，也被指责在国外运营时沿袭国内做派，陈旧的运营理念和模式导致水土不服、不可持续。这其中的经济账究竟是得是失，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律和规则，都是中国基建在“走出去”过程中亟须厘清的问题。

### 中国援非另辟新径

在中国开始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1995

年，中非贸易的绝对值还微不足道。但短短20年间，中国一路追赶，先在2004年超过英国和德国，又在2006年将法国甩在身后，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以至于在两年后，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赞比亚发表演讲时警告说，“一种‘新殖民主义’正在威胁非洲大陆”。

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明显加快。2004年至2013年，中国对非投资从10亿美元增至245亿美元。

所有投资类型中，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蕴含着发展，也是发展的催化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称，“1992年到2011年，中国把GDP的8.5%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增长了7倍，投资基础设施的智慧显而易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4年访问非洲期间，在一次演讲中暗示“中国只会搞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给予了态度鲜明的回应：“非洲要发展，你不搞基础设施建设行吗？日本为什么不帮非洲搞基础设施建设呢？”

卢沙野的反问直指发达国家如今甚少投资非洲基建的现实。“传统发达国家大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欧洲还有多少人懂得修铁路呢？”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说，“欧美等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差距太大，非洲的今天是中国的昨天，而中国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黄认为，欧美国家援助非洲成效不彰的原因有二：一是发展阶段有落差，二是他们认为建设基础设施应当以

私营企业为主。

与此相比，中国则尝试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中国在东非投入的几大基建项目为例，其使用的资金八成以上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将商业与援助相结合。

这种有别于过去纯援助的方式，以从日本学到的体制为基础：大规模提供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

这其中一个重要案例是学界所称的“安哥拉模式”——中国为安哥拉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以石油为担保商业贷款。“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具有很好的可持续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唐晓阳说。

这正是中国官方强调的所谓“双赢”。在西方国家不断减少关于基建和工程类项目的直接援助时，中国填补了这个空白，也为大兴建设潮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机会。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开支将从2013年的700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1800亿美元。

如今，非洲已然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尤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国资委网站“央企海外拓展”的材料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国企在非洲41个国家承接实施各类大型项目近400个，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91个，交通类项目121个，承建公路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承建铁路总里程近7500公里，还包括16个大型港口码头以及十余个国家的机场建设。





德勤管理咨询公司的调查发现,截至2013年,中国在东非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比例已超过欧美国家。

作为非洲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东非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道路等级低且损毁严重,现有铁路大多年代久远、运营维护较差,导致物流成本高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2006年以来,中国在该区域投入的大型基建项目是非洲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埃塞俄比亚(11项)、坦桑尼亚(16项)、肯尼亚(4项)和乌干达(4项)。

之所以有如此大力度的投入,外界公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与该区域国家政府高层关系良好,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一直属于传统友好国家,与肯尼亚的经贸关系也不断加深;二来这些大型基建项目动辄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中国强有力的优惠贷款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三是中国企业进驻较早,比如中交集团1998年就进入埃塞俄比亚,很多企业通过采用长期合

作、滚动发展的方式形成了良性态势。

### “第一”的项目更易融资

尽管尚未开通,中国人建造的轻轨已经成了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人生活的一部分。白天,一群小商贩坐在水泥墩子上兜售商品;入夜,乞丐们索性把裸露的轨道当做自己的临时居所。为了更显“高大上”,穿过梅斯克广场(Meskel Square)的轻轨否决了中国的地下方案,改成了高架桥。来自中国的第一辆轻轨列车就静静地停在高架桥上,车头挂着中式的大红花。这也成了当地的“景点”,一些年轻的新人特意披着婚纱,在高架桥上以列车为背景拍照。

只有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轻轨的施工让本来就拥挤的市区变得更加堵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堵车极为普遍,以至于这里的天空在用车高峰期被分为三种颜色——最上面仍是醉人的湛蓝,往下由土黄色渐变到灰黑色。日本二手汽车和本地破旧

▶ 2015年2月1日,埃塞俄比亚1200名社会各界人士试乘轻轨列车。

的Blue Donkey(蓝色小巴)是马路上最常见的车辆。中国企业使用的大部分是进口越野车,以适应这里颠簸不平的路况。

对于2015年5月即将迎来大选的埃塞俄比亚来说,轻轨的通车将无疑会为执政党的胜算增加重要的筹码。对中国而言,这次合作也具有更深层的含义。“目前除了南非、埃及,埃塞的轻轨项目是非洲第三条、东非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因此从中国国内的融资审批来说,更情愿推动这样的项目,因为作为‘第一’,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标准走出去。”一位常驻埃塞的国企人士如此表示。

2014年5月5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了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目。炎炎烈日下,李克强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一起沿着斜坡步行400米攀上10米高的高架桥。看到中、埃双方员工正在铺轨作业,李





克强走过去蹲下身子，与海尔马利亚姆及埃塞当地工人一起拿起扳手，拧紧螺丝。

这一举动至今仍被项目承包方——中国中铁二局的年轻工程师们津津乐道，“我们当时在旁边，总理的举动完全是自发的，感觉很温馨。”

而就在五年前的2009年，中铁二局的某位副经理来追踪该项目时，还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个地方建什么城轨，用毛驴拉就行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埃塞政府的坚持下，对方当年就与中方签订了合同，也让该项目成为中国中铁第一个大型走出去、全面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和成套机电设备的工程。

作为成套工程，轻轨项目涉及变电所、输电设施、通讯等各个方面，也集合了深圳地铁、北车集团（没合并之前）、华为和卡斯柯等国内知名企业的加盟。这其中，深圳地铁于去年12月2日签下了轻轨运营维护管理

服务合同，被认为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式首次成功走出国门。

考察轻轨项目时，李克强说，要与非洲共享铁路建设经验，分享中国成熟技术，做好对非洲当地员工的培训，带动更多当地就业。

据了解，一期项目在建设期间，中方共雇用当地员工约1.3万人次，与中国员工相比为25:1。当地人对铁路知识了解很少，项目第一阶段就为埃塞政府培养了27名高层次管理人才（半年在西南交通大学，半年在中铁二院，全英文授课）；第二阶段从2014年4月开始，有202名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的员工在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15年1月中旬结业。这是中国职业院校首次为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开展职工技术培训。

因为投入巨大，轻轨项目成了“活广告”。在修建期间先后有二十多个非洲国家

▶ 2014年5月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利亚姆（左一）共同安装并扭紧了埃塞轻轨无砟轨道试验区第一颗螺栓。

的政府代表参观了轻轨项目，并表达了在本国修建轻轨的意愿。

根据中埃两国企业签订的轻轨运营维护管理服务协议，中国公司将为埃塞建立专业的轨道交通运作体系，并对埃方人员进行技术、管理培训，过程里中方人员逐步退出，到第四年末由埃方逐步接管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最终确保埃方拥有一支完备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具备独立运营轻轨交通的能力。

在埃塞俄比亚，拥有“第一”头衔的“中国制造”不仅仅是轻轨项目。2014年5月8日，埃塞有史以来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铁路（当地人称作大铁路，区别于轻轨）也开始铺轨。铁路全长740公里、时速120公里，总投资达40亿美



元。这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在距离埃塞首都不远的阿达玛市，目前已经竣工投产的阿达玛一期风电项目则是中国第一个技术、标准、管理、设备整体走出去的风电项目，此前主要为亚的斯亚贝巴新落成的非盟会议中心供应电力。如今的二期风电项目引入了新的风力发电技术，建立了风电建设技术和电力入网检验标准，有效带动了中国风电制造产能的转移。

## 投资非洲是得是失？

2014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结束访问中东欧后，外界总结称，基础设施走出去、产能对接、金融支撑成为其2014年外访“收官战”的关键词。

按照官方的解释，2009年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下产生的过剩产能是中国当前的大问题，转移这些过剩产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动力之一。的确，中国需要市场和资源，非洲国家需要技术和资金。但背后，强大的政治意愿之下，“国字号”的企业大举进军非洲市场也引发诸多质疑，比如中方提供的贷款能否收回，国企又该如何规避陈旧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运营方式等。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驻国际机构官员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由于中国与非洲高层“过于良好”的关系，很多贷款最后也有可能免单。每年中国召开中非论坛时，都会宣布免除一部分贷款。“中国一味给钱，非洲国家一味拿钱，似乎双方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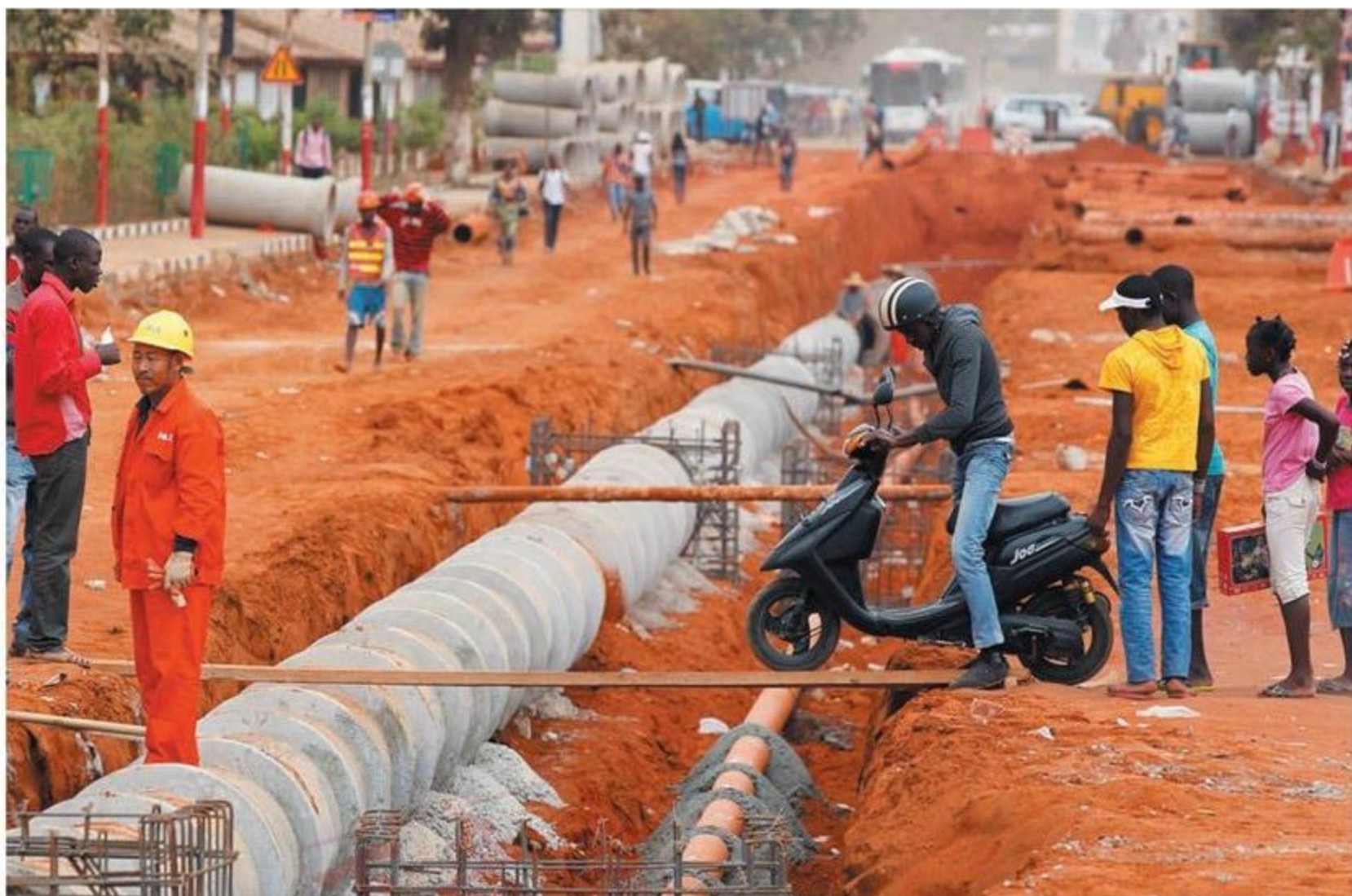
但中国是否真的“明知山有虎，偏向

由于参与基建项目的中资企业多为“国字号”，所以常被西方指责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遭到不利对待，也被指责在国外运营时沿袭国内做派，陈旧的运营理念和模式导致水土不服、不可持续。

## 央企在东部非洲和非洲之角区域国家承担的主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虎山行”呢?按照一位商务部人士的解释,“如果算一算经济账,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基建项目走出去,实际上是把刺激内需通过另一种形式来完成。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总得找个由头弄出去,最终是中国政府花钱买了中国企业的产品。”

在众多国企承包的非洲基建项目中,“中国制造”的成分多得超乎想象。上述商务部人士打了一个比方,“你家要盖房子,银行贷给你一百块,七十块买了原材料,建造者挣了二十块,最后剩十块。你家就是非洲各国,银行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无论是原材料提供者还是建筑方都是中国企业。”

美国著名非洲问题学者黛博拉在其专著《龙的礼物》中也介绍道,“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的业务指南表明,出口商或承包商应为中国企业,贷款项目的投入应从中国采购。即使官方对此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不低于50%’。”

对于是否会亏本,中铁二局轻轨项目总工程师罗兴财回应称,“即使埃塞方面付不成款,也有其他方式来偿还,比如用置换的方式给我们一块土地来经营,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房地产开发来赚一点钱。实际上,中国当年引进外资也是这个方法。”

对此,美国前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非洲问题高级国际顾问惠特尼·施耐德曼(Witney W. Schneidman)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中国目前投资非洲的模式本质上还是“附加条件的援助”,类似美国20世纪初期的政策,但“这会给非洲带来巨大的必须偿还的外债。同时,中国劳工可能会挤走非洲人的就业。一些非洲政府也对从中国购买的服务和货物质量感到担忧。”

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这些信贷并非没有风险,债务可持续性成为一大隐患。近几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纷纷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据信用评级公司

2012年8月27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正试图通过木板穿越中国公司的建筑工地。

穆迪发布的一份报告,2012年非洲国家共计发行了约81亿美元的债券。埃塞俄比亚财政部也于2014年在欧洲发行了10亿美元10年期的债券。

“现在埃塞政府频频在海外发债,将来还贷压力会非常大,我们也担心过几年其支付能力会不足。”中国驻埃塞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张霖不无担忧地告诉本刊记者。但他也表示,“埃塞方面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因此正利用外力提高其出口额,并且大力开发国内资源。但能走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投资环境的改善情况”。

### 中企投资非洲亟待重建规则

“基建项目和简单的工程承包不同,一大特点是投资巨大、收益周期长。从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只有中国政府性质



的银行或者国企能一下子拿出大手笔的资金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研究员黎文涛说，这是中国与国际公司竞争时的一大优势，也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公司利用这一优势在非洲攻城略地。在肯尼亚，尽管这里曾是英国殖民地，但目前更为人所知的是：印度人已经被挤走了，中国和日本正在竞争这里的市场，不过中国现在更胜一筹。2014年8月，《非洲商业日报》一篇题为《中国打败日本，成为肯尼亚第一外国融资者》的文章表示，中国连续3年向肯尼亚提供每年增长30%的贷款数额，不加上去年签署的38亿美元的蒙内铁路项目，肯尼亚政府还欠中国将近10亿美元。而日本在2011年之后开始缩减对肯尼亚的贷款数额。目前肯尼亚外国融资者的排序为：中国、日本、葡萄牙、德国、美国。

多位谙熟当地情况的华人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更胜一筹”的背后实则是“这里的市场已经被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搅乱了”。据悉，由于中国国企在此的承建或援建项目都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或国家开发银行出钱，因而诸多工程项目，并不像私营企业一样对利润精打细算，通常的手法是，“不论赚不赚钱，先占住一块市场再说”。一位国企老总也向记者直言，“国有企业的通病就在于，钱不是它的。做大做强、有热点新闻、占领市场都是政绩，至于是否能挣钱是另外一回事。”

2014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领导的“非洲发展小组”也在一份报告中，对中国国有企业“获利属自己，损失归国家”的做法提出了措辞谨慎的批评。

“由中国政府作为后盾在国际市场上抢项目的做法，令西方国家非常反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表示，在目前西方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样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已经开始不再接受此类由中国政府大手笔出钱、中国国企承建的项目。



近年来关于中企在非洲恶性竞争的丑闻频频曝出，甚至从单纯的个别企业之争升级扩大为贸易、电力、交通基建等各领域的全方位战争。海外国企也不得不开始反思问题的严重性。中铁二局的一位员工向记者表示，现在中铁的高层也呼吁不要采取排他性、垄断式的合作，应该要利益共享。

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银行埃塞国家局局长陈广哲告诉《凤凰周刊》，“中国企业有时候竞争太激烈，所以会做一些大家合作的方式，我们叫做‘伪标’，就是大家商量好了，你们来投这个，我来投这个，其他投资人只是作为一个陪衬。这个当然也谈不上是公平竞争了。”

“要找到解决非洲基础建设问题的办法，源头上是要解决融资问题。”黄剑辉指出，中国具备促进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有效投融资机制。因此他提出，可借助苏州工业园的模式，组建一个联合管委会。以埃塞为例，黄剑辉建议成立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有中资和

地方企业，外国公司也可以入股。对方如果没钱，可以用土地或者资源入股。剩下的资源可以授权这个公司来开发。除去抵押给中方的资源，减去开采成本和合理的利润，剩下的钱归埃塞所有，这笔钱就可以用于支付中国基建项目的开支。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应该从市场着眼，而不应以政治因素为主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指出，中企海外投资行为现在亟须规范，符合市场规律的游戏规则亟待建立。卢沙野也公开呼吁海外中企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规范。

科菲·安南甚至在报告中警告说，如果中国企业之间继续相互内斗，如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继续不规范，未来潜在的内斗和外部干扰风险会更大。“而且，中国企业的商业风险很容易演变成国家风险。一旦当地反华情绪高涨，会对中国在外员工和财产造成危害。”

(本刊记者王衍，实习生王璠、邓哲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 解码蒙内铁路 当中国速度遭遇非洲民主

记者/王衍(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蒙巴萨、察沃)



**冬**季的非洲热带,肯尼亚正值旱季,炎热干燥,红土飞扬。当地时间1月19日中午,几架直升机飞过,惊醒了草原上的狮子、大象、长颈鹿、羚羊等正在午休的动物。

察沃国家公园旁边的路段,近千名黑色和黄色面孔在此围等,肯尼亚和中国两国国旗等待升空。如此隆重的仪式,是为了迎接直升机上的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出现,不过不是等待总统来看动物,而是等其视察一段崭新的铁轨。

这是肯尼亚历史上首次出现1.435米宽的铁轨。这条宽阔的新铁轨旁,是英国人于百年前修建的1米宽的米轨铁路,如今已陈旧破败、杂草丛生。此番情景令观者对一个世纪前后中、西方在非洲的角色转换而不胜唏嘘。

这条长达485千米的新铁路,连接肯尼亚最大港口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是中国目前正为东非多个国家修建的“东非铁路网”的开端;也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援非的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起点。由于耗资与工程量巨大,该铁路建设的一举一动都颇受国际舆论关注。

不过,与上世纪60年代不同,蒙内铁路修建的背景已不再是纯政治需求主导下的全额赠送,而是承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商业浪潮,以及中国试图摆脱西方一些人所称的“新殖民主义”,进而推广自身影响力的尝试。

对于正在浩浩荡荡地走进非洲市场的一批批中国企业来说,有能力建造大型交通运输基建工程的,无疑是中国国企。这些国企所代表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模式,正与

有着英国殖民传统的非洲式民主生态,发生着种种激烈而有趣的碰撞。

### 备受期待的政绩铁路

虽然在蒙内铁路的中间点——察沃路段的500米铁路已经成功铺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铁路即将开通,而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实物样本。

“总统只是来看一看,以后这段铁轨是拆掉重建还是保留,还不清楚。”为了这个迎接仪式,该路段的中方员工们忙活了大半个月。

肯尼亚现任总统肯雅塔是该国1963年建国以来的第四任总统,在多党共同执政的政治生态中,他保有罕见的强势作风和政治魄力。2014年12月,他曾卸下总统一职,以个人身份亲赴国际刑事法庭(ICC),应诉后者对其反人类罪的指控,并成功胜诉,引发一片赞誉。

据说肯雅塔本人非常重视这条铁路,每3个月就会召集全国各个相关部门以及中方副总理级别以上的负责人聚在一起,专门讨论解决这条铁路面临的问题。先看实物样本的要求就是总统本人提出的。

素有“东非领头羊”之称的肯尼亚,地处东非沿海,是整个东非海陆空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其印度洋畔的蒙巴萨港的货运量年年高升,2014年达到2400万吨——所有运往肯尼亚、乌干达、南北苏丹、卢旺达、刚果(金)、布隆迪等东非国家的物资,都要经由蒙巴萨港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蒙内铁路建成之后将成为最主要的运输路径,也因此被誉为整个东非铁路网的“咽喉要道”。

此前,这条“咽喉要道”依靠的是百年前英国人在此修建的米轨(即指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轨距),尽管当年该铁路竣工时的剪彩照片和纪念物,仍在首都内罗毕一家铁路博物馆内收藏展览,但这条米轨本身正渐渐被遗忘——如果现在问当地人如何从蒙巴萨前往内罗毕,答案往往只有两个选项:8小时的长途汽车和不到1小时的小型飞机。

由于米轨铁路严重老化、故障不断,且时速过慢(仅有30公里/时)、运货量少等原因,近十年来该铁路已经难以达到肯尼亚以及东非各国对物资的运输需求。

现今更多的物资是通过大型集装箱汽车运输,穿梭于蒙巴萨港至内罗毕之间的109国道,运输成本较高,且该国道仅有2个车道,整日交通拥堵、负载累累,甚至经常出现大型货车翻车事故。

从肯尼亚目前的城市面貌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里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但是近年来,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GDP增长速度保持6%左右,甚至超过非洲最先进的国家南非。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肯尼亚亟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早在5年前,肯尼亚政府就有了新建蒙内铁路的设想。

“竞标这条铁路的外国公司很多,但是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偏好中国。”据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介绍,国际刑事法庭控告肯尼亚总统一案,一度令肯雅塔在西方媒体上饱受批评,“这也会影响外国公司对蒙内铁路的投资,但是中国人似乎不太在乎这些。”





供图 中文集团

2014年9月，这条铁路已经正式开工，全线分为9个标段，20多个建筑营地，多个路段同时动工。新华社的消息称，蒙内铁路未来将使肯尼亚GDP增长达到8%。

其中地处整条铁路中间点的察沃路段，为最早动工的施工点。在该路段现场，标有“中国”字样的建筑营地、大型挖土机、卡车排列有序，多个段列的钢轨各就各位。如果不是一群黑人劳工在地基上拿着铁锹在工作，很难让人辨认出这是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在中国。

截至2015年1月下旬，该铁路开工短短5个月，动物成群的草原上就出现了一段崭新的500米铁路。这在当地人眼中，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如这一小段样本的建设速度一样，整条铁路的完工进程一再提速。据了解，该铁路原计划工期5年，但由于肯尼亚将在2017年迎来下一届总统大选，所以总统本人希望能尽快完成这项政绩工程——到时

候自己能坐在新火车上，为争取连任而沿路拉选票。为此，整个工程需要在3年内提前完工。

中国官方也同样非常重视蒙内铁路。2014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问非洲之际，与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等东非4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贷款协议，该耗资38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其中90%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贷款，而肯尼亚也将设立专门的海关税种基金进行还税担保。2015年1月中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肯尼亚时，也对该项目的落实表示关切。

在中、肯双方官方的高规格关注下，承建方中交集团被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要打造“百年精品工程”。

尽管有双方政府的支持，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执行中仍面对重重阻力。不过，阻力并非来自肯尼亚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源于相对之下似乎过于“超前”的民主制度。

► 2013年11月28日，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副总统威廉·卢托、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部长迈克尔·卡马乌以及来自乌干达、卢旺达、南苏丹的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光源、中国交建董事长刘起涛共同出席蒙内铁路开工仪式。

## 征地持久战

“Are you the land owner?”（“你是土地所有人吗？”）

“What do you want? A job? Food? Or money?”（你想要什么？工作？食物？还是钱？）

“OK, I promise to give everything you want, just sign this contract.”（没问题，我保证你想要的一切都能给你，把这个合同签了。）

“Tomorrow I will give the things you want, now let us do first. Ok?”（明天我就给你，现在先让我们开工，好吧？）

这是中企员工顾连清为处理征地问题而专门梳理的一套英语对话。

“征地”是蒙内铁路首先面对的难题之一。虽然肯尼亚的城市面貌会让人回想





蒙内铁路效果图

起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迫切的需求，但在这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不会看到像中国那样在大街小巷画满“拆”字的场景，也不会听到和强拆有关的新闻故事。

哪怕此项目得到总统的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地方会绝对服从中央的行政命令。肯尼亚各郡（相当于中国各省）郡长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并非总统任命。因此，对于当地郡的土地征用，总统并没有直接管辖权——这就意味着上级的行政命令无效，地方官员更在乎地方上的意见。

Kwale郡的各村村长、地方议员、警察局长、郡长会像电视上英国下议院充分辩论的形式一样，就该路段的就业、安全及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讨论；郡长也格外在意当地村民是否支持其决议。

根据中肯双方签订的合同，蒙内铁路沿线所征用的土地，均由当地政府进行征地赔偿和解决。但现实中，肯尼亚政府正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样，面对财政短缺的窘境，以至于大部分征地补偿费用无法落实到当地居民手中。

为了更快地推动铁路动工，有时中方企业不得不介入其中。但在无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越性的肯尼亚，中方企业为铁路沿线争取每一块土地，都可谓是一场战役；由于征地将伴随整条铁路工程的建设，因此“战役”可以说是旷日持久。

由于征地问题的牵绊，自去年9月以来，全线480千米的9个路段，仅有3个路段开始施工，除位于中间点的察沃路段因地处察沃公园鲜有居民，已经成功铺轨外，铁路两头

的内罗毕南部市区路段和蒙巴萨港口路段推进艰难。就在《凤凰周刊》记者沿途采访的一周之内，就发生多起征地纠纷。

在内罗毕南部市区路段，数十名黑人村民涌入铁路施工现场，站成人墙，阻碍施工正常进行。“当地村民认为我们与政府勾结，借修建铁路为由，破坏他们的土地财产。”中方员工黄鑫在接到现场同事的电话后，一脸无辜。

在蒙巴萨港口路段，为了尽快推动施工，标段工作人员则亲自上阵。一名正在施工营地工作的不具名中方员工回忆说，中国当年新闻上曝出的应对“钉子户”的极端案例，是在赔偿价格难以谈拢的情况下，趁户主不在家时先强行拆毁其房屋，在户主无奈之下进行谈价。但在肯尼亚，却“不可能这么干。毕竟国企代表着中国形象。”





肯尼亚中 国书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下，“温柔而简单”的解决方法，最后就只剩下一个——花钱。于是，就有了前面那段“标准对话”。顾连清说，这一套应对在大部分情况都能奏效，“毕竟他们太贫穷。”

但例外仍然存在，最著名的当属“遗产屋之战”。从内罗毕出发向蒙巴萨方向，开车1小时，即到达一座建筑风格特殊的遗产屋，其所有者是半世纪以前到肯尼亚定居的美国人阿蓝（Alan Donovan）。现年70岁的他用大半生时间游历非洲各国，收集各种非洲艺术品，珍藏于此，供世界各地游客参观，故名“遗产屋”。

在他世外桃源般的院子里便可以看到英国人建造的米轨铁路，以及草原上奔跑的各种动物。按照蒙内铁路的设计路线，铁路需要穿过遗产屋。阿蓝自2014年初就接

到了中方企业想要征地的要求。

然而，“遗产屋之战”的困难程度超过中方企业的想象。自2014年2月至8月，肯尼亚各大媒体对阿蓝的遗产屋进行了报道，诸如《在关门前去看看遗产屋》《营救遗产屋》等标题铺天盖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阿蓝介绍其遗产屋为肯尼亚国家遗产项目地，其所有艺术品已捐给美国一所大学进行非洲文化研究。除使用媒体曝光战术外，阿蓝还对征地赔偿提出了“天价”。

由于难以承受社会舆论压力，中方最终以修改路线而告败。

尽管中方企业正在使尽浑身解数，但让他们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自己经常被“牵连”成为被告。2014年11月中旬，据当地《商业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宣布叫停了一段铁路的建设；一位名叫Musimba的土地所有者因为没有接到征地通知和赔偿，将国土局和肯尼亚铁路局告上法庭，在一审中，国土局败诉，因而部分铁路建设暂停。由于中方是铁路施工方，也被作为第三被告，应诉法庭。此案一直悬而未决。

尽管中交集团已经在肯尼亚打拼30年之久，但对当地法律环境仍显得十分不适应，在记者采访期间，多位上级领导除对此表达无奈外，并不愿意多谈官司细节，态度保守，即使明白只是受牵连，也尽量回避，好像“作被告始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但这在肯尼亚很正常。这是一个不论大事小事都习惯上法庭去解决、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可能成为被告的法治国家。”一位名为詹姆斯的当地黑人司机笑着解释说，当地法庭可算是最为忙碌的官僚机构，每天从早到晚，排队等待案件审理的人络绎不绝。

**中方企业为动物们想出的方法是，建设动物通道供其穿梭，不过由于要考虑到长颈鹿的特殊高度，多个通道需要建设到7米以上。**

## 硬啃环保骨头

已经铺轨成功的察沃地段，有着当地著名的察沃国家公园。狮子、大象、斑马、羚羊、长颈鹿、水牛、鸵鸟、狐獴、野猪，还有许多即使是非洲人都不太熟悉的动物，它们的生存、繁衍、迁徙以及生态系都需要考虑在内，成为摆在施工中企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就像在十年前中国建设青藏铁路时需要考虑照顾藏羚羊一样，中方企业为动物们想出的方法，就是建设动物通道，供其穿梭；不同的是，由于要考虑长颈鹿的特殊高度，多个通道需要建设到7米以上。目前，建设动物通道的设想已经获得了当地环保部门和察沃国家公园的认可。

肯尼亚虽然落后，但当地人眼中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令中国人意外。作为可观看动物大迁徙的旅游胜地，肯尼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闻名全球：其宪法规定，享有健康的环境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以健康环境支持经济发展并实现减贫”的愿景，也明确写入了肯尼亚国家2030年远景规划。

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便将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机构之一。2014年6月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也在此召开。

肯尼亚环境与矿产资源部环境秘书艾丽斯·考迪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正是由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肯尼亚这个非洲国家中，无论是政策制定者、民间社团还是普通大众，都对环保充满热情”。

“在肯尼亚，做建筑工程要是得罪了环保局，那就玩完了。”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口段的肖明对此印象深刻。自去年5月份该铁路贷款协议签署之后，沿线就开始选址建设施工营地。“无论沙、土、草、树，工程需要动任何自然植被，都要事无巨细地先向环保局申请，施工前后还需要其来审批。这项程序没法绕行。”为此，在近半年时间



里,仅蒙巴萨港口标段就已经与环保局来回打交道数次。

2015年1月,蒙巴萨港口围海造田建设码头铁路段的“红树林项目”终于通过环保局审批。

位于印度洋岸的蒙巴萨港,历史悠久,海景优美。据历史资料记载,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曾途经此地;而如今,但凡去过的中国游客,都对那里蓝天碧海和金色沙滩赞叹不已。

在港口泊位旁边,一大片红树林扎根海滩,长势繁茂,是热带地区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然而,按照蒙内铁路的设计,为了更便捷地将海运来的物资直接运上铁路,该红树林所在区域需要被填海造田,铺上铁轨。

工程师季公奋指着围海造田的图纸,在介绍完未来的施工方案后,起身指向那片红树林,无奈地说,“从递交申请,到环保局反复开评审会这个过程就花了半年时间。”最后,在中方答应修建完铁路后将重新复植红树林,才通过环保局的审批。

不过据透露,蒙内铁路的中方施工人员其实尚不清楚如何复植红树林,但是“得先答应环保局再说,毕竟工期压在这里。”

对于不熟悉当地环保法规、甚至连英语沟通都成问题的中方员工来说,要经常和这样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并不容易。为此,中国企业专门聘请了当地的环保咨询公司负责与环保局对接。

黑人小伙乔治(George Bagwasi)是非洲废品与环境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常驻察沃标段营地,负责这一标段的环评工作。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图文并茂、装订精美的报告,犹如一本研究生毕业论文。这份不久前刚刚完成的长达一百多页的英文环境评估报告,详细说明了察沃路段建设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在诸多中方员工眼中,“这套所谓的民主程序走得像模像样。”

### 三万黑人劳工怎么管?

工地现场,英语不好的中方管理人员

## 在无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越性的肯尼亚,离开“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高效率”,中方企业为铁路沿线争取每一块土地,都可谓是一场战役

只能用手比划着,对着手拿铁锹的黑人劳工喊“You, You, You; Go, Go, Go.”(“你,你,你;去,去,去。”)或者干脆将中、英文混合起来说:“You go to Dakeng.”(“你去大坑。”)“人家能听懂什么是大坑么?”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说法让描述这一场景的中方员工都替黑人朋友感到费解。

铁路沿线营地的黑人员工不在少数,仅在察沃标段的施工现场就有近百名。据中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雇佣了两千多名黑人员工。中方承诺建造蒙内铁路要征用三万肯尼亚当地劳工。想象一下,如果这三万名黑人劳工沿铁轨一字排开,将有一万米长。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在海外项目中使用当地劳工的最大规模。

但这很难说是中方企业的主动选择。中、肯双方在该铁路建设前后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反复协商,最终确定聘用中、肯劳工比例为1:10。而根据中方估算,在建设高峰阶段,需要3000名中国工人,也就意味着需要雇佣三万肯方员工。

梳理当地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这源于当地促进就业的迫切要求。肯尼亚的人口总数超过4000万,人口结构年轻化,但失业率却高达40%。即使是在首都内罗毕,也不时可见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躺在街边的草坪上晒太阳。《凤凰周刊》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注意到,只要有华人聚集,就时不时有年轻黑人前来搭讪,打听找工作事宜。如该铁路项目招聘更多的当地劳工,则可为当地疏解就业压力。

尽管有知情人士透露,最终很可能只是聘用当地劳工三万“人次”,而非三万人,

但如何管理如此众多的黑人劳工,对中方企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人力资源管理离不开沟通这项基本要素。但这对于中方管理人员来说,并不容易。肯尼亚的官方语言是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在这里只要上过小学的人就懂英语,所以肯尼亚大部分当地人都懂英语,这为国际化交流降低了不少门槛。

这个门槛,对于中方企业的上层领导并不难,但是对很多在工程现场指挥管理的中方员工来说,还是不好跨越。尽管也有部分中方员工已经开始学习当地斯瓦希里语,但显然只是凤毛麟角。

在工地现场和营地,除黑人司机外,很少看见其他黑人员工与中方员工交流。而每当记者上前用英语采访营地黑人劳工时,他们便立刻从“沉默的大多数”瞬间展现出黑人的天性,变得活跃而侃侃而谈。

除了性格热情洋溢外,当地黑人的另一大特征是追求眼下的快乐。一个典型例子是,当地人不怎么有存钱的习惯,大多数情况下是拿到工资就消费。

面对这样迥异的价值观和消费习惯,中方雇主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只能实行按小时付费。当地《劳工法》对劳工的工作时间和权益有着翔实的要求,工作日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按1.5倍结算,节假日加班则为2-3倍工资。受到英国殖民历史影响,当地大部分劳工也有着很强的法律维权意识,像民工跳楼讨薪这样的新闻则极少出现。

就蒙内铁路目前的建设来说,语言障碍和工作效率所产生的管理问题,还是后话。“眼前最大的压力其实是解决就业与难以寻找到合格员工之间的矛盾。”蒙巴萨港口路段的施工营地中,负责劳工事宜的乔森(Jackson Kamau)坦言,“黑人劳工应聘最多的职位是司机,但是机械手、测量人员、工程师、普通工人这些岗位才是更加迫切需要的。几个月面试下来,很少有人符合标准。”

按照铁路沿线各个城镇的要求,每个路



段都必须尽量使用该城镇的员工。从整体情况来看,由于肯尼亚在过去一百年中从未修过铁路,上述多个工种在当地并不存在;即使存在相对优秀的人才,也往往集中在首都内罗毕和蒙巴萨港口这两个最大的城市,而中间沿线多为不及中国三线城市发展水平的普通乡镇,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受教育程度底下,即使愿意花钱也招不到合适的人选。

为了让更多的当地人了解招聘信息,中方还专门在肯尼亚第二大媒体《标准报》上发了一整版招聘广告。尽管前来应聘者络绎不绝,但是结果仍不理想。

## 新必修课: 应对媒体

2014年12月8日,《凤凰周刊》记者到访中交集团内罗毕办公室,巧遇到一位熊姓领导从黑人雇员手中接过一摞当天的报纸。报纸上,黑人雇员已经将涉及蒙内铁路的报道圈注出来,平均每份报纸都有两篇报道。“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征地问题,报道比较多。”浏览与蒙内铁路相关的当地新闻,是该领导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与中国人口大规模进入互联网时代不同,在大部分人手持诺基亚手机的肯尼亚,当地影响力最大的媒介还是报纸。

尽管一穷二白,肯尼亚新闻自由开放,不仅当地媒体活跃,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媒体都聚集于此。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CNN、BBC以及来自中国的新华社、CCTV、《中国日报》也相继在内罗毕开设了分支机构。

由于蒙内铁路项目对当地影响巨大,蒙内铁路常被推向各大国际媒体的镁光灯前,竞标建设、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工征用,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习惯于将媒体视为宣传工具、报喜不报忧的中方企业,面对如此复杂的媒体生态,更多的时候感到无所适从。

去年8月,中国“海运5000名工人修建蒙内铁路”的消息在各大国际主流媒体和当地媒体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使得中方企业身陷被动。“这个消息加深了当地人对西方所鼓吹的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印

## 肯尼亚蒙内铁路施工路线图

项目位于肯尼亚境内,主线全长480km,是连接东非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标轨铁路。铁路起点蒙巴萨市位于肯尼亚东南沿海的蒙巴萨岛,蒙巴萨岛濒临印度洋西侧,是东非最大的港口之一;

终点内罗毕是肯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部非洲重要的交通枢纽,线路途径 Voi、Mtito Andei、Sultan Hamud 等重要经济据点及 Tsavo 国家公园。



象,好像中国人不给当地带来福祉,只是一味来占施工名额。”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方员工解释说,“但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5000这个数字到底从何而来。”

“这项目这么久了,只有这一小块报道,说了点好话。”蒙内铁路内罗毕总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陈思嘉指着前不久的一张报纸的一角说。陈思嘉说,之前中方企业也曾主动向当地媒体发布信息:“我们曾经邀请当地媒体们参加项目展览会或者展销会,希望它们对此进行宣传报道,但是几乎没什么媒体感兴趣。”

仔细翻阅当地的报纸便能发现,刊登严肃新闻的只有《国家日报》(National Daily)和《标准报》(The Standard)两个,前者类似于《人民日报》,而后者则多进行西方式的批评报道。不过,与中国媒体有着较大差别的是,当地媒体的运营模式皆为商业化运营。浏览当地媒体网站也不难发现,其版块划分、栏目设置、话题切入等多是以BBC、《纽约时报》、CNN等西方主流媒体为模板。

另一方面,反对派也时常在媒体上表

达与现任总统不同的声音。2014年12月,察沃路段所经的Makueni郡和Voi郡的官员便在媒体发文,公开指责中方企业未经当地允许采砂。

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由于该郡为反对派执政,对于现任总统重视和推行的项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据一位不具名中方员工介绍,早在去年10月份,中方企业已经和该郡进行了沟通,本来郡长已经口头答应给予免税的采砂许可,但是迟迟没有下发官方文件,“现在又在媒体上做文章。”

在经历了中国式宣传手段无效和“遗产屋大战”告败后,中方企业吸取了教训,加强了与当地媒体互动和危机公关,以改变因为封闭内敛而身陷被动的局面。

陈思嘉就是专门负责媒体的联络员之一,他每天需要处理当地媒体对该项目的各种“攻讦”。

他指着一张2014年11月的报纸解释说,“标题是《蒙内铁路项目停工14天》,给读者的印象是整个蒙内铁路停工,但实际的情况只是一个路段停工了14天而已。”

面对层出不穷的媒体报道,中方焦头烂额,其对策是先写信向当地媒体表达不满,陈述事实,再进一步与当地媒体建立联系,“希望他们再刊发与项目相关的新闻时,能先与我们联系一下,确认一下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再发表。”

试图打“翻身仗”的中方企业已经聘请了当地媒体公司PMS接管部分与当地媒体打交道的业务。为了全面向当地介绍蒙内铁路的官方信息,以肯尼亚风格设计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建设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看似中方企业已经学会开放而公开的应对媒体之道时,面对《凤凰周刊》希望采访其雇佣的PMS媒体公司时,中方企业以领导不方便为由进行了拒绝;而在追问目前中方企业投入多少进行媒体公关时,中方企业也以“不太好说”相回应。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 中国模式的非洲样本

## 埃塞如何从“世界第二”甘居“第三”

记者/漆菲(发自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达玛)

“埃塞人一直觉得全世界美国第一,自己第二;直到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后,才突然发现中国也很强大,于是自己退居第三。”

《凤凰周刊》记者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采访期间,经常听到这个段子。

作为非洲大陆仅有的未被殖民过的两个国家之一,埃塞人有着深入骨髓的民族自豪感。但当记者与本地司机Yosef谈起中国时,他提高声音说:“我们需要中国!”“你知道的,那是一种文明,”Yosef笑着说,并不停地挥舞着右手,“跟欧美国家不一样,更有用的(文明)。”

Yosef身材魁梧,喜欢穿一件色彩鲜艳的粉色T恤。他兴奋地向记者讲述“非洲屋脊”近几年来变化:从号称“埃塞长安街”的BOLE路被中国企业拓宽,到新修建的提露内丝—北京医院,以及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风电厂和铁路桥。这些变化的共同之处是——“Made in China”。

“基础设施是经济转型的决定性切入点。五十多年以来,西方力量渗入埃塞,却很少能对埃塞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自从中埃两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打开了局面。”前瑞典北欧非洲研究所所长、埃塞俄比亚学者范图·切鲁(Fantu Cheru)对《凤凰周刊》记者如此评价。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学者张宏明在《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中称,在西方眼中,中国正在通过经济方式悄然对非洲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层面的意义,因此西方国家难以接受其成为替代

“西方模式”的选项。

### 执政党高层大多赴华学习

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上,当地人会友好地上来打招呼,碰肩膀(对碰肩膀是当地的友谊礼节)。有时会直接蹦出一句“你好”;而15年前,来此的中国人多被错认为日本人或韩国人。

12月的埃塞俄比亚迎来一年之中最凉爽的季节,因地处东非高原,紫外线仍很强烈。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旅游口号是“十个月的阳光”——按照当地日历,一年被划分为13个月。“所以现在是我们的2008年,你也年轻了六岁。”酒店服务生笑着对记者说。

略显破旧的蓝色出租车上,司机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市中心的两个项目,一个是2010年中国援建的非洲联盟大厦,它被形容为“停驻在亚的斯亚贝巴上空的一艘巨型太空船”,尽管与周围低矮的房屋有些格格不入;另一个是中铁二局承建的轻轨项目,被誉为“撑起这座未来现代化城市的骨架”。

路边,一幅以埃塞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书写的题为“未来会更好”政治宣传画中,轻轨被作为通往“未来”的最主要元素出现在画面中心。

目前在建的一期工程,两条轻轨线分别从老城区向东西和南北铺开,交会于梅斯克广场(Meskel Square),也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政治空间。2012年埃塞前总理、政治强人梅莱斯的葬礼在此举行,成千上万的民众为其送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也出席了葬礼。

梅莱斯被称作埃塞“经济总设计师”,

1991年至1995年间担任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总统,1995年大选后成为首任总理。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逐渐走出30年内战的阴影,一跃成为非洲发展最快的非资源出口类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一位匿名的中国外交部人士介绍,埃塞执政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大部分高层都曾到中国学习和接受培训,许多要员的子女也被送往中国留学。而埃塞俄比亚的部长级官员更是几乎人手一本《毛泽东选集》。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克强同时期的北大校友。

轻轨项目刚刚签订时的2009年,中方人员专门给业主单位——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ERC)当时的领导送去了英文版的《江泽民文选》。

近两年来,密切的高层交往为中埃关系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塞总理海尔马利亚姆在不同场合两次会晤,海尔马利亚姆总理成功访问中国。2014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7月,穆拉图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

中国的官方语境中,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被表述为“南南合作的卓越典范”,中国已经成为埃塞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最大贸易伙伴,埃塞俄比亚是中国产品、设备、技术和投资在非洲的主要市场。据外交部的相关人士透露,埃塞还将成为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柱”国家。

### 中国基建全面占领埃塞

“快让中国人来修路吧。”每逢堵车,



Yosef就会转过头对记者这样说。颠簸不平的路面以及经常拥堵的路况让Yosef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有时,他还会故意摘下墨镜看着记者,以显示自己的态度认真。

Yosef已经在一家中国企业当了五年司机,对中国很有好感。途经一段日本人在2000年左右修建的路段时,Yosef又说,日本人修的路质量不错,“但太窄了”。

中国正通过实际行动将“要致富,先修路”的经验介绍到非洲。尽管诸多西方媒体评论认为,中国这只“远东之虎”向非洲人献殷勤主要是为了确保得到那里的资源,但埃塞或许是中国官方反击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据——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埃塞俄比亚的资源并不丰富,仍以畜牧业和农业为支撑,而中国在埃塞开展的项目却远远超过一些资源富国。

中国驻埃塞大使解晓岩2014年撰文称,埃塞90%以上的公路、全国的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以及几个重要的水电站等,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

之所以在埃塞投入如此多的基建项目,按照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张霖的说法,缘于中、埃双方在治国理念、行政方式等方面比较谈得来。“埃塞经济处于开始加速发展的阶段,它在欧美和中国等国之间比较来比较去,觉得中国的经济模式对它更有启示。”张霖说,除了中国,它也借鉴了包括韩国、新加坡这些比较适合其国情的政权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埃塞高层官员对于发展经济、惠民政策等意识较强,“他们想在非洲或者起码在东非树立一个强国的形象”。

多位受访的国企人士提到,埃塞方面认为选择中国企业性价比高,什么事情给中国人做见效快。“虽然的确中国和埃塞政府关系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做事可靠。最近的一些大型项目埃塞方面给的工期都比较紧张,但他们还是觉得中方能按时完成。”

“近几年,我们逐渐意识到,在非洲搞发展的话,不可能将中国因素撇开。”在位

于BOLE路上的办公室里,世界银行埃塞国家局局长陈广哲如此表示,“中国政府投到这里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我估计今后两三年,中国每年的资金投放量会超过我们。”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埃塞直接投资存量达7.2亿美元,中国企业共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224亿美元,在建项目总额超过150亿美元。而埃塞俄比亚201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为468.69亿美元。

### “效仿中国模式”

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驱车前往距其80公里的阿达玛市,沿途是金黄的田野,远山之间点缀着颇具非洲特色的墨绿色平顶伞形树——金合欢树。正值旱季,当地妇女、儿童头顶或手提着黄色塑料桶运水,或是用干瘪的毛驴驮水。看到外国人时,他们的目光直接、大胆而好奇。

一次出行中,记者所乘汽车的轮子不慎卡在沟壑中,马上有十几个黑人少年聚集过来,三五分钟就把车抬了上来。“虽然他们知道帮个忙中国人会给点辛苦费,但并无像国内那样趁机敲诈的事情。大部分真的是热心肠。”在当地工作的中国朋友说。

中非关系被中国官方描述为“兄弟情谊”。这种“兄弟情谊”不仅体现在情感层面,也在政策层面有所体现。“埃塞已经‘向东看’了十来年,”范图教授说,“从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来讲,埃塞模式就是在效仿中国模式。”

2006年,梅莱斯政府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在埃塞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主题确定为“经济发展与脱贫”,即在国际援助资金的支持下,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公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埃塞连续6年取得GDP两位数增长,其中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带动。

**“从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来讲,埃塞模式就是在效仿中国模式。”**

2011年,埃塞政府进一步推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被称为“增长转型计划”(GTP),该计划希望将埃塞的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努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工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地区发达的制造业正在寻找转型升级之路,过剩的产能四处寻找转移的目的地,除了本国中西部地区、东南亚、印度等选项之外,不少人将目光转向遥远的非洲大陆。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驻埃塞执行合伙人那加图(Zemedeneh Negatu)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这个过程中,埃塞俄比亚从中国学到了如何建设铁路和公路等大型基建项目。此外,他们也力图学习中国在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经验。因为这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出口行业的领头羊。”

埃塞GDP在近十年内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增长率,也是非洲百万富翁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这个词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获得了最高合法性。如同“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在中国耳熟能详,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里从新闻到音乐节目,也充斥着“发展,发展,发展”的宣传口号,甚至在MTV里都到处可见高速公路、水电大坝的画面,以及中、埃两国的国旗。

世界银行2013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报告》指出,该国正在以最好的方式努力实现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梦想。

谈到三年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变化时,陈广哲感慨道,“市政和基建的确变化明显,只不过,之前几乎没有空气污染,现在增加了。”

### 轻轨项目“大跃进”?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意思是“新鲜的花朵”,但在快速发展的雄心壮志下,热火朝天的工业气息使这朵鲜花正到处弥漫着工业粉尘。工地旁,几乎没有现代商业大楼;吊车、挖掘机占据着每个主干道,红色的泥水混着



乱石、砖渣。这座城市至今没有门牌号，指路或找路要依靠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记忆力。

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几乎看不到红绿灯，据说中国人来了之后才修了两个，一般车辆主要通过转盘通过。设计轻轨项目时，中方提议要在通道处修红绿灯，“但埃塞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国民素质很高，（车辆）通过时人会自动让开。由于这几年埃塞机动车持有量暴涨，导致道路太拥堵，他们才意识到还是要依靠（工具）疏通。”中铁二院副总工程师石磊说。

与国内常见的城轨“上天入地”不同，这里的轻轨大部分建在地面上。东西线设的22个车站中，6个是高架站，其余皆为地面站；南北线的22个车站中，8个为高架站，仅有一个地下站。“双方的审美不一样。设计梅斯克广场一段时，我们本考虑做下穿式，这样不破坏整体感；但他们觉得桥更好看，哪怕这样会把广场割裂成两半。”石磊说。

按照埃塞目前的发展阶段，选择建设轻轨似乎仍有些“超前”。甚至被一些在埃塞的中国人称作“大跃进”项目。有当地说法称，“在一个人均月收入1000比尔（相当于300多人民币）的国家，难道让人赶着羊坐轻轨么？”

“花这么多钱，跟当前现实是否匹配，能否显著改善交通，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一位商务部的官员私下评价，用这笔钱可以修十条BOLE路，或再修几条高速公路，这些都能改善目前的交通情况。“但是，或许埃塞政府认为，十条路并不足以体现出其执政党的地位，以及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参与项目进程的一位国企人士透露，前总理梅莱斯在位时曾对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轻轨是埃塞最重视的项目之一，希望中方支持。“从两国交往来说，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没有理由反对。”其实埃塞方面的想法比较长远，除了改善自身的交通，他们也希望从轻轨项目的施工建设、管理运营当中获得一些经验，这样还可以“卖到”其他非洲国家。

中铁二局轻轨项目总工程师罗兴财认为，埃塞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些开放意识，许多留学海外的精英见识了现代的城市交通系统，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城轨——它不受油料、天气限制，有很多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环保。“有了政治和民生需要，他们才选择了这样的项目。”

石磊认为：“在目前如此拥堵的情况下，如果建好轻轨，一期、二期连成网，公共运输解决很大的问题。这是发展的必经之路，顶多只能算提前了一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唐晓阳也认为，“基建项目投入大、收效晚，轻轨相对地铁来说要便宜很多，的确该早建。”

经过了三年的攻坚战，2月1日，轻轨一期工程终于如期迎来了试运行，这也成为继非洲联盟总部之后亚的斯亚贝巴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据记者了解，轨道虽然铺设完毕，但一些配套设施尚未建好，因此，施工团队处于疯狂赶工中，“24小时恨不得全在线上”。因此，要想5月前正式通车，难度着实不小。

## 中国助力埃塞“铁路梦”

经常到非洲进行调研的衡策投资合伙人简练介绍，五六年前，埃塞俄比亚中学课本中增加了关于中国的一篇课文，讲述了中国近现代从贫穷落后到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既然中国能由穷变富，那么埃塞俄比亚也能通过勤奋努力创造经济奇迹。“这篇课文对埃塞青年产生了极大震撼，希望到中国学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对埃塞政府来说，更加迫切想实现的是铁路梦。100多年前，法国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至吉布提曾修建过一条窄轨铁路，时至今日，大部分路段已因年久失修而废弃。据说，前总理梅莱斯跟中方谈到铁路项目时表示，“对埃塞来说，第一重要的是国铁，第二也是国铁，第三还是国铁。”

2015年，由中铁二局和中国铁建共同承包的另一个大型基建项目——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共和国铁路，也就是梅莱斯所说的

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共和国铁路



中铁二局 摄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



中铁二局 摄

“国铁”，当地人称“大铁路”也将竣工。这预示着，当地的客货运输将从100%依赖公路转变成70%依靠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到埃塞虽然只有800多公里，但依靠唯一的4号公路，汽车要跑8天，大铁路的开通将使时间缩短到7小时左右。

大铁路的总指挥部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80公里的阿达玛市。随着海拔的降低，温度逐渐升高，来到这里才能体会到想象中非洲应该有的燥热。继续前行十分钟左右便来到离指挥部最近的施工现场，一路黄土飞扬，沿路是简陋的危楼。周边村子的孩子们不顾危险，纷纷爬上高架桥，好奇地盯





着远方橙色的庞然大物——架桥机。

43岁的本地工人Seid Suleiman对自己的工作甚是满意。“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铁路，感觉很欣喜，周围的村民也很愿意来这里务工。”提起中国人，他激动地比划着说：“他们太勤奋，我们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奉献（的精神）。”

这条全长74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由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共和国首都吉布提市，全线采用中国二级电气化铁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总投资约40亿美元。其中70%左右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中铁二局具体负责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埃塞

城市米埃索340公里铁路的建设。

中铁二局租用的大宅子坐落在热闹的主干道旁，一二层办公，楼上作为职工宿舍。办公楼的右后方有个篮球场，场边种着咖啡树和木瓜树。当地的女雇员正在打扫房间，她会准备好当地最出名的咖啡，但“中国人更爱喝茶”。

二局的员工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食堂，这里飘出的香味吸引了周围的野猫。这个总部在成都的集团还贴心地给员工们准备了麻将室。用这里人的话说，“打上川麻，吃上川菜，看上央视”是集团领导为在海外做工程的人最为周到的考虑。

围绕着这条铁路线，不少当地人在项目部各驻地附近开起了咖啡馆、小吃摊。这也让附近的村落在这条铁路的带动下，体会到更多元的文化和新鲜的事物。

为了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去年埃塞传统节日火把节期间，中铁二局还特意在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轻轨的广告，称“如今因工程造成了诸多不便是为了将来的方便”。

“现在还准备拍一个宣传片，给轻轨和大铁路项目做做广告，也能提高二局在当地的社会知名度。”中铁二局轻轨项目部的李振亮自豪地说。（实习生王璠、邓哲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 “中国标准” 强攻非洲

以中国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中国标准”，正在如火如荼地向非洲迈进，抢滩“最后一块未经历资本主义洗礼的大陆”。

记者/王衍 漆菲（发自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

**非**洲建铁路到底应该用多宽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非洲的公路应该修多宽？不同国家的企业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但无论是在非洲哪个国家，只要开车在中国人修建的公路上疾驰，都会让人备感亲切，“好像忘了自己身处非洲，恍惚间觉得已经回到中国。”中国人修建的往往是当地最宽的公路，加上道路两旁绿色的指示牌，以及在非洲显得额外平整的路面环境，都有着浓郁的“中国风”。这正是中国目前在道路建设的“中国标准”上想要达到的效果。

继前两年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信在海外引发“中国标准”的关注后，如今，又一波以中国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中国标准”，正在如火如荼地向非洲迈进，抢滩这块被誉为“最后一块未经历资本主义洗礼的大陆”。

然而，在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和文化影响的非洲，“中国标准”的接受度还不理想，其宣传和推广之路且艰且行。

### 铁路：标准最佳输出途径

2014年12月1日晚20时，随着尼日利亚

交通部长为最后一节轨排拧紧螺栓，中国铁建承建的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第一标段——首都阿布贾至卡杜纳铁路宣告全线铺通。非洲首条按照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修建的现代化铁路通车在即。中国铁建中非建设副董事长曹保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卡项目在成功输出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同时，还拉动了3亿多美元的中国铁路建筑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和中国机车的出口，带动了当地就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东非，除了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目，由中交集团承建的蒙内铁路、中国铁建和





▶ 左图 2013年9月22日，中国工程机械总公司的一名员工正在科特底瓦的阿比让-巴萨姆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监工。

右图 2014年5月13日，来自中国的建设工人站在内罗毕的工地。“中国企业工作勤奋，做工精湛，项目执行迅速，赢得了许多肯尼亚人的尊重和钦佩。”内罗毕大学城市规划讲师彼得说。

中国中铁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共和国铁路等项目均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建设。中国社科院博士生智宇琛认为，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推广使用形成了良好的品牌示范作用，不仅能够带动中国相关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也为中国企业下一步更多地参与该区域铁路网络建设打造良好基础。

“首先，标准意味着进入门槛，只有符合相应技术标准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入所在国市场；其次，技术标准是影响造价和预算的关键因素，不同技术标准下建造工程的投资会有很大差异；第三，非洲国家一般引

用欧洲铁路技术标准，中国标准的选用难度很高，需要两国专家协同工作，并经过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智宇琛说。

究竟谁的技术标准更胜一筹，很多行业内的人也认为很难评判，因为目前无论是非洲还是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技术标准还处于不了解的阶段。“但我们希望让非洲国家知道，除了有西方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标准。”多位在非洲的中国国企负责人均在采访中如此表示。

### 如何让非洲接受“中国标准”

然而，在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和文化影响的非洲，宣传和推广对方尚不熟悉的“中国标准”并非易事。

埃塞轻轨项目设计方中铁二院的工程师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同时与中方竞争的还有欧洲一家设计公司。“虽然埃塞并没有被西方国家殖民的历史，但仍受欧美国

家影响很深，如何说服埃方接受铁路建设的‘中国标准’成为一大难题。”

在实地综合考察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地理环境 and 经济状况后，中方提出了经济、现代和实用性相结合的设计建造理念。多次沟通后，埃方最终采纳了中方提出的造价相对较低且更加先进的建设方案。

在其邻国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也曾面临相似的困扰。该项目从开始酝酿到最

**“在东非铁路网的设计中，蒙内铁路只是一个开端，最终会连通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苏丹、刚果（金）等多个国家。如果开端使用中国技术标准的铁轨技术，那么就意味着将来的整个铁路网都要使用。”**



终签署协议，历时8年之久。肯尼亚曾受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年前英国人曾经在此修建过一条米轨铁路，轰动一时。无论在其首都的铁路博物馆，还是铁路沿途的五星级酒店，都能看到当年铁路竣工时的照片。“他们骨子里当然还是最认可英美。但是在最近十年，中国建造铁路，尤其是高铁技术，那一定是世界领先的。”中交集团负责蒙内铁路项目总经理部副总经理胡钊光说。

虽然这样世界领先的技术，还不能直接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无论在西非的尼日利亚还是东非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中国建造的货运时速80公里、客运时速12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二级铁路（绿皮车）的标准，但在当地已相当于一级铁路。先进技术的光环，有助于中国拿下这些铁路项目。此外，中国基建价格低、性价比高、建设周期短，也成为中企在非洲市场竞争的巨大优势。

“在东非铁路网的设计中，蒙内铁路只是一个开端，最终会连通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苏丹、刚果（金）等多个国家。如果开端使用中国技术标准的铁轨技术，那么就意味着将来的整个铁路网都要使用。”据胡钊光介绍，该铁路网的第二段，从肯尼亚到乌干达铁路段，该集团也已开始运作。

## 中国垄断非洲基建？

不过，“中国标准”的含义比中国技术更为宽泛，一定程度上，它是指从出资到技术再到管理整套生产链的全部“中国化”。

就蒙内铁路项目而言，一旦确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的大型机械、钢轨等硬件设备就不远万里海运而来，“当时合同中签订，我们40%的原材料在当地采购，而剩下的都是来自国内。”

在埃塞，无论是轻轨、大铁路，还是隶属于新能源领域的风电项目，中国签订的合同都是设计采购施工（EPC）合同（即“交钥匙”工程），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

**“无论是援助还是投资，只有考虑到受建国的经济、环境、人口等因素，才能更受当地认可和欢迎，才能更可持续地向外走出去。”**

整个过程的“一条龙服务”。签这样的合同主要是基于埃塞缺乏技术和有经验的管理团队。

然而，这类推广“中国标准”的做法，在国际多方势力云集的非洲大陆也遭到不小的争议。美国前驻埃塞和布隆迪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David Shinn曾撰文指出，“某些非洲国家正在担心，中国也许发展出一种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

对此，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回应称，中国的诸多标准与国际标准并无明显差别，比如铁轨就是国际通用的标准轨距1435毫米，大部分欧洲国家也是采用这一标准。“在指责中国的时候，还是先看看欧美以前做的是什么样的。更何况，哪个国家不是推行自己的标准呢？”

资料显示，一个世纪前英国在东非国家肯尼亚、乌干达以及西南非国家安哥拉等地建造的铁路都是米轨，轨距仅有1米，时速大约30公里，如今除非洲和其他少数发展中国家仍在使用外，已经很少存在，更不可能用目前国际通用的标轨与其对接。

## 监理“中国化”背后

相比于以往坦赞铁路这样的大型道路基础设施项目，如今中国在推行“中国标准”时遭遇的审查、监理问题不可不提。在工程项目中，监理作为一种国际惯例，是独立于承建商和投资方的第三方，为工程技术和提供科学、公正、独立的服务。

“刚开始的沟通十分不顺，他们以前只知道西方的标准，对中国标准一无所知。尤其作为监理方的欧洲人、印度人接

受的也是西方的标准，这就要经过多次协调。”在中铁二局轻轨项目部的李振亮看来，中国标准其实在一些方面是高于西方标准的。

或许是考虑到这些“阻碍”，诸多非洲基建工程中的监理也更多被“中国化”。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蒙内铁路项目，更是直接排除国外因素。据察沃路段的中方员工介绍，监理由中国人和当地人两方组成，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人正在培训当地人，让他们接受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标准”。一位中方员工聊到此处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监理在工程完工后不给通过，很可能还要返工。”

监理方之所以“中国化”，根本上缘于投资方来自中国。多位当地工程师介绍，非洲国家在向外寻求承建方时，也希望有合适的投资方为其提供援助或贷款。在国际上，除某个国家外，最频繁出现的投资方是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随着中国大步迈进非洲市场，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则扮演着最新大投资户的角色。

但监理“中国化”在一些项目中也受到抵制。对此，中铁二局埃塞大铁路项目负责人、副总工程师付涛感慨道，这还是源于对方“不信任我们，他们更相信德国、土耳其、印度的公司。”不过，他也反思说，“真正要实现‘走出去’，可能还是要接受用西方的监理。这样或许会更严格，反而可以推动我们技术进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认为，在推行中国标准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受建国的需求。她以上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企业“走出去”为例，“当年日本企业在东南亚也有进行各种投资和建设，但是由于不注重当地的诉求，引发了反日浪潮。所以，无论是援助还是投资，只有考虑到受建国的经济、环境、人口等因素，才能更受当地认可和欢迎，才能更可持续地向外走出去。”

（实习生王璠、邓哲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 中国驻埃塞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张霖： 中国模式助力埃塞经济发展

记者/漆菲（发自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八年前，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区、五年计划、复兴大坝……中国人熟悉的一幕幕，正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上演。

如今，埃塞俄比亚已经聚集了3万-5万中国人，300多家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已成为其第一大外国人群体。国内各大工程建设承包商和电信设备商在这里扎根；制造业、建材等热门领域的投资商也开始大量涌入。2014年12月下旬，《凤凰周刊》记者专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经济商务参赞张霖，探讨了中国企业在埃塞面临的优势和挑战。

## “中国模式”适合埃塞国情

**记者：**埃塞新政府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与其合作的内容愈加广泛，从高速公路、铁路到轻轨、风电等项目。中方为什么选择在埃塞投入那么多，尤其是基建类项目？

**张霖：**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埃两国政治互信程度比较高，包括治国理念、行政管理模式。埃塞经过反复比较，觉得中国经济模式适合他们的国情。其次，埃塞政局比较稳定，适合中国人来投资创业。再次，埃塞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几乎没有什么基础可言，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比较适合埃塞的需要。西方的东西固然质量好，但是要花更多钱去购买，目前埃塞的购买力还不够。

现在中国的产业要转移到西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要降低成本，要给富余产能找到一个新出路，那么非洲可以说是中国产业



► 2011年3月15日，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在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合影。



► 2011年3月17日，苏丹共和国首都喀土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条件遭到一些批评。



提升转型中造成的富余产能的最大市场。在其他地方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了,所以两国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不光是埃塞,整个非洲(都这样)。

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基础上的。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继续支持整个东非乃至全非三网(航空、铁路、公路)建设计划,既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也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埃塞投资改善环境。

## 先做大,还是先做强?

**记者:**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谈到中国部分企业恶性竞争影响中非关系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张霖:**过去也发生过个别企业不择手段抢项目、去外方面前互相诋毁的事情,但总体来讲,埃塞这些年还未发生很恶劣的案例。埃塞在非洲的开放度不算很高,服务业没有正式开放,虽然有个别中国餐馆,但大多是与当地人合作的。批发零售业不对外开放,各种行业的人流动性差,一些产生负面影响的社会问题就少一些。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在埃塞的形象在整个非洲算是最好的。目前这里大多还是国企央企和比较有实力的个体企业。

**记者:**你认为应当如何规避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张霖:**这个问题暂时无解,也是我们最头疼的难题。这需要企业家素质的提高,需要企业加强文化体系建设,需要绩效考核标准的改变(对国企而言),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

三四年前我随商务部一位副部长去台

**“软援助项目要适合当地的实际需要,埃塞这样的国家经济发展欠账太多,百废待兴,它还是希望更直接更有效的东西。”**

湾考察,某家集团老板对我说,我们台湾企业和大陆企业做企业的理念有四个字是一样的,但顺序不同——我们是“做强做大”,先做强后做大;你们是“做大做强”,先做大后做强。这个对我触动很大。这四个字顺序不一样,导致企业的发展理念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很多企业,包括一些老字号企业都是因为盲目扩张,鲁莽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看起来是大了,但没过几年就垮掉的很多。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世界工厂,有荣耀,但带来的后患是严重的,环境破坏严重,资源供不上,人口红利过快消耗,可持续发展出了问题。

过去这么多年各级政府追求的都是GDP,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确带来很多问题。我们若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非洲发展,就必须提醒他们避免我们发展中经历的沉痛教训。在这方面,中国还是比较真诚的。

## 埃塞的“计划”更雄心勃勃

**记者:**据说埃塞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支柱国家”,这意味着什么?

**张霖:**随着中埃政治互信的加深,双方的政治外交、经贸合作肯定要加强。这就意味着双方全面经贸合作力度会加大,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埃塞落地,除了基础设施项目,还会有大量的工业和民生项目。

今年是埃塞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他们和我们的“五年计划”有点儿相似,但是制定原则上还是有区别。咱们的计划留有余地,他们比我们更雄心勃勃,发展的愿望更强烈。

**记者:**在你看来,在其“向东看”经济发展理念形成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张霖:**还是有些困难。埃塞有着自己的国情,跟中国30多年前开放的基础(不太一样),有利之处是——起码它有经验可以借鉴。要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靠摸着石头过河。但同时,埃塞的劣势也很明显。当时的中国有着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埃塞基本



上是空白,等于从零起步,所以好多东西其国内的产业配套上比不上中国当时的条件。就连精度高一点的一颗螺丝钉,当地都没有办法配套。所以中国企业到这儿来,最好是全产业链企业一起进来,才有可能实现本地化生产。

埃塞招商主要瞄准的是中国大型企业,也就是国内讲的龙头企业。目前埃塞的政策也是向这些企业倾斜,对小企业关注并不是很高。不过,埃塞引进外资从一开始就是比较有选择性的,对环境的要求比我们当年做得要好。我们这几年才重视环境的修复保护,保证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





► 2014年3月21日，一个中国人在塞拉利昂都柏林村帮助当地居民搬运未完工的海参捕捞船。当地居民没有使用海参的需求，但在中国它们被用作珍贵药材和天然催情剂。

从政府高层来看，埃塞建设法治环境、改善管理体制和反腐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但改善投资环境不是抓一抓就能成功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记者：**未来，中国企业在埃投资领域会产生哪些趋势性变化？对其国内投资环境有何预期？

**张霖：**随着埃塞经济的发展，会不断出现新的发展机遇，类似房地产、旅游这样的产业将慢慢成为热点、重点。这几年，随着埃塞基础设施的改善，国内一些大企业也需要转型，来埃塞做实体投资的也越来越多。原来在这儿扎根做工程的也开始转型做其他投资了。美的集团前一段时间组织高管们专门来埃塞考察投资环境，寻觅发展机会。

埃塞对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给予很大优惠，还能给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由于缺少外汇，埃塞招商的重点也是放在能给它创汇的生产企业，这和我们当年的情况差不多。此外，它也会加大现有资源的投资，比如钾盐、天然气，中国企业目前在积极参与与开发这些项目。再加上埃塞还有丰富的农业（畜牧业）资源，其牛羊的存栏量在非洲是第一的。要把畜牧资源优势变为出口优势，首先要解决检疫问题。

**记者：**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软援助工作方面进展如何？

**张霖：**中国帮助埃塞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实际上就是帮它摆脱贫困。西方在软援助方面的项目包括文化教育、能力建设、人才培养诸多方面，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做了很多，但仍有很大的发展和改进空间。当然，软援助项目还是要适合当地的实际需要，像埃塞这样的国家经济发展欠账太多，百废待兴，它还是希望更直接更有效的东西。🌀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青年

艰巨。我们在跟埃塞方面交流的时候也会说，中国的其他经验你都可以学，但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点一定要高。埃塞的环保标准还是比较严格的，之前有一个中资皮革厂就因为环保不达标被停产了一段时间，后来达标了才恢复生产。

## 新投资机遇将不断涌现

**记者：**从经商处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在埃塞投资和建设当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和障碍都有哪些？如何协调这些问题？

**张霖：**埃塞一直致力于改善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目标也比较明确，但在执行层

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中资企业抱怨最多的是税收、海关等部门执法随意、自由裁量权太大。

几个月前，我们把企业反映的问题做了一下梳理，大使出面跟埃塞方面的高层官员进行了深入沟通。我们反复对埃方讲，中资企业到目前为止是赚了点儿钱，但是当前出现的这些问题搞得大家没有心思扎下根来经营，而且个别企业遭受了这种待遇，宣传出去会影响其他原本有意赴埃投资的企业，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们埃塞。他们接受了我们的部分观点，妥善处置了一些个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逾七成就业者上下班需“长途奔袭” 北京职住失衡解析

记者/赵新宇

一个周五清晨，通州梨园城铁站，上班族们堵在蜿蜒的铁栏通道里缓缓前行。地铁安保人员负责维持人流的秩序，一列车开走，他们会放一部分人进站，铁栏里的队列也就向前快走几步，空出来的队列尾部，很快又被后来的上班族填满。

对于普通的通州上班族，这只是一次日常通勤，但对于李亮（化名），这则是他最后一次从梨园乘车上班。周末，他就要搬家，妻子的工作地点从国贸换到了五道口，他有必要为她找一处上下班更方便的住处。小两口最终选中了回龙观，另一个著名的北京“睡城”，从那里出发，照样要挤在铁栏通道里排队，不过到五道口就只有40分钟车程。

在CBD上班，在“睡城”安家，李亮既不是个例也不是特例——北京有千千万万人是他的同类。一种观点认为，是错误的城市规划导致了李亮这种长途奔波的生活方式。许多官员也支持这种观点，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就曾在一次讲话中表态：“回龙观这类新城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会“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

的确，北京的通勤压力已不可谓不夸张：2006年，北京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是43分钟，它在随后五年中又增加了约10分钟，远大于美国（费城最长，为38.3分钟）和欧洲（英国最长，为22.5分钟）的主要大城市。相当数量的规划界学者都试图用规划本身来消除“睡城”现象，为此，他们提出“职住平衡”的概念，即在一定区域内推行土地混合利用，让居民的居住、就业、上学都在区内完成，并因此减少交通需求和能源消耗。

与之相应的，便是李亮们选择的“职住分离”式生活。职住分离有其内在合理性，产业集聚能够带来经济效率，中国城市的市场化也就是一个打破国有“大院”模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职住失衡必然是加重的。

现实世界很难如规划理想一般运行，在简单提出两种概念孰优孰劣之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分析。例如，北京市内有多少“李亮”？他们为何情愿忍受长时间通勤？要缓解交通压力可从哪些方面着手？为精确描画这些问题的全景，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郑思齐教授带领技术团队对北京市职住失衡的具体情况、成因和相关社会成本进行了量化考察，或可帮助人们从宏观上认清职住失衡的本质。

### 中心地带并非就业中心

不考虑实际匹配，从名义上衡量一个区块职住平衡/失衡的指数是名义职住比。它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以特定空间单元内就业和居住的人数相除即可。为了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北京市人口和就业的分布情况，郑思齐等采用了距今最近的普查数据来进行计算。居住的分布情况来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业的分布情况来自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两者年份并不统一，但考虑居住选址和产业选址变化缓慢，这样的时间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北京市城六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的129个街道则被选为研究的单元分析单元。

总的来说，北京市城六区的名义职住比为0.68，经劳动参与率调整后（此后的职

住比均为调整后数值），该指数为1.02。这意味着城六区范围内为就业人口提供的居住机会和就业机会总数基本平衡。然而，各街道名义职住比的差别很大，它们的中位数为0.74，大多数街道处于职少于住的状态，职住比最高的建外街道却高达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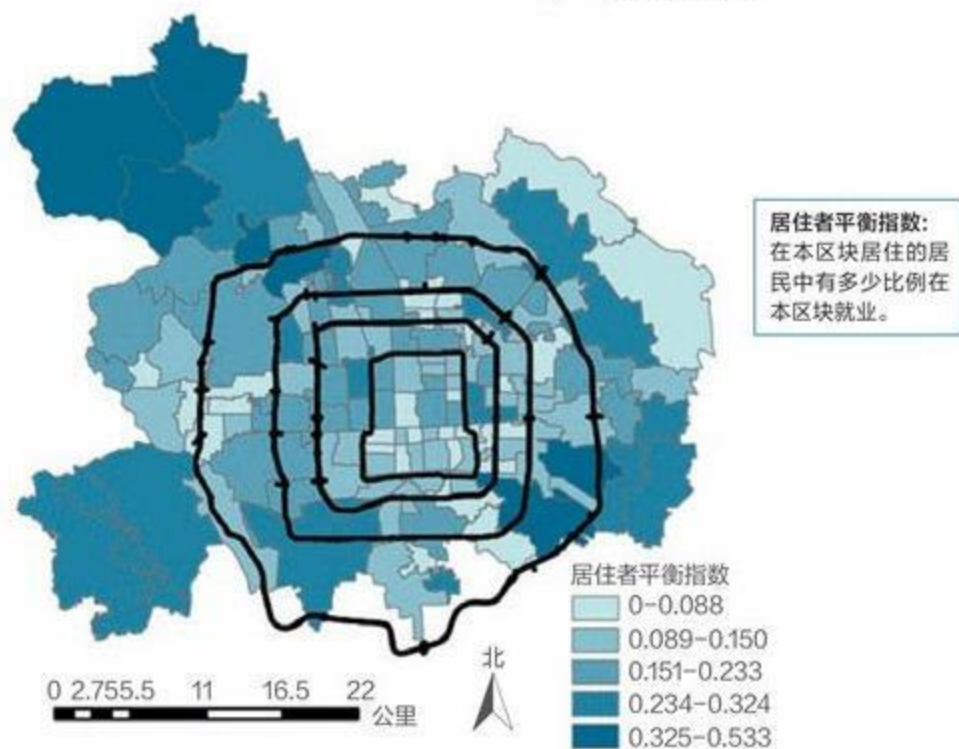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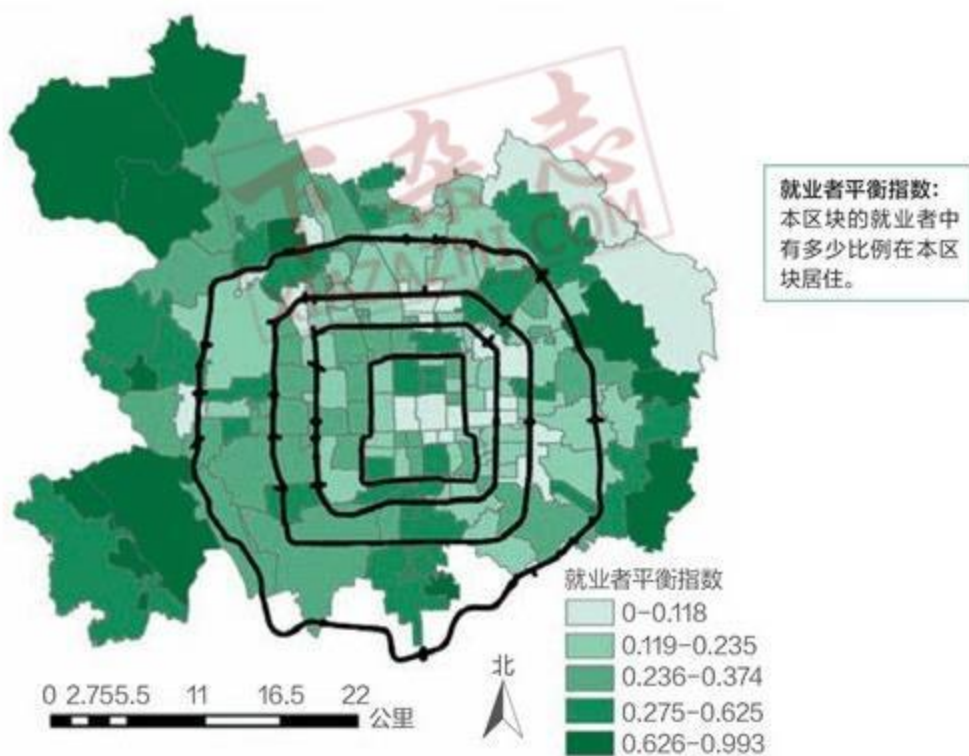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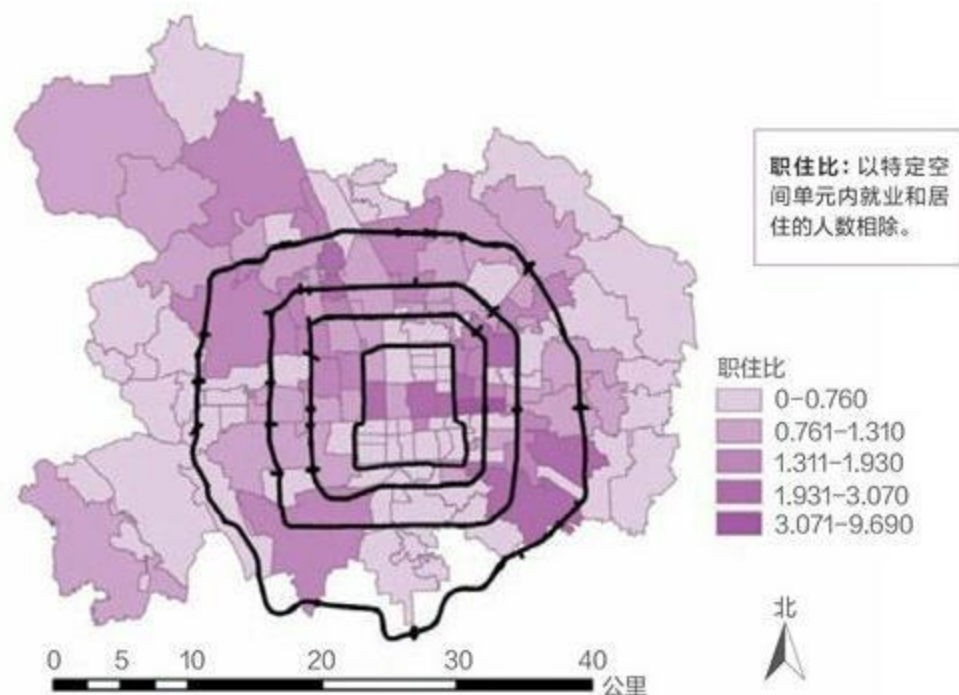
职住比最高的12个街道中，3个位于二环内（分别为建国门、东华门和金融街）、4个位于朝阳区CBD区域、2个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区域。从名义职住比的空间分布上可以看出，北京市的就业中心并未集中在其中心地带，在二环内还有大量职住比偏低的街道。郑思齐解释说，因为古城保护、单位大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北京市二环内的土地容积率偏低，导致中心区域的职住比偏低，这种情况并非北京独有，但北京的情况可能更为明显；而众多大院存在造成的交通绕行，也是制约北京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

### 就业者本街道居住不足三成

名义职住比只关心某一空间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与居住者在数量上的比例，它的平衡并不反映两者是否真的匹配。追求名义职住比，以土地用途来预设职住平衡的规划往往会招致失败。早在1994年，苏州工业园的规划者就提出要将其建设成“相对独立的新区”，设想园区内“11万居民全部在本地就业”。十余年后的今天，区内居民就业地却大多在区外，向区外的通勤出行占通勤出行总量的80%以上；同时，区内就业

**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





者在本区居住的比例仅占2%。在北京，也有一处类似的失败案例：亦庄新城是按“实现新的职住平衡格局”规划建设的，新城的产业工人却无法承受那里的住房价格，只能在偏远的农村寻找住房，最终亦庄实际职住比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为真实衡量居住者的就业选择和就业者的居住选择，研究者利用了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的北京市第四次交通综合调查数据，来计算“居住者平衡指数”，即在本区块居住的居民中有多少比例在本区块就业；以及“就业者平衡指数”，即本区块的就业者中有多少比例在本区块居住。经计算得知，在城六区范围内，只有16.03%的居民实现了本街道就业，只有26.61%的就业者实现了本街道居住。真正实现了职住平衡——即任意一个实质平衡指数超过80%——的街道仅有5个。这意味着，超过70%的就业者上下班需要“长途奔袭”。

职住失衡的典型则有两种：建外街道所有就业者中，仅有4.62%能在该街道居住，是标准的工作区；而如天通苑和回龙观（它们并不在研究样本的129个街道内），仅有不到20%的居民就近就业，82%居民的就业地集中在五环以内，70%居民更是在四环内就业，属于标准的“睡城”。

在空间分布方面，实际平衡指数与名义职住比存在很大差别。从就业者平衡指数的分布可以看出，外城就业者更倾向于选择在本街道居住。该指数最高的18个街道全部位于中心城区外围的边缘地带，其中15个都位于五环以外。至于居住者，在经济活动活跃的城市就业中心，以及相对外围的街道，他们都更倾向于选择在本街道就业。居住者平衡指数最高的25个街道中，有12个位于中心城区外围的边缘地带、8个位于经济活动活跃的就业中心或次中心。无论其成因为何，两类指数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都在提醒规划、决策者：单纯追求某一空间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与住房在数量上的平衡，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住平衡。



## 受教育水平对职住平衡影响最显著

在了解职住失衡的宏观程度后,我们再让故事回归微观,回到李亮一家。

安家回龙观后,李亮仍然在朝阳门附近工作,这意味着他每个工作日都有两小时以上时间挤在地铁上。他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主要是因为家里有小孩,孩子更需要跟妈妈相处。某些时候,他见到回龙观商场里的售货员或餐馆里的服务员,也会感慨自己“何不就近工作”,但只是感慨而已,多年苦读、出身名校的他始终还是选择跨过半个城市,去从事那份收入更高也更有前途的白领职业。

市场化就业环境下,实际平衡指数反映的“职住失衡”更多是就业者或居住者自主选择的结果。影响李亮一家做出选择的因素,也影响着北京其他居民。首先是受教育程度:高技能劳动力(及相应行业)会对应较低的就业者平衡指数,这是因为与之匹配的就业机会更为稀疏,需要就业者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搜寻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此外,如果一个家庭人口较多,那么在选择居住地时就需要权衡家庭内多个就业者的工作地,这会拉长每个就业者的职住空间距离。而有小孩的家庭,家长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往往会选择在较近的地方工作;另一方面,女性就业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也会尽可能地缩短通勤时间。

李亮没有过多考虑的一些因素,对职住平衡指数也存在较大影响。如使用公共交通设施的便捷程度,尤其是一个区块附近地铁站的可达性越高,就业者选择相隔较远的就业-居住地点的机会就越大,就业者平衡指数会因此被拉低。又如就业者所在单位的属性——尽管大院模式正在逐步瓦解,但历史路径依赖仍然存在,国有、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的职住关系仍存在明显差异。

利用北京市第四次交通综合调查数据包含的信息,运用定量模型,研究者检验了以

上因素对职住平衡指数的影响大小。对就业者平衡指数,就业者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私营企业就业比重和地铁便利性的影响较为接近,且都不如受教育水平的作用重要。对居住者平衡指数,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受教育水平,私营企业就业比重次之,而接下来的家庭规模、家中有适龄儿童比重和地铁便利性的影响都较为接近,影响最不显著的是男/女性居住者比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模型检验的因素之外,某些制度性约束也会造成职住分离。郑思齐举例说,北京市中心的存量房周转率过低,便是政策管制没有放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因为很大一部分公房和房改房都还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即使这些住房的原有居民不再需要在市中心居住,也不能被置换出来,目前在市中心就业的家庭也无法购买这些住房。另外,保障房选址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职住需求,也是一个增强职住分离的常见制度性约束。避免这些约束,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是目前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可以做的。

## 调整公共资源分布是更为可行方案

2014年11月28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正式开业,成为“睡城”天通苑首家三甲医院。12月5日,回龙观第二家三甲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也开始运营。2015年1月13日,位于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核心区的天皓成服装市场被正式摘牌,在其背后,是“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提速。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希望能减轻交通拥堵的压力,那么,在职住失衡难以简单调节的背景下,在其他方面做出的调整会有多少收效呢?

职住失衡出现后,巨大的上下班通勤压力和因此造成的交通拥堵就是它最为直观的社会成本。为测算北京市交通的拥堵情况,研究者将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数字化,测算了各个街道的拥堵指数。通过对比8:30、12:30、18:30三个时点的观测数据,他们证实了北京工作日的拥堵高峰与上下班

高峰同时出现,而非通勤时间的12:30,全市交通较为畅通。北京市交通拥堵的分布情况也不受季节变化影响,采自6月与10月的数据基本一致。

不过,交通拥堵只是与职住失衡有关吗?研究人员不这么认为,他们在定量模型里加入了优质公共资源——即三甲医院和重点小学供给的集中度,以及道路供给三种变量,经过计算发现:职住分离程度、医院供给的集中度和小学供给的集中度三种因素对交通拥堵的影响程度较为相近,且比较明显,道路供给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郑思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道路供给会引致新的交通需求,所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疏解拥堵的效果,这种影响只限于一个街道区块内,不能认为增添道路无助于缓解整体拥堵。

既然这些因素与交通拥堵有关,那么调节它们自然也就有利于缓解拥堵。研究者对此给出了预测。作为就业中心的CBD地段,对职住平衡指数的变化较为敏感,若将那些职住比特别高的街道的职住比调整为所有街道的75%分位点值,职住比特别低的街道调整为25%分位点值,农展馆、金融街、中关村等区域的交通拥堵状况都会得到10%左右缓解,建外街道的拥堵指数下降则会超过20%。

若使优质公共资源的分配全面均等化,交通拥堵的缓解也是相当明显的。如调整重点小学分布不均,将改变49个街道的交通拥堵情况,拥堵指数平均降低接近8%,北大附小所在的燕园街道拥堵改善量近10%。而三甲医院的调整则会改变36个街道的交通拥堵情况,拥堵指数平均降低8.14%,北医三院、北医六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所在的街道交通拥堵改善幅度接近12%。显然,相比调整职住平衡度,调整公共资源分布是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案,其收效也未必会比调整职住关系逊色许多。

(实习生王珮雯对此文亦有贡献)

□ 编辑 崔世海 □ 制图 姜静



# CHINA PEOPLE 大沉浮

时代人物的命运



NEW  
最新上市



機密檔壹



機密檔貳



美國知識分子



三地書



中國意見書



中國貪官錄

## REPORT OF CHINA 我們這樣報道中國

紀念《鳳凰周刊》創刊十周年，傾情推出十年精品文叢，首批七本盛大面世。

《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机密档 壹》台海兩岸未公開檔案；《机密档 貳》被遮蔽的歷史；《美国知识分子》40位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思想家；《三地書》最具影響力的台港澳三地100本大書；《中国意见书》百位著名學者國是論衡；《中国贪官录》2000-2010:250位貪官檔案；即將推出：《中國群體事件檔案》轉型期的社會衝突及樣本研究；《紅牆中南海》以第一手的圖文資料和回憶文章，還原中南海清晰真實的歷史畫面，展現共和國鮮為人知的政治風雲。

徵訂熱綫 010-84606197 /  
angecy@ifengweekly.com



## 境外NGO面临监管严冬

大陆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拟确立公安部门为登记机关，并加强对境外NGO资金来源及使用的管理。

记者/马军

当被问及“你们公司最近运营状况如何”时，李易达无奈回答：“已经没有‘我们’了，我关停了公司运转的业务。”

李易达此前负责一家旨在帮助中国大陆教育事业进步与提升的民间教育机构，并不盈利。但由于背景相对复杂——经费来源涉及到部分海外基金，该机构始终无法在大陆注册为非政府组织(NGO)。为了便于行动，李只好将其注册为工商企业，即使这样每年多付出一些税款。

去年夏天起，大陆官方开始调查这家“企业”的背景，该机构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无奈之下，李易达于不久前关停了该机构一切业务。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李易达所在机构这样带有一定海外背景的民间组织，以及国际NGO在华分支机构等，目前在大陆开展活动的达数千家，但并未有专门的法律对它们进行规范。

“无法可依”造成两难：一方面是官方抱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难以治理，另一方面则是境外NGO感叹在华开展工作艰难。

2014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审议，这是大陆首部针对境外NGO的专项法律。

该法律草案也引发在华的涉外NGO人士关注。李易达告诉《凤凰周刊》：“我们挺希望有这么一部法律的，起码能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做NGO，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不过，该草案目前还仅是初审，何时二审、

三审，何时通过、生效，官方尚无明确信息。

### 立法初心“政治优先”

根据大陆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起草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主要目的在于以法律形式约束越来越试图深入中国政治的境外NGO。

上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伊始，大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境外NGO有较大的空间。世界宣明会、乐施会等境外著名NGO纷纷通过对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等慈善活动进入大陆，并致力于改变大陆落后的经济面貌。

在此之后，境外NGO在华发展进入蜜月时期，如绿色和平组织、美国环保基金会等环保组织；儿童基金会、美国妈妈联谊会等儿童救助类组织遍地开花，活动内容十分广泛，救助地区也日趋扩大。

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统计，目前在大陆长期活动的境外NGO超过1000个，如果算上在华开设短期项目的境外NGO，总数可能超过6000个，每年通过境外NGO流入中国大陆的资金可达数亿美元。

境外NGO带来了国际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对中国的科技、民生、公益事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华部分境外NGO开始转向政治领域，通过对政治、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的关注试图影响大陆政治走向，也由此逐步引起了官方的警惕。

近年一些被媒体披露的维稳案件，官方或多或少将原因归结至有境外NGO参

与。大陆官方有人士称，目前活跃在中国的数千家境外NGO中，至少有数百家背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渗透目的，甚至有少数在华进行非法活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曾公开指责，在华的部分NGO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透过大陆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等系统，在国内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并结合国内热点，以“维权”等名义煽动民众对中共产生不满与对立情绪，这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稳定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目前，大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可以依据的法规仅有两部。一是1989年6月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管理对象主要是外国商会，即境外在华活动的商业机构和人员。二是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有一些对外国基金进行管理的相关条款。但上述两项法规只涉及到商会和基金会这两种境外组织形态，对于多数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的管理一直无法可依。

为此，中共高层提出“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展开活动”，这一要求也被写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大陆官方也开始着手研究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但立法过程并不透明，此番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前，外界对于立法内容及立法进展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 条文重在严苛管制

据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是由公安部与民政



部共同起草,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的。该次会议上,就草案向与会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做出说明的提请审议人为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

草案确立了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制度。具体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及其授权的省级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授权的组织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代表机构和临时活动许可的事前审查。

由公安机关对境外NGO进行登记,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焦点。虽然大陆目前并没有法律对国内NGO的登记机关进行规定,但按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NGO的注册登记机关为民政部门,部分省市甚至早已取消了登记单位、管理单位双重管理的规定。

这意味着,在华的境外NGO将面临着比境内NGO更严苛得监管条件。

草案对境外NGO资金来源、使用的规定亦比国内NGO严苛得多。草案规定,为了确保境外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和使用合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大陆境内活动资金限于境外合法来源的资金、境内的银行存款利息和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的其他大陆境内资金。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大陆境内募捐、接受大陆境内捐赠。

草案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大陆可以开展在经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的活动,但不得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

此外,草案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未取得临时许可的,不得在大陆开展活动,不得委托、资助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大陆开展活动。

该立法草案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乎一致认为立法很有必



► 近年来一些境外NGO对中国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的深度介入,引发了大陆官方的警惕。图为某国际NGO在北京西郊一燃煤发电厂前组织人员,准备拉横幅抗议碳排放超标问题。

要,一些与会委员、专家和人大代表甚至还表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还可以借鉴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经验。2013年4月,俄罗斯司法部宣布,已经要求法庭关闭将近9000个NGO的活动,接近6000个组织面临罚款。此外,整个2013年俄罗斯联邦拿出23.2亿卢布资助本国NGO。

个别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草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担心,对于境外NGO的资金来源进行如此严苛的管制有可能不利于中外学术交流。如果法律规定中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经许可的资助,那么国内的大学就无法和国外大学合作共同进行研究,这可能对中外学术交流带来麻烦。

## 法案细节有待厘清

对于该项法律的立法,多家境外在华NGO讳莫如深,不愿多加评论。这些NGO最为关注的是草案中对于登记机关的规定

以及资金使用的约束。

一些NGO人士表示,目前该法律草案的诸多条款和细节仍稍显模糊,有待厘清,尤其是“防止政治活动”等规定还相当粗糙,用于指导NGO从事在华活动并不够明晰。

草案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从事或者资助盈利性活动,不得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在有关法律责任中,草案还列举了诸如破坏民族团结、搜集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资助中国境内组织及人员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活动、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安全等违法项目。

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范徐丽泰对此提出,打击反华势力很有必要,但在大陆活动的境外NGO也有真正做公益的,必须要考虑平衡问题。目前草案条文比较粗,对于已经在境内服务或者是资助科研活动的,或者是推广专业水平的境外NGO,似乎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草案看完后,会让人怀疑是否禁止了一些本来并不想禁止的活动。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也表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立法十分必要,但要把“狼”和“羊”分开,要把好的来华非政府组织与境外敌对势力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做更加精准和定量的区分,他希望能够法律中体现一个清单管理的概念,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列于法律条文之中。

不过,就目前提交一审的草案来看,草案中对于禁止境外NGO从事政治活动的负面清单列举过于模糊,给执法机关留下了过多的执法空间,对于如何认定非法政治行为以及如何界定“不良政治目的”并没有详细解释。

此外,草案对于如何约束登记管理部门(即公安部门)的行为也着墨不多。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目前大陆的境外NGO管理中,执法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于境外NGO行为的认定权几乎都掌握在公安部门手中,非政府组织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和空间。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显然还任重道远。●



# 报告：农村进城女性从事性工作原因探析

大陆首份由女性性工作者团体做出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城后从事性工作的原因的一个全新视角。

记者/徐佳

**信**爱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信爱”）2014年底完成了一份报告——《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信爱是一家以女性性工作者为工作对象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8年。负责人蓝蓝也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

“什么因素让这些农村女性选择从事性工作？”“性工作究竟给这些农村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蓝蓝在大大小小的政府会议或学术讨论中，总要被各色人等问及这些问题。于是，她想通过报告回答人们的疑问。

这是大陆首份由女性性工作者团体做出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城后从事性工作原因的一个全新视角。该报告样本数偏少，但由于其特殊性，仍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 让好奇发问的人自己去看

信爱文化传播中心的成立缘于蓝蓝的改变。

2008年，从事性工作的蓝蓝接触了北京一家与艾滋病相关的民间组织。在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之后，蓝蓝感到十分后怕：“我过去的行为实在是太有可能得艾滋病了”。

在恐惧中自费完成全套身体检查之后，蓝蓝下定决心转行。“过去我是非常看重钱的”，蓝蓝说，“自从知道了艾滋病，我就想，我要是死了，钱还重要么？”

作为曾经的“圈内人”，蓝蓝深知在低档场所工作的“姐妹们”患病的风险有



多大，于是，蓝蓝联合几位朋友创立了“信爱”——取意传递自信和爱。

作为一名“特殊行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前性工作者，参加大大小小会议的时候，蓝蓝作为“圈内人”的经历常被好奇的人们问起。有人认为，从事性工作的人都是“被强迫的”、“需要被解救的”。蓝蓝会反驳：“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她们”。

最终，蓝蓝决定写一份报告，让好奇发问

的人自己去看，女性性工作者到底是什么样。

《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是一份以谈话内容为主的报告。自2014年1月开始调查，历时一年，共访谈了37位1970年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其中性工作者21人、非性工作者16人。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自低档场所，非性工作者主要涉及小摊贩、工厂女工等。

在进行访谈前，蓝蓝将访谈对象都聚



在了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讲述自己的故事、做游戏,试图让所有受访者都能打开心扉。

“在活动举办之前,我很担心,怕那些非性工作者知道这里面有性工作者会直接离开”,蓝蓝说,没有想到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哪怕是一些有亲密肢体接触的游戏,非性工作者也没有表现出不满或尴尬。

## 一声“宝贝”让她感动

蓝蓝最希望用报告回答人们经常问她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报告分析了受访对象的家庭背景、经济压力、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等因素。在这些方面,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存在很强的共性,“都处在社会底层”:她们经历了中国农村经济逐渐凋敝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外出打工同学的衣锦还乡。但当她们进入城市后,发现城市并非遍地黄金,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她们时时感到贫困的危机。也就是说,贫困并不足以解释那些进城务工的女性为什么选择从事性工作。

但蓝蓝在访谈中发现,在共性之外,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性工作者往往比非性工作者更缺乏家庭支持。她们有离婚的,没有离婚的也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报告认为,“原生家庭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是促使她们选择从事性工作的因素之一。

接受访谈的性工作者中半数是非婚或丧偶女性,且没有再婚。而多数离婚的性工作者,大多净身出户,还要独立抚养孩子。即使是那些仍在维持婚姻关系的,也并不和睦。

多位受访的性工作者提到,虽然客人的素质高低不一,但是她们在从业后才体会到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与温存。作为受访对象出现在项目报告会上的小梅说,从事性工作后,她第一次听见一个男人对自己叫了一声“宝贝”,“叫这一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

另一位受访者小琪也说,她和丈夫的

感情一直很淡薄,夫妻生活就像是在“履行义务”,“没有交流,只有配合”。2010年左右,小琪遇到一位“实在、温和”的河南客人,“对我特别好,和他在一起,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小琪甚至说,“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情人。”虽然小琪现在还在从事性工作,但她坦言,“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 “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小琪所说希望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蓝蓝还会经常面对进一步的追问——“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社会大众往往只看到性工作的危险以及脆弱性,比如暴力、性病风险、道德谴责”,报告称,“很多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走出性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挣钱太多。但性工作带给这些女性的只有钱吗?只有钱才是她们留在这个行业的唯一原因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性工作对她们还有别的吸引力”。

蓝蓝认为“70后”农村进城的性工作者对于工作和钱的想法很简单:“她们挣钱是为了谋生,为了家庭。前几天,我要去趟香港,一个姐妹让我给她带瓶几十块钱的香水。我说香水没有这个价位的,她就说太贵不要了。她们是很俭省的,赚了钱全都给了家里”。

这种对家庭的“经济付出”,让这些女性重新获得了在家庭中的地位。

“以前,老公就认为我在家带孩子不累,而且不仅不挣钱,还花钱”,小梅对比从事性工作前后的差异时说,曾经看着丈夫检查自己的钱包,每次给娘家钱都要受

**从事性工作后,她第一次听见一个男人对自己叫了一声“宝贝”,“特别特别感动”。**

到丈夫的盘问和白眼,而如今“家里我说了算,给娘家钱根本不需要汇报”。

小梅曾经对穿金戴银回到家乡的小姑娘嗤之以鼻:“有手有脚为什么卖肉?”2000年,小梅去广州打工,最开始,在足疗店的小梅“很清高”,后因接受不了工资差距而低头——收入差了“四五倍”,原来做正规工作一个月只能挣1000元。时隔多年,小梅却在报告会上说:“不后悔做这个行业”。

受访者小琪也说,给家里带回去的钱多了,丈夫和公婆对自己的态度都有改善。

“以前每次回家都被要求做很多家务,现在回家他们基本不会再这么要求了。很多事情都不用我做了。”

看起来,吊诡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因为家庭关系不和睦而选择从事性工作之后,却令她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

报告还提到,“性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她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注重自己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她们知道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虽然她们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在世俗的标准。”

在被问及发布这样一份报告是否担心被质疑为“性工作者正名”的时候,蓝蓝愣了一下,她说,这个问题她第一次被问到,蓝蓝说,她们做这份报告是为了让外界更了解这个群体。“我记得茶花女,名叫玛格丽特,”《茶花女》中的一个情节让蓝蓝印象深刻:“她死了以后,很多上流社会的女人也去参观她的房间,好奇这个交际花的生活,吃穿用度”。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则认为,报告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内地第一份由服务于性工作者的草根组织完成的报告。“由自己的组织发声,更能代表这一群体。以往我们再怎么研究,也始终不是圈内人,无法像她们一样深入”。⑨

(应受访者要求,蓝蓝、小梅、小琪系化名)



## 中国加强多边援助再进一步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多边援助的重要性，除了向Gavi认捐，更典型的例子则是开始在非洲采取多边主义政策。

记者/邱锐

**双**边援助一直是中国大陆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但因透明度不足等原因，这种援助方式令中国被一些人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而最近的多种迹象显示，中国对外援助开始朝更加注重多边援助的方向发展，以力图改变上述成见。

1月27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全球疫苗联盟（Gavi）筹资大会上，中国政府首次向Gavi认捐，承诺在2016-2020年期间捐款500万美元，用于加强全球免疫事业。Gavi是一家致力于为贫困国家提供疫苗接种的公私合作机构，曾让4.4亿儿童获得了接种，并加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引进疫苗工作。中国此次所捐助的资金，将同Gavi筹集到的总额75亿美元捐款一起，为世界3亿原本无法获得疫苗的儿童提供免疫接种，进而预计避免500万-600万人死亡。

Gavi融资与捐助者关系负责人张丽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国的捐赠是该国与Gavi良好关系的重要体现。早在2002年，Gavi就和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Gavi曾协助中国西部及中部省份引进乙肝疫苗。自此以后，中国部分地区出生后即接受第一剂乙肝疫苗接种的新生儿比例由64%攀升至逾90%，五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感染率由原先超过10%降至1%以下。2013年10月，该机构还帮助中国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肝炎疫苗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是中国疫苗产品首次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意味着该疫苗可正式进入联合国机构的采购清单。

而在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程峰看来，此次捐赠的更大意义则在于，中

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进行援助，也就是进行多边援助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大多采取直接确定受援国，然后为该国提供技术或资金的方式。这种援助形式被称为双边援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熊厚统计，无论哪个时期，中国多边援助的数额均远远低于双边援助数额。上世纪70年代，多边援助仅占总援助额的0.08%，此后略有增长，但直到2007年，多边援助比例也只上升到3.41%。程峰则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多边援助的占比稳定在40%左右。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占比巨大的中国双边援助还常被部分国外人士和机构指责为“支票簿”政策：援助项目缺乏透明度，且主要为了让中国本国公司集团获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编辑Naim M. Rogue则于2007年将中国对外援助形容为：“本质上不民主，实践上不透明”，其动机是完全自利而非有利于受援国，其结果“对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并会创造一个更加腐败、嘈杂和独裁的世界”。此外，还有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与前殖民大国“抢劫搜刮”非洲的行径雷同，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等国是在进行“新殖民主义”。

对此，不少国内专家建议，为化解上述误解，在提高援助透明度的同时，中国还应增加多边援助的力度，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来提高中国援助效果与国际影响力。正如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增加多边援助，而不是不透明的双边援助。”

而现在，如程峰所言，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多边援助的重要性，除了前文所述的向Gavi认捐，更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政府开始在非洲采取多边主义政策。

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于2013年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相比之下，同时段美国对非援助总额也仅约900亿美元。虽然援助规模巨大，但常有非洲官员抱怨称，中国建造的一些基础设施质量低劣，且在工程建设中使用来自中国（而非本地）的劳动力。2014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首次出访非洲期间也承认，中国与非洲伙伴的关系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在此背景下，当年5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融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根据非洲开发银行自己的信息资源来向非洲的“主权担保”或是“非主权担保”的开发计划提供融资。换句话说，中国部分援非资源将交由该基金处理，而不是中国自己决定。对此，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在签署协议时评价道，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非洲采取多边路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非洲关系专家德博拉·布罗蒂加姆则撰文指出，这支新基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然多边银行对腐败和挪用公款挑战并没有天然免疫力，但它们确实有利益相关者试图以一个透明的程序对它们问责。”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黄静



# 大陆政治捐款在澳引风波

有分析认为，王子春和周泽荣等人的捐款，难以摆脱权钱交易的商业目的，甚至可能左右澳洲政策走向。

特约撰稿员 / 蔡源 记者 / 孙杨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有中国背景或直接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正大幅度地渗入澳大利亚各政党及选举活动中。

今年2月，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公布2013至2014财政年度各大政党收到政治捐款的详细账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名字引起了澳洲记者和政治观察员的兴趣。此人在上一个财年给澳大利亚的在野党——工党捐献了85万澳币(约合412万元人民币)。而这笔捐款，是该财政年度澳洲所有政党收到的个人捐款中数额最大的一笔。

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开的捐款记录显示，该名中国捐款者的名字是Zi Chun Wang，地址为石家庄桥西区雨花西路112号。据澳洲媒体追查，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和老干部管理局位于此大楼内。

消息一经披露，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不小震动。一时间，澳洲乃至全球的各大媒体都开始追问“谁是Zi Chun Wang”，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质疑，这笔“政治献金”是否有中共官方背景。

虽然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只要是以个人或者企业的名义捐助给澳大利亚某党派或者选举委员会，数额和捐款人信息透明公开，那么即使是外国人捐款也不违法。但仍有人担心，外国势力的渗入会左右澳大利亚的选举及未来政策走向。

## 大陆背景金主震动澳洲政坛

经过全球多家媒体的调查证实，这名神秘的中国捐助者身份很快便“水落石出”，他是河北永昌集团的副总经理王子春。

由于永昌集团的英文名字为“Ever

Bright Group”，一度有澳洲媒体联想公司可能与中共政府管理的骨干国企——中国光大集团有关。对此，永昌集团做出回应，确认王子春为公司雇员后，强调他的捐款纯粹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经查，永昌公司上世纪90年代末从河北起家，早期业务为工程装修。2004年收购河北中建工程有限公司后，开始涉足房地产业，2007年业务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目前涉及房地产、投资、建筑、国际贸易等领域。未来目标是完成从地产到矿业、农业、基础设施等多元产业整合，最终上市。

引发澳大利亚政坛关注的不仅仅是王子春这一笔捐款。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公开的资料还显示，澳洲两大政党的另外一个大金主也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13-2014财年，一家名为“Australia Kingold Investment Development”的公司分别向工党以及目前的执政党自由联盟党捐助了63.5万澳币、20万澳币；另一家名为“Hong Kong Kingson”的公司也捐献了52万澳币，其中44万给了自由联盟党、8万给了工党。而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广州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

在大陆，周泽荣是华南地区有名的地产大亨。在2003年胡润“中国大陆百富榜”中位列第24名。2014年，他在胡润百富榜上的最新排名为第112名，目前身家约130亿元人民币。身为澳籍华人，周泽荣在澳洲也是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今年年初，由他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币建成的周泽荣博士大楼启用，因大楼造型独特以及



## 九九归一·义重情长

— 经典重启 —

一个品牌，  
承载着百年重九起义的深厚记忆，  
凝聚着一代人实业救国、  
振兴民族工业的爱国魂，  
饱含着浓浓爱国情、兄弟情、战友情……

悠悠岁月，义重情长，  
穿过百年的烟云，  
我们追寻着关于重九的记忆，  
演绎着新的经典与传奇……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http://www.hyhhgroup.com))



## Summary of Donations reported by Donors - By Party - 2013-14

Registered Party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

View Summary Export Summary

Found 72 donations

Page size

20

Go

Donor	Total Amount -	Donated To
Zi Chun WANG	\$850,000.00	ALP National Secretariat
AUSTRALIA KINGOL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PTY. LTD.	\$600,000.00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
Australia Chinese Business Elite Awards Pty Ltd	\$260,000.00	ALP
Village Roadshow Limited	\$227,500.00	Australian Labor Party (National Secretariat)
Communications Electrical Electronic Energy Information Postal P	\$200,000.00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

## Donor Annual Return - 2013-14

Zi Chun WANG

Donations made to:

Name	Address	Date	Value
ALP National Secretariat	519 Sydney Avenue BARTON ACT 2600	08 Aug 2013	\$485,000.00
ALP National Secretariat	519 Sydney Avenue BARTON ACT 2600	08 Aug 2013	\$365,000.00

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政治捐款详细账目中可以看到，王子春 (Zi Chun Wang) 向工党阵营的捐款额位列第一，为85万澳币。这也是2013至2014财年中，澳大利亚各大党派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工党是澳大利亚最大、历史最长的政党，前党首陆克文、吉拉德都曾出任过澳大利亚政府总理。但在2013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反对党联盟赢得大选。

系澳大利亚首次以杰出华人名字冠名地标性建筑而成为澳洲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据澳洲媒体透露，周泽荣和澳洲朝野两党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上至总理下到州长，都和他有私交。2004年，周的女儿 Winky 曾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Bob Carr 的幕僚。而这位前州长在2012年3月到2013年9月间担任了澳洲外长一职。

2006年-2008年，周泽荣曾向当时执政的自由联盟党捐助了98万澳币，向在野的工党捐款40万澳币。时任澳洲总理霍华德曾表示：“他对澳中关系的发展是非常真诚的

关注，我从来不与他讨论捐款的问题。”

## 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出现“井喷”

近年来，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越来越多地进入澳大利亚公众的视线。最近的一次“井喷”出现在2013年澳洲大选前夕。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资料，有中国背景的捐助者占前十名的近半壁江山。

最新一个财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周泽荣和王子春的捐款比澳洲本地的大财团和传统上支持工党的工会单笔捐款还要多。澳洲最大的医疗集团“Paul Ramsay Holding”在上一

个财年贡献了62.5万澳币。和工党关系密切的工会CFMEU则捐助了56.6万澳币。令澳洲媒体大跌眼镜的是，为工党捐款排名前五的大金主，四个是华人。

提及原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党议员幕僚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华人政治捐款在上一个财年大幅提升，一定程度归功于深受华人喜欢的中国通总理陆克文。虽然在陆克文执政期间，中澳关系一路跌到冰点，但是喜欢秀普通话的陆克文是华裔选民的最爱。正是在他重新成为总理之后，华人社区的捐款呈‘井喷’式的增长。”

也有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澳洲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和移民走出国门，企业和个人热衷向业务所在国或定居国的政党捐款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于需要竞选资金的澳洲各大政党来说，似乎也没有理由拒绝财大气粗的中国豪客。

但是，政治捐款和行贿受贿的差别有时并没有那么明显。比如，曾有中国背景的开发商试图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也在澳洲引起了不少疑虑。有分析人士认为，王子春和周泽荣等人的捐款，难以摆脱权钱交易的商业目的，甚至可能左右澳洲政策走向。部分澳洲工党内部人士也怀疑王子春不是真正的捐助者。有党内人士甚至认为，王子春可能是所谓的“白手套”，由他代为出面，帮有着复杂背景的“红顶商人”捐款。然而截至目前，这种猜测尚未得到证实。

巧合的是，就在捐款名单公布当天，澳洲总理阿博特宣布，将推出更严格的外国人采购现房措施，对国外投资者购买澳农业用地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和报告制度，并加强外国人购买澳房地产的限制，确保“澳大利亚年轻人不被挤出市场”。

对此，大陆各界反应低调，但在澳大利亚，有老一辈华侨警告，如果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政府政策，可能会对整个华人社区带来不必要的影响。

## 外国人政治捐款在澳引争议

实际上，向澳洲政界捐款的并非只有中



国人,澳大利亚各党派一直接受外国个人和公司的捐款。一个名为Lord Michael Ashcroft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就经常为澳洲自由党捐款动辄近百万澳币,2014年捐了25万澳币。另外,德意志银行、新加坡电信等知名外国公司,也出现在本次捐款名单上。

虽然澳大利亚尚没有向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一样,通过全国性立法禁止外国人在其国内进行政治捐款,但是澳洲界对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政治献金都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怀疑,一些州还自行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昆士兰州的法律禁止本州政治团体接受来自外国的政治献金;新南威尔士州禁止接受非选民的政治献金,但在本地注册的外国公司还是可以向各大政党捐款。

澳洲联邦法律尚没有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献金,但是联邦议会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05年的一份议会报告称,虽然国外政治献金是一个问题,但是议会的调查尚未发现有外国势力染指澳洲立法机构。

2010年10月,正在执政的工党曾在下议院推出修改澳洲联邦选举法的议案,其中一条正是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献金。据当时负责选举事务的议会委员会称,此举将制止外国人和外国公司对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环境进行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参加澳洲选举。时任澳大利亚特别国务部长格雷(Gary Gray)表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除外界认为外国政治献金可以影响澳洲政治的疑虑。”不过,由于工党没有控制上议会的参议院,所以议案至今都没有通过。

之所以推出此项议案,也是因为当时工党正陷在被舆论指责的外国政治献金漩涡中。2009年,澳门赌王何鸿燊出现在当年的政治捐款名单中,他曾向当时的工党政府捐献超过一百万澳币。不过最后,工党总部拒绝了来自赌王的50万澳币捐款,时任助理全国秘书长马丁(Nick Martin)称:“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工党总部认为不应该接受这笔捐助。”

但是工党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党支部却接受了何鸿燊140万澳币的政治献金,其中一笔60万澳币的捐款,来自赌王在澳洲黄金海岸的一个投资公司,也是当年最大的一笔捐款。消息曝光后,有媒体称“因为何鸿燊是陆克文的朋友”,对此,当时的反对党参议员唐纳森(Michael Ronaldson)质疑道:

“何先生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回报?陆克文到底知不知道这一笔政治献金?”

在澳洲,是否应该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澳洲禁止接受外国人政治捐款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澳大利亚应该效仿西方民主国家,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献金。

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不得接受外国人、和政府有契约关系的人、国家银行、公司、工会、以第三者名义进行的捐赠;日本的选举法也明令禁止接受外国人的政治献金。日本前外长前原诚司因在不知情情况下接受了在日韩国人25万日元的政治献金,被迫引咎辞职。

在一篇名为《民主和现金:竞选经费改革之危险》的报告中,澳洲独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诺顿(Andrew Norton)认为,限制外国人捐款是不公正的。因为公开资料显示,澳洲来自外国的捐款只是全部政治捐款中的0.2%。不过旋即有人指出,这一数据是根据2004-2005年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得出的,现在早已过时。

诺顿还专门提到了周泽荣。他认为周并不是外国人,而是澳大利亚公民,家人也都生活在悉尼,只是本人长期在中国。而且,周在悉尼不但有产业,更经营着一家华文报纸——《澳洲新快报》。

目前大概有80万澳大利亚公民生活在海外,如果立法禁止外国来源的政治献金,也意味着生活在海外的澳洲公民不能对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要知道,新西兰允许外国籍的永久居民投票,英国也允许英联邦国家的居民投票。”诺顿说。



## 九九归一·清甜香醇

— 经典重启 —

造物钟秀,含英咀华,  
土壤、阳光、雨水……  
天时地利的谐和,  
高原玫瑰、薰衣草、迷迭香……  
香料植物相伴种植,  
品质天成的自然意境,  
尽显清甜香醇。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http://www.hyhhgroup.com))



## 频繁空难重创台“空中巴士”

2007年以前，岛内最便捷的南北交通方式是飞机，但高铁建成后，台湾岛内航班便成明日黄花，风光不再。

记者/马军

2月4日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河空难发生后，曾经在台湾高雄义守大学交换半年的小董心揪了起来。一方面，半年的台湾生活让其对发生在台湾的惨案格外悲伤，另一方面小董也为一件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后怕。

“我是2007年初去的台湾，那时候去台湾只有从金门中转一条路”。2008年两岸直航以前，像小董这样的交换生赴台只能走“小三通”，即厦门经金门再至台湾本岛的线路。其中从厦门至金门需要坐一小时左右的快船，而金门至台湾可以坐慢船，也可以搭乘飞机。

“我当时坐的就是复兴航空的班机。我一上飞机就傻眼了，刚拿到票的时候还觉得飞机怎么这么便宜，坐上飞机才知道具体原因：飞机非常小，行李架很窄，稍微大点的行李就放不下，只能放脚底。座位也很窄，我只能侧着身子坐着。”小董身高接近一米九，体重在180斤以上。在形容其在座位上的坐姿时，小董脸上还是显示出了些许扭曲的表情。

小董还记得，当时他坐在飞机的第一排，空姐并没有自己的空间，飞机起飞后空姐从驾驶舱拿出一把椅子，坐在了机舱的门口。“一般的飞机空姐都在飞机最后面休息，我是第一次见到空姐坐在第一排的。”

“飞机里非常吵，因为机翼上的螺旋桨是外置的，像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那种飞机。因为飞机特别吵，遇到气流颠簸得也非常厉害，我和我身边的同学开了个玩笑，说这样的飞机是不是安全，结果这话被空姐听到了，她对我说飞行员都是台军方退役的飞行员，飞行技术绝对没有问题。”

“我记得当时自己嘟囔了一句‘是不是



► 2015年2月4日，救难人员乘坐橡皮艇在水面上。由于只能从复兴航空班机唯一的逃生门抢救生还者，多数人只能围观兴叹。

真的’，结果这句话让空姐听到了。”接下来的事情让小董大吃一惊，“飞机飞行了三十分分钟后开始降落，我已经看到了台北的盆地地貌和101大楼，结果这时候飞机向一座山俯冲，即将冲到山的时候又开始拉高，机舱里好多行李都倒了。飞机落地后，驾驶员从机舱里出来说‘我真的是台军方退役的飞行员’”。飞机降落前的俯冲与拉高，是飞行员与小董之间开的一个“玩笑”。

2月4日小董第一次从微信朋友圈看到复兴航空班机低空掠过台北市高楼的照片时，他还以为这是当年那个驾驶员又和其他乘客开了一个玩笑。但当其看到完整的飞机撞桥视频时，小董才真正相信，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 “空中巴士”或风光不再

2007年以前，台湾岛内最便捷的南北交通方式是飞机。但台湾高铁建成之后，台北至台南、高雄等南部城市的车程缩短为2小时左右，台湾岛内航班便成明日黄花，风光不再。

但台湾境内的航班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台湾高铁并未惠及台湾东部地区及离岛，台湾目前仍保留着台北至台东的岛内航线及台北、高雄等都市至金门、马祖、澎湖、绿岛等离岛航班。

在诸多离岛航班中，此次坠机的复兴航空公司ATR-72型客机相当受欢迎。对于居住在金门等离岛的民众来说，复兴航空等公司提供的这类廉价航班一向被视作是便宜、便捷的“空中巴士”。

在台湾，几乎每条街道都能找到方便购物的超商与便利店，在这些遍布全台的便利店里可以轻松购买到此类航班的机票。与大陆及香港相对繁杂的购票手续不同，在便利店购买机票与购买一般商品并无二致：只需输入自己的姓名、证件号码和想要搭乘的航班日期，就可以在便利店完成购票手续。

在航班起飞当天，购票者可以随时前往机场乘坐当天的任何一趟航班，从便捷程度来说，搭乘此类班机往返台湾本岛、离岛之间与乘坐巴士或高铁往返台北与台南、高雄并无差异。

以金门为例，全岛目前仅有两万民众生活在岛上，年轻人几乎全部在台湾本岛就业，对往返其间的班机相当依赖。台湾民间长久以来流传的一个笑话或许能印证此类



航班的重要性：在金门、马祖等地，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候选人形象，也不是政党动员，而是天气和航空公司。

对于管制并不十分严格的此类班机而言，恶劣天气下航班是否起飞往往取决于机长或塔台的临时决定。也正因如此，在选举日航空公司是否加开班机往往决定了投票结果。2012年“立委”选举时金门选区某候选人落选后就曾将落选原因归结为“天气不好，航班停开，许多支持者无法回到金门投票”。

去年7月23日，复兴航空一架ATR-72型客机从高雄飞往澎湖马公机场时，因台风“麦德姆”造成飞机降落不顺利，于澎湖县坠落，造成机上人员48人死亡、10人重伤。据台湾媒体报道，该航班在台风天气下原定取消，但在乘客的强烈要求下，机长临时决定冒雨起飞才最终酿成惨剧。

2008年两岸直航之后，虽然大陆民众赴台有直飞、游轮等诸多方式，但“小三通”因价格低廉、时间灵活颇受大陆游客，尤其是低价旅行社的喜爱。以厦门至台北为例，直飞航班单程价格往往在千元以上，厦门至基隆的游轮单程价格也在千元左右，而搭乘复兴等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金门到台北才人民币500元左右，算上厦门至金门的百元左右船票，全程价格在600元人民币左右，十分低廉。

金门县当局和复兴等航空公司也看上这块商机，2015年元旦起，台湾开放金门给大陆游客提供落地签证的便利，到金门的游客可直接飞往台湾。此举旨在吸引更多游客赴金门旅游，也为金门至台湾本岛的航线招揽乘客。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获悉，造成大陆游客重大伤亡的此次航班已大幅降低了陆客经金门赴台的意愿，台湾离岛民众十分依赖的“空中巴士”或就此失去大批大陆客源。但对“空中巴士”而言，这还不是最大的危机，频繁的空难或许给复兴等运营此类航线的航空公司更为重大的打击。

## 航空公司遭遇重创

作为台湾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成立于

1951年的复兴航空可谓历史悠久。在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两大巨头几乎占据了台湾国际航线大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复兴航空公司在两岸直航与台湾离岛航线上注力颇多。

2006年9月台湾开放两岸紧急医疗包机业务后，复兴航空就与国际SOS公司合作，展开两岸紧急医疗包机的业务，并提供一部分医疗转送服务。在2014年公布的复兴航空国际线航点一览表中，复兴航空33个航线中，大陆占了14个。

但半年内两次坠机让复兴航空深陷迷雾，不仅原本被称做“空中巴士”的ATR-72型飞机被讽刺为“空中棺材”，公司本身的运营也因此受到重创。

复兴航空自1995年起，一共发生过14起飞行事故，共造成至少55人罹难，其中ATR-72型螺旋桨客机造成的事故就有8起。此次坠河空难与去年的澎湖空难遇难飞机均是该型号的飞机。其中此次遇难飞机是去年复兴航空刚刚购入的新机。

频繁的空难已让民众对ATR-72型螺旋桨客机产生极大的不信任，这对复兴等航空公司大部分由该机型执行的离岛航班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原本春节期间航空公司可以大赚一笔，但空难却给台湾航空业浇下一盆冷水。

此外，高额的赔偿也让原本盈利就不佳的航空业者步履艰难。根据台湾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每位空难罹难者的赔偿金最低为700万新台币。去年7月的澎湖空难，总共48人遇难，复兴航空共赔偿3.84亿元新台币。台湾方面已经宣布，此次空难将会比照澎湖空难标准，赔偿每位亡者1490万新台币。

复兴公司的上市财务年报显示，该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仅有2.9亿，远不如最近两次事故的赔偿总额。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已经表示，复兴航空公司频繁发生空难，需要进行全面的检讨。这也意味着，即使复兴航空挺过了巨额赔偿这一关，公司的运行也将面临政府的制裁。



## 九九归一·方便交谈

经典重启

一场交谈，拉近你我距离；  
一场交谈，增进相互感情；  
一场交谈，创造未知机遇；  
一场交谈，决定局势发展；

.....  
这，就是交谈的力量。

方便亲切交谈



(详情敬请登录 [www.hyhhgroup.com](http://www.hyhhgroup.com))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 全面深化改革， 减少行政审批还不够

记者/赵福帅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提出了多项重大改革，2015年可谓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落实之年，财税、金融改革与审批制改革等将继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企改革等料将出台具体方案。

围绕2015年各项改革如何具体落实等议题，《凤凰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卢锋认为，各领域改革目前进度不一，财政改革超出预期，金融改革暂时放缓。取消下放审批远远不够，尚需配套改革与长效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真正落实则需彻底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国有企业应在充分竞争环境证明其合理性。对内外资反垄断审查的具体操作尚待完善。

## 改革进展不均衡

记者：您如何观察十八大之后中国各具体领域改革的进展？

卢锋：最近两年多改革其实有重要和突破性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标志改革共识确立，中国制度转型总体进入到又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改革无论在设计、范围、深度，还是决心与推进章法，都是一段时期内前所未有的，可以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较。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什么领域改得快些，什么领域改得慢些，取决于不同领域动态的情况演变，决策者可以部署，研究人员可以观察，不过实际情况很难预测。各具体领域的改革必然是不平衡的，不会齐头并进。

我们原以为金融方面的利率、汇率改革会快一些，但财政改革反而有些超出最初预期。如新《预算法》会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预算将起到界定政府权力的作用。其次，今后预算要逐步做到全口径，要经过人大审批，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也会逐步做实。最后，会加快转移支付的改革，从项目转移到一般转移。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会加快调整。

记者：刚提到的金融改革遇到的障碍是哪些？

卢锋：比如汇率放开后，可能出现长期升值趋势叠加短期波动，可能给目前稳增长带来不便。去年余额宝对存款利率有一个冲击，可能也引起银行业内部的反弹。银行准入改革，给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批准了几个营业执照，然而力度似乎没有预期的大。

记者：哪些改革的具体思路还需要完善？

卢锋：比如行政审批的取消、下放，这个政策是好的，跟市场化改革是一致的，就是要把政府的行政之手放进制度规范的笼子里。但是如果没有更深层的体制性的突破，仅仅是减少行政审批，是不够的。

过去宏观调控的概念很宽，一旦出现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府很可能用一些行政干预方法来应对。就是说，现在取消的一些审批，有不少并非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而是过去一段时期内作为宏观调控措施引入的。

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又和政府权力过大有关。前一阵发改委官员发生贪腐案例较多，客观上也是跟发改委权力大有关。发改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部门，干预管制经济举措只要

跟宏观调控挂上钩，就可以理直气壮去做，客观上给寻租创造便利。

所以简政放权、取消审批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必须有配套的改革，建立起真正的长效机制，彻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包括对宏观调控范围、对象、工具的科学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把减少审批的改革成果巩固下来，真正让改革不可逆。但这一点还需要有更多关注、探讨和重视。

## 厘清政府、市场边界

记者：有观察认为，新型城镇化仍然是中国政府主导推进的，似乎并不看好？

卢锋：这个概括有一定道理，因为整个中国经济都是政府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概括也有局限性，因为城市化很多方面演变结果并不是政府主导时政策取向想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又不能完全主导，最后还有规律在发生作用。

如1980年代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进城，政府要搞小城镇，不让农民进大城市，在特殊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甚至说农民工是盲流，不让流动。但是最终农民工和城市化的力量还是冲破了这些藩篱。

另外大量小产权房在相当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具体落实之年，其关键还是要管住政府那只  
闲不住的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



程度上给农民工进城后定居、工作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但在法律规制层面则属于灰色区域,甚至是非法的。然而,这种在现行体制边缘的演变突破,客观上助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现有的工业化进程,为大量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里面有大量矛盾的不合理现象,但从中国转型发展大背景看,仍有其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所以,新型城镇化也必然是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作用互动的过程。从一个角度看,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民间参与各方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受到市场和经济规律的推动。

**记者:**很多评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并不乐观。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落实?

**卢锋:**从政治角度,过去北京市的虹吸效应使得各种优质资源都汇聚过来,对周边地区发展带来一些特殊压力。地区利益不平衡的调节需要有京津冀协同发展。

从经济角度看,区域经济由于要素空间配置规律的作用,很多分工组合本来就会超越行政边界,市场联系本身也没有绝对的行政区划的限制。实际上,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跨行政区经济协作思路。不过中国行政力量强大,行政区划对市场经济活动在很多方面多有限制,不利于跨区域地有效配置资源。

所以京津冀想要真正实现协同发展,就需要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的配合,即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新界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这一配套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难以实现。

京津冀的行政区划是否改变,相关政府架构怎么变,这是相对独立的问题。但是必须让各种要素能够更自由地跨越行政区划流动,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不再画地为牢,行政力量不再扭曲市场。把断头路都修通,慢慢淡化户口,最后让老百姓自己决定住在哪儿,让市场自己决定延伸到哪儿。

## 应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记者:**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国有企业改革要奔着问题去。您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卢锋:**国有企业要想发展,必须在比较充分的竞争环境下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任何种类企业的首要检验条件。

虽然改革开放已35年,中国国有企业体制和素质条件有了很多改进提升,但目前财务盈利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大都还是在一些垄断或高度准入管制的行业,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而且,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大多早已剥离,国企整体仍较大程度依赖各种管制保护,是不合理的。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工业国有企业的利润接近三分之二来源于石油、电力等五大不同程度垄断性部门,民营企业利润来源最多的行业跟这五个行业一点



交集都没有。不是民营企业不想进去,是政府不让它们进入。即便这样,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仍大幅度低于民营企业。

现在决策层试图采取混合所有制破这个局,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民营企业有它们的考虑,如果不能占主导地位,它们可能没有多少积极性。所以混合所有制到底能推进得怎样,在操作上能否真正见到实际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是一块“硬骨头”。

**记者:**近期中国对外国企业展开的反垄断调查又该如何解读?这是有针对性的吗?

**卢锋:**中国对外国企业政策近年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总体是合理的。因为早年间中国缺少资本,招商引资,给了外资很多优惠条件。现在讲国民待遇,要一视同仁,就意味着对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减少管制,同时减少对外企的特殊优惠,使得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平等地竞争。这是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另外,近期出现了一些对内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当然外资企业被关注度要高一些。对垄断的市场力量加以适当的关注和监控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特定方面和必要内容。从操作层面,反垄断审查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怎样使它运作得更加合理、透明、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符合老百姓利益,很多问题都还值得深入探讨和完善。

中国需要大量的小微企业创造就业和搞活市场,但同样需要一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这是因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通常处于产业和技术前沿,它们的合理发展对于提升经济结构水平具有特殊意义。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策方针,还是要鼓励大企业在平等竞争背景下,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继续健康成长,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 编辑 王华强 □ 美编 青年



## 大陆千万丙肝患者获药受阻

只要新型丙肝药物能够在中国上市，千万丙肝患者就可不再受传统疗法副作用的折磨。然而，这道曙光却被大陆现行药品进口制度所阻挡。

记者/邱锐

回想起26年前的那场手术，白宝明至今也说不清，它到底是救了自己还是害了自己——手术将他从风湿性心脏病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却让他因输血而感染丙肝。

丙肝是由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引起的广泛传播的传染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约有1.7亿人感染丙肝，遍及世界各地。中国是世界丙型肝炎的高发区，感染者约为1500万。这种疾病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而且与乙肝不同，该病目前尚无疫苗。

从2004年开始，白宝明开始接受治疗，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治疗丙肝的标准方法——注射干扰素加口服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血液中多项指标严重异常，39度多的高烧持续好几天，全身严重牛皮癣，8个月瘦了20多斤……”白宝明扳着手指——向《凤凰周刊》记者列举。令他更加沮丧的是，即便承受如此严重的副作用，治愈率也只有80%左右。

2013年，在病痛中挣扎的白宝明看到了一丝曙光。从这年年底开始，美国、欧盟以及日本陆续上市了多种新型治疗丙肝的药物。这些药品纯口服、副作用小、疗程短、治愈率95%以上。换句话说，只要这些药品能够在中国上市，白宝明等千万丙肝患者就可不再受传统疗法副作用的折磨。

然而，这道曙光却被大陆现行药品进

口制度所阻挡。在国外丙肝患者得到医治的时候，这项制度让国内丙肝患者至少要再等待数年时间才能合法拿到新型药物。同样受影响的，还有以各种罕见病患者为代表的其他人群。

### “死也不用干扰素”

与白宝明相比，同样是丙肝患者的李素萍（化名）要痛苦得多。今年60岁的李素萍是北京市某机关的一名退休职工。2010年左右，热爱游泳的她渐渐发现，原来每次游1000米都不费劲，现在游到一半就体力不支。更严重的是，她全身开始发红，稍稍一碰就发紫。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丙肝。大夫怀疑她是在1981年生孩子时被感染上了丙肝。得知自己得病之后，李素萍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既怕受到别人歧视，又怕传染给家人。于是，她急切地接受利巴韦林加干扰素疗法，甚至还要求医生加量注射。

单独利用干扰素治疗丙型肝炎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而用干扰素加利巴韦林治疗丙肝则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北大人民医院副院长、肝病研究所主任魏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如果患者能够坚持下来，目前普通干扰素加利巴韦林的治愈率在50%左右，换成进口的长效干扰素则能提高到70%至80%。

然而，接受治疗成为李素萍“最后悔的一件事”。

其实，在最初到医院接受治疗时，医

临床数据失真甚至让中国医药界进入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这既耽误了药品的上市时间，也占用了其他药品的评审资源。





院门口发生的一幕就已经让李素萍心惊胆颤。她看到，一位患者见到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会下跪磕头，口中念叨“救救我，救救我”。家属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强行拉走。医生告诉李素萍，这位患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干扰素可能导致精神分裂、抑郁等精神疾病。一些病友还告诫李素萍，已经有很多人因干扰素的副作用而自杀。

据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黄长形等人的研

究，用于治疗丙肝的干扰素除了可导致感冒样症状、精神系统改变、脱发、疲乏、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等常规不良反应外，还可导致神经精神系统、自身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肺部、眼部、皮肤等组织器官共计30多种偶发不良反应。

但治病心切的李素萍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干扰素治疗。从2011年4月到2014年5月，李素萍已经花费了近30万元，但

病毒并没有得到完全抑制，而干扰素带来的副作用却让她的血小板含量、白细胞含量等指标逼近生理极限。到最后，大夫已经不敢再继续给她注射。而在治疗前还能买菜、做饭的李素萍，现在基本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头发、牙齿几近掉光，只能靠老伴照顾。“打死我也不用干扰素了”，李素萍落寞地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她现在每天只是吃些中药来进行调理，希望能活到国



2012年11月1日，青岛，被查出患有戈谢病的女婴小雪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戈谢病人群发病几率为五十万分之一。

外新药进来的那一天。

李素萍所寄希望的“国外新药”是吉利德、艾伯维等美国药企于2013年12月陆续推出的以Sofosbuvir（索非布韦）为代表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世界卫生组织给《凤凰周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DAA类型药物在3个月内的治愈率即可达95%，而且副作用远远小于干扰素等常规疗法。上述疗效得到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承认。2014年5月24日，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WHA）还通过决议，要求各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应对肝病的流行，敦促各成员国对DAA药品采取“强制许可、平行进口”的政策。

## 药品进口流程漫长

然而，这种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媒体统计，国外药品进入中国，走完一套流程往往需要6到7年时间。

在药品进口流程中较为耗时的一个环节是药品临床试验。1999年，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发布“进口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对进口药品实行注册审批制度。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再在中国病人身上进行一次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之后，药监部门会对结果进行评审，然后再决定是否能够进入中国。

从理论上来说，在批准制度上严格要求对保障国人身体健康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药监部门的人手严重不足。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负责新药注册的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新药评审中心。该机构正规编制是120人，其中从事一线审核的技术人员不到80人。而且这些人还需负责中药、西药以及独立病例评审等多项工作。



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13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显示，2013年，药品评审中心全年受理新注册申请7529个，完成评审并呈送国家总局审批的评审任务4491个。换句话说，每年这80人需要完成近6000个审评，平均每人负责75个。相对应的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药品审评中心却有4000多位审核员，只需审评不到3000个申请。

人手不够，手续却很繁杂。中国实行的是临床试验审批制，也就是说，国家要求国外新药必须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后才能进入国内。而临床试验又需要相关部门的书面批件，得到允许之后，才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开展试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目前已通过审批有资质进行临床试验的机构，多为各地的三甲医院，总数不到400家，远远满足不了每年数千种新药试验的需求，因此新药往往需要排队一年多才能有临床试验的资格。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姚大林曾在美国FDA工作13年，专门负责决定药物最终能否上市的审批。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

美国，FDA收到申请人的IND（新药申请书）资料后，自收件日起30天内如无异议，申请人即可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而且任何一个有行医执照的医生都可以做临床试验。

## 中国临床试验数据严重失真

比手续繁杂更耽误时间的是评审效率低下。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试验临床数据严重失真。北京经纬传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临床研究数据第三方稽查的机构。该公司董事长蔡绪柳直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目前国内临床试验研究基本在走过场，编造数据、美化数据更是普遍存在。”

蔡绪柳曾多次看到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被频繁修改，有些监查员（代研究者）更在稽查员检查表格时，凭回忆现场补填各种空白表格。此外，试验没有按要求访视、试验时合并使用其他功能相互干扰的药物、随意评价不良事件等现象也比较常见。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法律对临床试验数据造假处罚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国内医生没有意识到临床试验的重要性，而且其本身的工作也特别繁忙。



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网负责人汪金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直言：“有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审评通过的目的，联合统计单位修改数据，有些企业胆大到把试验组和研究组的数据直接掉个。”

事实也证明了上述专家的观点。2012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了134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结果发现，其中38家需要整改，占总数的28.5%。其中，问题较严重的23家由国家局跟踪其整改情况，另外15家由省局跟踪其整改情况。

另一件事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2013年6月，FDA发布消息称，一款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被延时三个月，因为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查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试验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的24个数据提出质疑。

“从那以后，来中国进行临床试验的国际药厂数量锐减”。蔡绪柳认为，临床数据失真甚至让中国医药界进入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因为评审人员对报上来的数据充满怀疑，而且对药品质量又承担终身责任，所以审批只能一切从缓，甚至让提出申请的药厂多次返工，补充材料。这既耽误了该药品的上市时间，也占用了其他药品的评审资源。

这种低下的效率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丙肝人群，还有中国1000万的各种罕见病患者。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黄如方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目前已经在美国等地上市了近400种治疗各类罕见病药品中，能在中国买到的不到100种。

“思而赞”是上述能够在中国买到的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之一。它可治疗戈谢病，一种因身体缺少某种分解酶，进而导致代谢物无法分解，造成患者肝脾肿大、骨骼病变的疾病。然而，该病患者邹正涛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等了十年才在国内市场买到此药。

## 目前已经在美国等地上市的近400种治疗各类罕见病药品中，能在中国买到的不到100种。

### “绿色通道”难落实

对许多国家来说，进口药品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在美国，新药申请的常规审批过程为10个月。抗癌药等重要新药则可进入快速通道，6个月即可完成审批。”姚大林说。

审批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拥有统一的标准。199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布鲁塞尔启动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简称ICH），通过协调，为药品研发和审批上市制定统一的国际性指导标准，以便更好地利用临床、药理学和药理数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加快新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发使用，满足“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这三大原则。换句话说，一家药企如果做完相关临床试验，得到几个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在别的国家就不需要再重复三期临床试验，可直接获得审核批准。自ICH启动之后，包括巴基斯坦、蒙古、中国台湾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接受了这一标准。新药在美国药监局获批2到3个月后，就可以在当地上市。但中国例外。

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种特殊才不能接受上述标准呢？姚大林否定了这个疑问。他解释说，人种差异的确会在某些细胞表面受体特性上体现出不同，导致某些靶向药物在某个人种有效，在另一些人种无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药物Erlotinib（中文名埃罗替尼），只对一些少数族裔患者药效十分明显，尤其是亚裔中不吸烟的女性病人。然而，绝大多数药物都没有种族选择性，区分仅在于成人或儿童（剂量差异）以及性别（因临床适应症而异）。

蔡绪柳认为，阻碍中国接受ICH的因素包括国内药品研发技术水平不高，难以在标

准制定方面取得发言权等，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行业利益——“在中国临床试验数据普遍不被采信的情况下，一旦接受ICH，包括国内药企在内，谁还在中国做临床试验？这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利益”。蔡绪柳说，只有当中国临床研究数据真实可靠，审评有据可依时，药品进口审批进度才可加快。

面对中国引进新药速度较慢的现状，白宝明只能另辟蹊径。现在电商如此发达，能否通过这种形式进行海外代购，直接从美国等地购药呢？这条路仍然受阻。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刑法修正案第八条则规定，“只要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

2014年发生的“抗癌药代购第一人”被捕案影响甚广。一位名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利用网购的信用卡为很多病友从印度代购了治疗此病的仿制特效药“格列卫”。为此，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消息爆出，几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请求对陆勇免于刑事处罚。所幸的是，2015年1月30日，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

但代购的风险并未消除。2014年7月，白宝明联合一百多位丙肝患者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一封联署信，希望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对创制的新药、治疗疑难危重疾病的新药实行特殊审批”，来加速药品进口审批流程。黄如方等罕见病患者也同样希望借助这条“绿色通道”让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尽快入华。

几个月后，白宝明接到国家食药监局的回电。白宝明说，一位女性官员十分客气地转达了该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我们对你们的情况感同身受，也希望能尽快通过药品审核，但我们也只是一个职能部门，没有权力来特批。”



## 美国FDA原法规审评督察官姚大林： 中国应为短缺药品制定专门法规

记者/邱锐

“中国法规监管部门应积极采用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监管制度，特别应完善针对病人急需，而国内却短缺的药品专门管理法规，尤其是‘救命药’。”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姚大林严肃地说。

姚大林1999年至2012年间曾在FDA工作13年，先后出任药品审评中心药理毒理学审评官、法规合规部高级评审及优质非临床研究实验室法规(GLP)督察官等职位，负责美国新药评审和法规依从性审查监督等工作。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成立于1906年，是美国联邦政府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相当于中国卫生部)下属的食品药品监管执行机构。其职责是确保美国本国生产或国外进口的食品、药品等的安全性和医药产品的有效性，信誉和专业水准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目前，许多国际厂商都以获得FDA各类认证作为产品品质的最高荣誉和保证。

《凤凰周刊》记者日前就中美医药进口制度比较等问题专访了姚大林。姚认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法规管理实践，美国政府药品监管体制和法律法规已经完善，除管制性药品外，对国外进口药品原则上没有限制，对登记的进口商的药品，只要FDA按法规履行监管职责后予以放行，即可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 审批不分“国内”、“国外”

记者：据媒体统计，因手续繁杂，一款国外新药进入到中国国内需要6-7年时间。



姚大林

假设某一国家研制出一种新药，这种药品应当如何进入美国？时间会有多长？

姚大林：我曾审评过许多外国药企研发的新药，包括一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申请。有趣的是，FDA的审评专家对申请人及其申报的新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并不关注或在意，基本没有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这种概念，因为无论对谁，执行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因而他们对“国内”与“国外”的申报数量也不做分别统计。

因此，无论是美国国内药企还是国外药企，都要向FDA提交研究新药申请材料，按照FDA新药审评审批的程序，在药学、药理学、药效学和临床前安全性数据支持下，一步一步完成临床试验和上市审批。

具体来说，根据药品特性，美国FDA将药品笼统地分为创新药和仿制药两大类。对于创新药，凡是递交到美国FDA申请新药注册的产品都要通过IND(试验新药)和NDA(新药申请)两个阶段。

FDA收到申请人的IND资料后，自收件

日起30天内如无异议，申请人即可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虽然没有接到任何官方通告或通知的文件，但相当于拿到了中国所称的“临床批件”)；在此后的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过程中，FDA相关药审部门都会紧密追踪和评审申请人递交上来的所有研究资料，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新增临床试验方案或方案变更。

三期临床试验基本完成时，申请人即可递交NDA资料。FDA收到NDA申请后45天内，需要答复申请人是否接受其申请并正式进入NDA新药审批程序。一个新药申请的常规审评过程至审批规定为10个月，但某些重要抗癌药可进入快速通道，仅仅6个月即可完成审批。

对于仿制药，其简略新药申请大体与新药申请一样，但不必提供药理、毒理、临床等资料，只需要提供“简略新药申请依据”，援引仿制自哪种已上市品种，而能否批准上市主要取决于该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结果如何。

记者：相比两国新药引进制度，美国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姚大林：美国对于其国内短缺药品所制定的专门管理法规，很值得我们借鉴。对于短缺药品，FDA主要着眼于解决临床上必需药品的短缺问题。FDA对“必需药品”的定义是，“该药品用于预防或治疗严重的或威胁生命的疾病”。FDA一般通过外部资源，如医护人员、企业、媒体、消费者团体来获得短缺药物的信息，或通过FDA的行政执法监督发现短缺。FDA内部设有专门处理药品短缺的部门，并有一套完整的处





►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成立于1906年，其职责是确保美国本国生产或国外进口的食品、药品等的安全性和医药产品的有效性。

对药物的选择性远比国人大得多，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各国中最高投入的医药研发和生产能力、高度集中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另一方面与其药品进出口管理法规完善和行政程序宽松也有关系，使得外国的新药、好药或美国短缺的药品进入美国相对容易。近年来，中国医药企业的新药研发投入在不断增加，政府对新药研发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如果法规监管部门积极采用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灵活监管制度，相信解决目前国内医药市场存在的上述问题和窘境是指日可待的。

**记者：**为了减少重复试验，欧盟、美国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都加入了人用药品注册协调会议（ICH）。你认为大陆是否有必要加入ICH？

**姚大林：**1990年，美国、日本和欧盟三方的政府药品注册管理部门和制药行业发起成立了ICH这个架构。之所以由这三方发起，是由于这三方的制药工业产值约占世界总额的80%多，所使用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占了世界药物研究总投入的90%或更高，集中了国际上有经验的药品审评和研发方面的专家学者并汇集其智慧，因而成立之后二十余年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要求方面的指导文件。

ICH的指导文件（Guidance）属于技术文件，并非法律或法规，没有强制性法律效力，但由于其高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目前世界各国药品工业界的新药研发工作基本上都在遵循ICH的各项指导原则进行。

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实力决定话语权，ICH的发起及其影响的广泛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随着大陆新药研发和生产能力以及药品注册法规建设的长足进步，大陆将是国际上有关机构包括ICH不可忽视的力量，对ICH的参与度毫无疑问会逐渐增加。🌀

理药品短缺的程序。中国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则有待加强。

## 买卖未受批准药物同样犯法

**记者：**中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已经处罚甚至刑事拘留了不少违法者，也在打击印度药品流入国内的渠道。美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规定？

**姚大林：**美国同样认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为犯罪行为，而且此类犯罪的成本要比在中国高得多。

前段时间广受舆论关注的一位癌症病人为自己也为其他病友从印度直接网购抗癌仿制药格列卫（Gleevec）而被拘捕的案例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没有售卖假药并从中牟利的主观动机，但事实上又直接触犯了中国的药品法，因为该药未经中国药品法规部门批准上市。

此类案例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法律与人性相悖的故事，但究其实质是药品短缺和如何从法律层面解决进口药品难的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药品法的这项规定，很可能会出现假药劣药泛滥。被公认为药品法规管理最科学和严格的美国也时有上市药品因种种原因而召回的事件发生。因此，《药品管理法》的这项规定对于保障广大民众用药安全、防止假药流入及药品走私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回到这个案例上，那些濒死边缘的癌症病人迫切需要新药来挽救生命，“死马当作活马医”可能是他们绝望中的唯一希望。但如果没有法规管控，如何能保证私自从印度或其他国家购进的所谓“救命药”是安全有效的呢？

我认为，解决民众急需用药短缺的问题应该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相关部门应立即采取积极行动和有效措施，对国内短缺的用于预防或治疗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进口药品，采取特殊政策，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建立快速放行通道，以挽救病人生命。

需要承认，在新药研发和生产领域，中美两国的确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两国民众所能享受的医疗药品的品种和质量也有一定差距。以抗肿瘤药为例，美国癌症病人



# 日东京大学“解禁”军事研究

现在日本的军事技术研发尚处于“冰河时期”，防卫省在军事研究中投入不少资金，却见效不大。首相安倍晋三常年钻研国防领域，深谙防卫省研发痼疾，因此积极推动大学参与军事研究。

记者/林子敬

**被**誉为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如今被认为“沦陷”了。

2015年1月16日，日本《产经新闻》抛出一则爆炸性消息，称东大理事会认可学校进行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1959年，东大最高决定机构评议会做出全面禁止军事研究的决定。在上述报道中，如今，东大55年的反军事研究姿态开始“崩溃”。

“实际上，这是一则被夸张曲解的报道，《产经新闻》的报道背后有其逻辑和目的。这则报道再次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科研两用性的论战。”日本军事评论家清谷信一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可以看到，现在日本国民以及教师对大学参与军事研究的抵触情绪有所下降，这与日本政府近年重视军事研发有关，也涉及到日本防卫省资源不足的问题。”

## 被视为“眼中钉”的东大科系

东京大学信息理工学系2014年12月修改的《学科指南》称，“许多研究有军事利用以及和平利用的两用性。本学科的研究方针认为，每个研究者应该在良知之下，深刻理解研

究的两用性，推进具体的研究。”

该《指南》过去的版本明文写道：“与军事相关的研究，一律不得参与。”而今，明确的禁令转变成暧昧的用语，因此被《产经新闻》夸张称为“东大解禁军事研究”。事后东大对外部门解释，虽然信息理工学系变更指南是事实，但是大学整体上并没有解禁军事研究。

一时间，舆论也开始指责《产经新闻》夸大事实。对此，日本一家大型报社的政治记者饭田哲也指出，事情并非这么单纯。“东大的信息理工学系早就被《产经新闻》盯上了。”

2013年4月《产经新闻》刊登题为《东大：忌避军事之巢》的报道，批判东大患有“军事过敏症”，碰到军事相关的课题就退避。报道中，其多次将矛头指向《学科指南》，因为东大明文禁止从事军事研究的只有这一学科。当年11月第185回国会的文部科学省委员会中，众议员柏仓祐司还引用此报道，批判东大的研究“意识形态偏颇”，认为东大身为国立大学，利用全国纳税人的资金，却拒绝在能够保障国人安全的国防领域进行研究。

其后东大代表在质询中表示，学校并没有明文禁止军事研究。东京大学所有学科都在《东京大学宪章》的约束之下，《宪章》只是规定：“大学的研究应该为人类的和平以及发展有所贡献。”

2014年7月，防卫省为了寻找自卫队运输机的故障原因，向东京大学教授发出邀请协助调查，然而大学方面以东大方针禁止军事研究为由予以拒绝。

饭田透露，虽然当时舆论有利于东大，但是安倍政府还是看不惯他们的表现，东大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减轻“敌视”，东大在2014年12月悄悄修改了《学科指南》，只是没想到被《产经新闻》大肆宣扬出去。

引发争论后，东京大学校长滨田纯一在学校官网上发表了一则“耐人寻味”的声明。虽然他表示东大将坚持战后不参与军事研究的一贯立场，但是最后提到了研究的两用性，暗示不能因为研究有可能应用于军事就得回避，得看具体内容而定。

此外，滨田校长的《声明》中多次用到了“研究让国民安全和安心的技术”等国防推进派的“政治词语”。近年来，为了缓解“国防”和“安全保障”等让人联想到战争的词语，日本很多文件都以“为了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予以替代。所以有人担忧指出，东大表面是敷衍社会，其实正逐步解除参与军事科研的规则壁垒。

## 军事研究成为诱人“果实”

2015年6月，日本经产省将带团赴美参加“机器人大赛”，团员包括各个大学的研究机构。大赛主办

近十年，日本为了促进竞争，开始减少对大学的定额补助，增加特定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因此，军事研究成为一个诱人的“果实”，很多大学也在逐步放松“警惕”。



方为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其设立宗旨是挑选能够让军事技术进步的民间企业,给予其资金和资源支持。

“当前是一个技术相互衍生应用的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都是来自军事科研成果,却引发了社会和产业的变革。日本在材料、航空以及电子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最先进行列,这些技术都能与军用发生联系,事实只是让日本的经济产业界受益匪浅。因此不能因为涉及军用就回避研究。”众议员柏仓祐司2013年批判东大时,引用的理论依据正是科研的两用性。

对此,名古屋大学宇宙物理学名誉教授池内了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科研两用性是很复杂的问题,至今科学界对此仍有争议,不过“提出它是为了概括历史的现象,即发现了军事科技和民用科技相互转化运用。现在诸如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等政府机构反过来将科研两用性作为一种手段,意图推动军事科研或者民用科技的发展。”

日本政府也是实践者之一。除了防卫省,日本内阁府推出了“资金支援革新研发推进项目”,该项目相当于是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日本版”,已经支援了包括“镭射和等离子技术融合”和“超越超级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等民间科研项目。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也主张利用科研两用性实现产业振兴。

池内了表示,强调科研两用性会给国民一种印象——为了振兴日本产业、为了日本的科研水平能够在世界拥有一席之地,大学应该参与军事研究。但由于日本的特殊性,主张科研两用性的人只能强调军事技术研发是“因”,民用是“果”,没有人会反过来说。他认为,对于大学而

言,参与军事研究还关系到学校的存活。“10年来,日本为了促进竞争,减少对大学的定额补助,增加特定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因此,基本上每个大学都苦于缺乏资金,军事研究成为一个诱人的‘果实’,大学也在逐步放松‘警惕’。”

2014年12月,日本《保密法》正式生效。对任何国家来说,如果大学研究者被课以保密的义务,国民可能无从对此进行监督。此前7月,以池内了为首的47名大学教师发起了“反对大学和研究机关参与军事研究的网络署名”,他担忧地表示:“一旦大学放开参与军事研究,可能就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 亟须打破防卫省科研“痼疾”

据清谷信一介绍,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时,当时政府本来计划向现场投放防卫省技术科学本部以及大学分别制造的原子炉侦查机器人,最终使用了大学制造的机器人,防卫省的由于品质不行而没有投入。

“国防机构的科研能力还拼不过大学,其研发能力也受到质疑。”清谷指出,日本防卫省基本上没有能力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今年1月发生的“伊斯兰国”绑架人质事件中,防卫省没有能力收集海外基础情报,其科研水平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因此,近几年来,防卫省开始和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6年,统管自卫队科研领域的防卫省技术科学本部新设了“先进技术推进中心”,开始启动国防和大学的合作研究。但由于很多大学抗拒与防卫省的合作,因此实际的研发工作只能交给民间企业,比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军工企业。

不过,国防产业高度依赖基础理

### 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和高校合作项目(部分)

年度	合作方	研究内容
2006年	信息处理推进机构	技术信息交换
2008年	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	舰船领域
2010年	东京工业大学	气压计测以及操纵技术
2011年	东洋大学	疲劳度调查研究
2012年	横滨国立大学	无人小型移动体的操纵
2013年	九州大学	炸药检测技术
2014年	千叶工业大学	三维地图构筑技术以及恶劣环境下的物体移动技术

注: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数据,目前有8个大学以及11个研究机构与防卫省缔结共同研究协定。截至2014年7月,共同研究项目有27个,呈逐年增长态势。

论研究和制造工艺,军工企业虽然技术,但是基础理论能力不成熟。此前防卫省科学技术本部让富士重工制造无人侦察机,最终没能成功起飞。

“这些军工企业几乎垄断了政府的军工订单,无论有没有能力生产,先抢下订单再说。他们早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清谷信一评价说:“现在日本的军事技术研发尚处于‘冰河时期’,防卫省在军事研究中投入不少资金,却总是生产一些能力差但是价格高昂的国产兵器。安倍在自民党内常年钻研国防领域,深谙防卫省研发痼疾,因此积极推动大学参与军事研究。”

2013年12月,安倍政府推出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写道,“防卫省应该充实和大学以及研究机关的合作,积极将可能应用于国防的民生技术进行运用。”2014年,为了加强与大学之间的合作,防卫省设立了“技术管理班”,并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缔结了共同研究协定。防卫省提供竞争激励资金,预计3年内达60亿日元,研究项目据说包括给航空自卫队配备的F2战斗机的后继机体开发。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 印度平民党重取新德里

平民党的出现是顺应了普通印度人对反腐和不公的呼吁，哪怕他们缺乏实际的执政能力。

记者/嘉沐

**时**隔1年，印度平民党(AAP)再度杀回新德里。在2月10日新德里地方立法会选举中，平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70个席位中的67席，曾经攻无不克的印度人民党只获得了3席，百年老党国大党则颗粒无收。

曾经的印度政坛黑马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再登首席部长宝座，连象征平民党的竞选标志物——扫帚，近期也在网络上走红。扫帚是平民党竞选标志物，意在强调该党致力于清除贿赂和腐败文化，扫除贪腐政治。

外界评价称，由于总理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自上台以来从未在邦议会选举中遭遇过挫折，本次失利，让上台后形象强势的他“很没面子”。

由于人民党目前并未控制联邦院(议会上院)，因而莫迪的议案在那里会受到压力。《印度斯坦时报》称，今后几年，莫迪必须在大部分地方选举中获胜，才能重新巩固政治影响力，令他得以继续推动各项改革。不过，对于平民党的获胜，莫迪大方地在推特上发表祝贺称，“为了新德里的发展，中央会全力支持凯杰里瓦尔。”

不过，在人民党那些更有手腕的政客眼里，这个受首都民众追捧的党派恰如“泡沫”一般，上升得很快，但也会随之破灭。“这就好像有男生求婚时向女生许诺了很多，但最后一个也实现不了。”来自人民党内

部的一位领导曾私下向《凤凰周刊》记者如此评价。

## 顺应民意

印度网民将凯杰里瓦尔唤作“围巾男”(muffler man)，和莫迪的“魔术男”(magic man)相对应。“围巾男”在选举前的最近一次采访中称：“如果我没有赢得选举，直到最后一口气，我都会努力争取一个没有腐败的印度。”

这番动辄表真心的态度着实管用。去年5月印度大选期间，《凤凰周刊》记者在圣城瓦拉纳西围观了当时的投票现场。在这个人民党的印度教大本营，仍有人数寥寥的平民党志愿者耐心地向周围的选民散发宣传单。一位名叫Supoiya的“90后”女生说，虽然平民党经验不够，也有很多人质疑他们，但印度需要这样敢于向权威抗衡的人。

午后的恒河岸边，软件工程师Jay Ram Singh不顾烈日，用大喇叭吆喝着平民党的竞选方针。听到记者谈及“偶像”凯杰里瓦尔，他兴奋地从头上取下象征平民党的小白帽递了过来。“要知道，这个国家15%的人在享受，大部分人在受难。我们早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所以需要新鲜血液。平民党的崛起，证明大家认可我们所代表的是平民，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组成部分。”

当时成立还不到两年的平民

党，其高人气直逼两大政党。它的募资公开透明，与其他党派遮遮掩掩的选举募资形成对比。2013年印度最轰动的政治电影《浴火民主》，反映了中产阶级为反对政府腐败及不公正制度的大型起义。影片中那位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主人公，其原型被很多人认为是凯杰里瓦尔。

印度贝拿勒斯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Kamal Sheel告诉记者，2012年新德里公交车轮奸案发生后，激起民愤，很多年轻人起来呼吁印度要改变。“平民党的出现也同样是顺应了普通人对反腐和不公的呼吁，哪怕他们缺乏实际的执政能力。”

近年来频发的腐败丑闻，让印度民众在谈及选举议题时首先提及腐败，他们认为这是印度海外形象下降的祸端。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贪腐案、电信2G牌照项目丑闻，2012年煤炭贱卖丑闻，每起案件都令人瞠目结舌。前两起案件导致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通信部长等人锒铛入狱，后一起案件激起反对党“封锁议会”行动，导致议会完全瘫痪。

英国《经济学人》曾粗略估算，印度贪官通过权力寻租所获取的暴利或在40亿-120亿美元之间。文章指出，尽管印度政府多次宣称反腐，但是印度司法体系纷繁复杂，不少法律执行不力，调查机构五花八门而不少职能互相重叠，以致办案效率低下，因此腐败问题一再恶化。



两年前，印度知名活动家安娜·哈扎尔领导了多起全国规模的反对贪污抗议运动。2012年在创办人不明的网站“我行贿了”上，印度网民不断地分享自己的经历，讽刺腐败遍布生活所有环节。20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6%的印度人认为腐败正在拖累国家，92%的印度人认为腐败现象在过去5年愈益恶化。

激烈反对核电是平民党给外界的另一个印象。他们曾联合在印度深具影响力的反核电组织“人民反核电运动”（PMNE），共同抵制核电项目建设。逐渐地，它吸引了数百新兴候选人参加此次选举——从记者、学者到环保人士、商业领袖，不一而足。

## “更成熟了”？

作为新兴党派，平民党也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号召海外印度人为该党捐献资金。该党高举反腐的政治理念为其赢得了众多海外拥趸，海外捐款也成为其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去年据当地媒体披露，该党选举期间筹集的475万美元竞选资金中，超过30%来自海外印度人。

47岁的凯杰里瓦尔曾揭露巨富穆克什·阿巴尼跟政客勾结的腐败行径，还有索尼娅·甘地的女婿罗伯特·瓦德拉与印度最大的房产商DLF存在勾结。2013年12月平民党在新德里的地方选举中拿下70席中的28席，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仅仅执政49天后，由于提出的《反腐败法案》受到两大政党阻挠而未通过，凯杰里瓦尔愤而辞职。

当时外界认为，辞职只是他的一种策略，以便能率先参与接下来的大选宣传活动。正因为如此，此次新德里选举其间，也有人制作漫画调侃他“撑不久矣”。

很多曾经支持凯杰里瓦尔的人，



对他当时的辞职深感不快，认为“他没有兑现承诺，自己被耍了”。去年选举期间，凯杰里瓦尔在一个月内接连遭遇了五次袭击，遭受到墨水、润滑油、鸡蛋等攻击，原因之一是他坚持提倡为政府节约开支，不需要警察保驾护航。而后，平民党在印度国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均大败。

经过两年多的风雨洗礼，这次卷土重来的平民党被认为“更成熟了”。本次竞选期间，凯杰里瓦尔多次就自己去年鲁莽辞去首席部长一职向民众道歉，同时竭力淡化平民党的无政府主义形象。

其竞选纲领也更贴近民生，比如上台之后将新德里的电价削减一半，对电力分配公司实施更为严格的审计和监管；将道路、地铁、列车维护至最佳状况；承诺将为每个家庭每月免费提供700升饮用水，让每个家庭能喝上干净水；发展公立学校，让非特权阶层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加强保护女性安全等。有大陆媒体记者观察到，平民党的选前动员力度极

大，拉票宣讲活动甚至深入贫民窟。

反腐仍然是平民党主打的王牌。它承诺将会在执政后的15天内通过新德里版的《公民监察法》，将首席部长、各部长、立法院议员等置于该法案的监督之下。印度著名反腐斗士哈扎雷第一时间向凯杰里瓦尔表示祝贺，同时提醒他勿忘初心。

不过，有前驻印度领事馆的中国外交官向本刊记者指出，“平民党许诺的低电价、低水费其实很难兑现。但凯杰里瓦尔个人的号召力，加上反腐败的立场，又让底层民众不得不选他。”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高兴看来，从过去的经验来说，平民党（的表现）实在不稳定。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些选民似乎把新德里当成了埃及的解放广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被情绪所左右罢了。“无论如何，等一个月，看看平民党的表现再评价吧！”

▶ 2015年2月10日，印度平民党（AAP）的支持者在位于新德里的政党办公室外庆祝竞选胜利。该党主席凯杰里瓦尔以压倒性多数击败人民党、国大党候选人，于14日就任新德里首席部长。





## 金砖国家：准备好应对多极化了吗？

尤里·达杜什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成**立了6年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全球秩序中，备受世界关注却又广受质疑。金砖国家的目标是推动世界秩序的均衡化，减少对过去七国集团的依赖，更加清晰地展现出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但在很多人眼中，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些重要发展中国家所集合的表面影响力，与其合作机制中应匹配的实际成果并不相符。

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斯·阿斯伦德认为“金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由于“金砖国家内部不一致性太大”，使得金砖国家“没有办法团结起来”，金砖国家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必须认真看待的政治组织”。

就其收入、规模、经济结构和国家治理结构方面来说，金砖国家差异性非常大。整体来看，金砖国家面临的

大挑战也来自于此，而且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各有不同。印度、南非和巴西面临的挑战在于开放他们的经济，使其更具竞争力。中国需要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内需作为增长的基础。俄罗斯则要努力使其经济更加多样化。这点是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

争论不休的地方。如果金砖国家仍然想融合到世界经济当中，他们必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但我认为，金砖国家在未来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前景是光明的，其正在通过一系列重要协议，诸如金砖银行、货币互换和在一些重要会议中达成的相当系统有序的协议等，其轮廓正在逐渐显露出来。

### 金砖银行受到欢迎

在去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五国宣布正式启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计划。按照计划，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于2016年开始投入运营，并在7年内将该银行规模扩大到1000亿美元。该银行的筹建，是世界主要新兴

经济体第一次共同创办跨区域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我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想法，它承诺要拓宽资金来源，最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成熟的经验，特别是在基础建设领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要想运行良好，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它有能力使发展援助变得更有效率，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么加大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比如世界银行，要么允许其他组织来填补空白，听凭其影响力的下降。

我们身处一个相互交织的世界中，过去的七国集团和现在的金砖国家都担负着关键角色，双方之间和各自的成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启动资金

500 亿美元

目的：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

功能：负责金砖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扩大金砖国家的海外利益。

服务对象：全部发展中国家，金砖成员国享有优先贷款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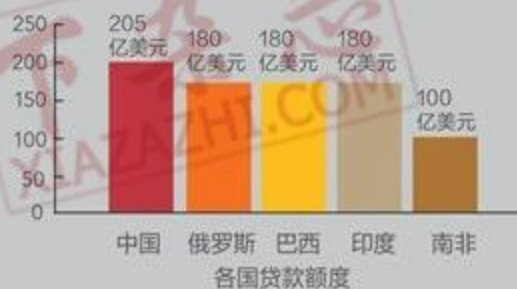
运营时间：2016年开始

总部地址：上海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



规模：1000 亿美元



功能：在成员国出现资本外流、债务危机等金融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资金。

资料来源：综合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 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罗塞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出席。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否准备好了让金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样关键的问题在于，金砖国家是否准备好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员内部都有贸易往来。如果能找到共同的准则与行为方式则皆大欢喜。但许多问题，包括金融动荡和气候变化都要求有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哪怕各项具体承诺的范围不同，但也应该拿出来讨论。

尽管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正在恢复，但是仍然没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这加深了多极化的趋势。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否准备好了让金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样关键的问题在于，金砖国家是否准备好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 合作应对新挑战

中国的崛起是金砖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例，但是正如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放缓。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必然的，它已经相对比较富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如我多年前观察的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一些挑战，无法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这些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冲突、如何确保贸易开放、如何加强相互合作抵御金融危机、如何确保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等四个方面。可以说，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构成的挑战远比以前更加严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表明，如果国家之间的外交不能预见到危机，后果将会多么严重；油价的下降也将带来更多的化石能源的消费和更多的碳排放。

如今，世界正在面临第五

个挑战，即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衡。它加剧了许多国家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南非的不平衡程度同样难以想象。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衡降低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支持度，也损害了那些努力实现全球化的机构。

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更有效的体系，以便在诸如贸易、金融监管和环境保护这些领域里开展国际间的经济合作。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更加紧密合作，为此，中国和美国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开展合作。现在已经有一些合作，但是还不够，中美两国应该努力去影响和帮助其他国家，以此来进一步巩固全球化的基础。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给予发展

中国家更大份额的投票权，并要求他们缴纳更多的准备金；世界贸易组织应该着眼于在对特定的议题感兴趣的关键性多数成员之间达成小范围的协议。

目前中美两国都对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和信息技术方面达成协议感兴趣，但是其他成员国对此并无兴趣，他们有自己的优先关心的问题需要去探讨。

二战后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正在失去往日的光彩，但是我很愿意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经过改进，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能变身为一个极具竞争性的新协定。

（记者王衍采访整理；孙亚芳翻译）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 “坚如磐石” 2.0版？ 美智库为台“国防改革”支招

特约撰稿员 / 黄山伐

近年来，台海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台湾防务战略与战备政策逐渐离开岛内社会的焦点，核电、物价、所得分配、食品安全等议题几乎完全盘据新闻版面，展望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也会成为2016年台地方领导人选举的竞选焦点。日前，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提出《坚如磐石2.0版：台湾与“拖延威慑”》报告，抛出台湾上下应该重新正视“国防”的议题。该报告亦值得大陆方面细细揣摩。

该报告声称，尽管两岸关系大幅改善，但中国大陆决心统一、而台湾试图维持现状的根本分歧没有改变。微妙的是，20年来，两岸经济实力差距急速扩大，连带使得军事资源投入也日益悬殊，如今大陆军费是台湾的14倍，解放军积累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成果，已经逐渐压倒台湾原有的防务优势——高素质海空军与海峡天险。

台湾当局也清楚这一趋势，并于2014年推出“坚如磐石”(Hard ROC)的“国防政策”宣示，即面对两岸军事实力反差，台湾将在有限资源内采用“不对称思维”重建军力。但在CSBA看来，台湾迄今的建军战备

行为仍是“对称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台军念念不忘的8艘柴电潜艇与66架F-16C/D战机采购项目。很显然，台军仍致力于获得潜艇、战机等传统武器平台。

在美国智库看来，眼下台湾防务问题不是当局军费开支是否达到岛内GDP规模的3%，而是要形成真正的“不对称”战备策略，这就是CSBA报告所强调的“坚如磐石2.0版”，即不求战胜，但以拖延来威慑。

## 四种新战备方针

具体而言，CSBA报告所设想的台湾新战备方针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是“游击式”海洋拒止。台湾海军已经承认无法像过去60年那样控制台湾海峡及周边水域，那么CSBA认为台军就应该退而求其次，去寻求“海洋拒止”，让解放军无法自由使用台湾周边水域。

为此，台湾海军可考虑引进以下三类装备。第一，建造约42艘排水量120吨的微型潜艇，在海峡中线以约20海里间隔排列成一道警戒线，除了迎战所遭遇的解放军舰队，更重要的是提供早期预警和目标定位信息，引导在台湾本岛岸基火力进行攻击；第二，筹建机动岸舰导弹部队，构成岸基打击火力核心，这些岸舰导弹发射车普遍单车备弹四枚，型号可考虑美制鱼叉或台湾自制雄风-2反舰导弹。基于解放军最有可能的攻台

登陆船队规模(约30艘运载登陆兵的两栖运输船只，外加60艘护航舰艇)，台军约需要1200枚机动部署的岸舰导弹；第三，使用智能水雷与无人水下平台(UUV)，这些武器可散布在大陆东南沿海对台动武时所需利用的重要航道上，迟滞和困扰解放军行动。

综合来说，相比昂贵且货源可疑的8艘柴电潜艇，这三类装备都在台湾自主研发的能力范围内，且价钱便宜得多(大约可节省15亿美元)，是台湾较佳的选择。

其次，由于台湾空军不能保证战区制空权，所以必须改行“游击式”防空策略(Guerrilla Air Defense)，不追求击落多少大陆军机，而是努力对解放军构成威胁，使其必须持续分派大量战机从事防空压制。这种方式比较类似越战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以及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南联盟对付美军空袭的方法。当年北越平均对美军每89架次空袭飞机才发射一枚地空导弹，但此举却让美军防空压制飞机架次比例从空袭总架次的20%提高到40%，等于让空袭力度降低20%。

为达到目的，台湾要对重要军事设施采取广泛的伪装、隐藏与欺骗(CCD)作业，利用各种干扰装置与电磁信号混淆对手，增加解放军在目标识别与战果评估上的难度，引诱解放军耗费大量出击机群，反复攻

**在美国智库看来，眼下台湾防务问题不是当局军费开支是否达到岛内GDP规模的3%，而是要形成真正的“不对称”战备策略。**



击虚假目标和已摧毁目标。

更重要的,台湾必须进一步强化陆基防空力量,除了现有系统的持续更新与机动化改造外,台军可效仿岸舰导弹的模式,将大约12枚美制加强型海麻雀导弹(ESSM)或台湾自制陆基天剑-2导弹,连同所需的火控与发射装备,塞入常见的20英尺商业集装箱中,发射车可融入大量民车当中,化身于无形。比起台湾等待美国允售的66架F-16C/D战斗机,这类机动地空导弹(总数约1800枚)也在台湾自主研发的能力范围内,且价钱便宜得多(大约可节省30亿美元),是台湾较好的选择。

## 报告存在诸多疑点

纵观“坚如磐石2.0版”的几大主张,都直接牵涉到重大军备投资的抉择,对台湾来说可谓“兹事体大”。先从“游击式”防空来看,该报告的建议倒是挺让台湾当局动心,因为越战的往事或许已经远去,但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经验却不容忽视,在台军看来,解放军目前还未达到当年美军的作战实力,如果当年南联盟成功运用“游击式”防空方式对抗美军,台湾日后也能以这种方式对抗解放军。

不过,海外有分析认为,该报告似乎太乐观了些,毕竟美军在南联盟作战时承受不少道义压力,使其空袭强度自我设限,解放军空袭台湾时未必会手下留情。所以,“游击式”防空恐怕还需要增加一些进攻成分:动用伪装成商业集装箱卡车的机动发射车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台海对面的大陆一线机场,迫使解放军战机从较远的基地起飞,降低其对台空袭的力度。

至于“游击式”海洋拒止,CSBA的建议则有不少疑点。像微型潜艇

就存在两大局限:一是侦察搜索能力不足,因为吨位小,微型潜艇无法布置体积较大的声呐,而潜艇注重隐蔽性的特点又使其难以有效使用电子侦察设备,微型潜艇最可靠的传感器只剩下潜望镜,由于视线狭窄且观测距离有限,未必能有效担负报告中所鼓吹的警戒线任务;二是续航力不足,同样因为吨位小,微型潜艇无法长时间海上执勤,频繁换防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造成监控空当,若在港内待命,当危机升高时才大举出动,构成警戒线,那么警戒线未形成前又如何知晓危机升高呢?

因为类似的理由,该报告建议的智能水雷与无人水下平台也不是理想选择。智能水雷与无人水下平台等小型水下物体确实难以寻找,但问题是如何在需要时部署到位?就算它们的内置电量足够运行半年之久,也无法经年累月地持续在对方港口外站岗放哨。如果要例行性替换或补充电量,不仅工程浩大也所费不赀。若想在冲突升高时才部署,使用工具也是个麻烦——智能水雷与无人水下平台移动缓慢,自力移动就位不太可能;若要使用机舰布放,危机既已升高,这些机舰也难靠近敌港口外的重点航道。

如果从“以小博大、以弱敌强”的角度切入,游击战确实是台湾最后也是最强的手段,奈何台湾民心士气却是最大的问题。台湾现在虽然不缺“反中”热情,但真要让过惯舒坦日子的民众艰苦抵抗,可又是另一回事了。换个角度想,台湾并未沦落到只能依靠游击战的程度。从1991年海湾战争来看,即使在对手全面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守方进行短距离、小规模部队集结调动还是可能的,伊拉克正规军在很多场陆上交锋中都能动用数量与美军相当的装甲部



队,所以台湾现有的机械化重装部队打反击还是有可能的。况且解放军就算掌握制空权,也不能完全安心地对台湾地面部队实施攻击,而解放军登陆部队就算渡过海峡抢滩,也已在之前的“游击式”海洋拒止作战遭受损失,台军机械化部队所面临的不会太强的对手。

台湾当然还得在水际滩头进行抵抗,动员后备部队把守全台海岸并在重点区域加强兵力、构筑工事和布雷。接下来,台军要尽可能减少机动的必要,重装部队分北、中、南三大战区,就近部署在登陆可能性最高的地带附近。

综上所述,美国智库的建议和2008年在台湾岛内喧腾一时的“豪猪战略”异曲同工,都是鼓吹台湾用“不对称战略”对抗中国大陆。但就像当年胎死腹中的“豪猪战略”一般,台湾岛内谈论“廉价国防改革”的人很多,但如何付诸实践却无法搭茬儿,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当局至今仍热衷于潜艇、战机等“对称性”武器采购。目前来看,台湾已有的战备方向,有着盘根错节的组织利益、人情牵绊与政商关系,这也是许多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 2014年9月30日,高雄,台湾海军在二战时期美国建造的“孔雀鱼”级潜艇上行礼致敬。台湾正在开展海军现代化计划,除潜艇项目外,还计划购买4艘美制“佩里”级护卫舰,并已下水第一艘自制导弹护卫舰“沱江舰”。



# 大陆资本外流恐成“新常态”

多方数据透露出中国资本正加速外流，这似乎加剧了某种惶恐的情绪，然而这种状态，很可能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新常态”。

记者/曹蓓

今年春天，纽约将迎来拥有近250年历史的法国奢侈品牌Baccarat旗下的首间酒店，这也是曼哈顿唯一一家顶级六星级酒店。然而这家酒店还未开门迎客，就已被中国阳光保险集团以每个房间逾200万美元的创世界纪录高价收购。阳光保险为此将支付超过2.3亿美元。

这座位于曼哈顿中心城区的50层玻璃大厦，内部由1.5万只从法国Baccarat工厂运来的水晶器皿装饰，共有60间套房以及114间客房，每间面积在400-1740平方英尺，多间套房每晚收费1.8万美元……所有此前奢华的铺垫，随着阳光保险与喜达屋资本集团的握手，划归这家中国财险排名前十位的公司。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只是近几个月来众多落入中国投资者之手的美国地产战利品之一。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规模走出去作为“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之一，多家企业伺机而动。

据大陆媒体公布的一份名为《2015年1月中资海外并购月报》显示，2015年1月总共发生40宗并购事件，其中26宗

披露交易金额，涉及约211.2亿美元，披露交易额同比上涨324.51%，环比增长319.79%。

中资海外并购激增的背后，是中国国内资本的加速流出。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汇率下跌预期、美元升值……诸多原因叠加致使中国国内资本流出。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指出，中国计划在5年内对外投资超过过去30年的总和，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必然会出现资本流出大于流入，并且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大的趋势。

然而，在一些人看来并无大碍的资本流出，却让另一部分原本就紧绷的情绪惊呼“危险”。

## 恐慌弥漫？

中国外汇管理局2月3日发布的一组数据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紧张情绪。

根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达912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至611亿美元。

相比去年二、三、四季度分别逆差162亿美元和90亿美元，四季度数据被视为“至少是199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赤

字。”数据显示，2014年四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751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5595亿元人民币，国际储备资产减少1844亿元人民币。

有统计称，从全年数据看，960亿美元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过去15年中第二度出现逆差（第一次是2012年，逆差168亿美元），而2013年资本项目顺差高达3262亿美元。

作为资本流出的重要指标，央行公布的外汇占款数据也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点。央行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部金融机构口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1184亿元人民币，为去年8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并创下2007年12月以来最大下降值。相关统计称，2014年末，央行外汇占款余额27.1万亿元，较上年末新增6411亿元，增幅较上年减少了77%。

不仅是中国国内官方数据，所有的信号似乎都在指向中国资本外流加剧。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金融协会(IIF)2014年12月31日表示，由于油价下跌、避险意愿上升、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加息，12月新兴市场18个月以来首次出现

外资净流出。IIF月报称，12月新兴市场总计流出115亿美元，其中债券投资减少78亿美元，股票投资减少37亿美元。这是新兴市场自2013年6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流出。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 Global（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也反映了相似趋势，投资者已经连续第7个月从该机构监测的亚洲新兴市场基金撤资，自去年11月末以来，撤资总额达到131亿美元。在截至1月7日当周，投资者共撤出6亿美元资金，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债券基金的资金净流出规模为3.39亿美元，亚洲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的资金净流出规模为2.58亿美元；而此前一周，即2014年最后一周亚洲新兴市场基金的资金净流出规模为22亿美元。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上述资金有多少是从中国流出的，尚无准确数据，但从以下数据可以大致做出判断。截至2月4日当周，资金从中国股票型基金市场净流出9.7亿美元，占了亚洲股票型基金市场资金净流出的大部分。

中国央行近期突然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也从最初认为是央行大幅度货币宽



松开始的征兆,到被解读为只是为了缓冲资本外流和外汇储备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随后便出现了“史上季度和年度最大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凶猛”等言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如此担忧的事。“国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对于他们来说,中国跟其他新兴经济体没什么区别。其他经济体不好,从中国撤出去也是正常现象。”他对《凤凰周刊》表示。

## 争议资本外流

对于资本外流的定义,至今学界和业界也很难达成一致的观点。

比如一个中国人去美国投资建厂,他需要把手中的人民币去外汇市场换成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市场本币的供给增多,自然会导致本币贬值。

除了内资流出以外,外资撤离也是资本外流的一部分。如果一家美国公司有意关闭在中国的分公司,结果就是把在华所有资产处置后换成人民币,然后在外汇市场兑换成美元。这种行为同样增加了人民币在外汇市场的供给,导致人民币贬值。

理论上讲,当大规模资本外流时,必然伴随着对本国资产的抛售,因而就会带来本国资产的暴跌。若本国的外汇储备不是足够多,即当外流的资本超过了本国的外汇储备量时,由于本国央行无法按现有的汇率向外逃的资本者兑现外汇,所以只能宣布本国货币对外国货



币贬值,而这会进一步加大仍然在本国的外资的恐慌,进一步加剧外资的出逃,形成恶性循环……

理论毕竟是理论,最复杂的因素莫过于国情。

IIF和EPFR的数据反映的是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资金撤离,事实上,撤出的这部分资金并不意味着已经逃离了中国。

一位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相关人士曾坦言,资金从中国撤离很难。成为合格境外投资者需要繁复的程序,而QFII是波段操作。就像每次出去后再进来都要被门卫搜一遍身,所以他们很多只是暂时清仓,而不是真正从中国撤离。

## “非常态”还是“新常态”?

在一些专家和学者看来,目前中国的资本流出不可小视。

有业内人士担忧实体经济连续下滑,实体企业信心不足,从而导致对人民币信心不足如瘟疫般弥漫。

也有人担心,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呈现出不可扭转的趋势性演变,将会使得国际资本大规模持久性出逃,一方面会冲击外汇储备,引发整体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对政府或职能部门也是一种考验。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近期撰文,试图安抚市场情绪。文章称,中国发生的资本外流早有“蛛丝马迹”,现在的市场反应其实是后知后觉、自己吓自己。出现资本外流并非意料之外,而是预期中有序的、适度的调整,各方必须从思想和措施上深刻认识并积极适应跨境资金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各种观念都要随之转化。对于资本流出,要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计划在5年内对外投资超过过去30年的总和,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一定会是这种状况,并且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趋势会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曹远征说。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九大“新常态”之一,就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中国国际收支运行正在加速从大额顺差、单边升值的‘旧常态’转向一顺一逆、双向波动的‘新常态’。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产物,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中国经济金融加速融入全球化的大势所趋。”管涛称。

□ 编辑 王华强 □ 美编 虎妹



# 中国重建外资法律体系

《外国投资法》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预示中国大陆的外资管理体制将向法治化、市场化、规范化继续迈进，并进一步和国际接轨。

记者/赵福帅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经验积累，中国正在重建对外资的法律体系，其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模式的诸多创新，为外资在华开放了更大空间、提升了投资的便利性。

2015年1月19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外国投资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简称“外资三法”)，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已经难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因此商务部启动了将三法修订合一工作，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涛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中国经济所处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TPP、TTIP、TISA等大型区域协定引领着国际规则的变革，增加了内容更全、标准更高的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政府规制、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新领域，很多是中国企业软肋，如何应对国际新形势，给中国提出了新挑战。

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虽然2014年中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外资对中国经济依然举足轻重，因其整合了中国产业升级亟需的先进研发、品牌、营销、管理等资源。“而且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正逐步削弱，亟须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这就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李洪涛说。

回顾“外资三法”实施的三十多年，其对于中国大陆推进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外国资本、技术、服务、管理经验，助推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谓功不可没。但三十多年前制定的法律已垂垂老矣，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 修法迫在眉睫

据《凤凰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称，“外资三法”自身的缺陷在改革开放之初尚无伤大雅，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化，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外资三法”最大的问题是原有法律体系缺乏统一性，立法层次复杂，数量庞杂，内容重复甚至冲突，导致中国外资

法制体系缺乏整体协调，透明度和可操作度均不高。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由“外资三法”规定的逐案审批制度，导致腐败案件频发和市场行为的机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适用两套不同法律，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对国家安全审查等涉及不足，导致部分外资活动规避国家安全审查。而且“外资三法”调整范围过窄，对股权并购等均未涉及，对多种投资活动的合法性均未置可否等问题。

“外资三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大陆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需要，限制了外资在华的发展和活力，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求，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从而直接催生了“三法合一”构想的实现。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强介绍，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更

加市场化，减少政府审批和行政干预，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第二是更加法治化，从法律的高度构建外资促进与管理制度，而非原有的行政法规、通知、办法等等。第三是更加国际化。既有的“外资三法”与国际接轨不够，颇具中国特色，如今必须更多借鉴国际惯例。

此外，中国政府也积极在中国上海自贸区进行更高水平利用外资的试验，如在区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三法合一”积累经验。

至此，《外国投资法》出炉，已属箭在弦上。

## 重建外资法律体系

与既有的“外资三法”相比，《外国投资法》重建了有关外资的法律体系，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模式的诸多创新，为外资在华开放了更大空间、提升了投资的便利性。

外经贸大学李玉梅教授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对现行的外资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取消逐案审批制度，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确立“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制度。

另外，审查对象也不再是



合同、章程，而是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这就会避免详式和简式合同引发的纠纷。过去的合同章程都是傻瓜范本，现在就会释放契约自由的红利。”刘俊海解释。

中国政府借此次修法，改变了对外资的定义。“外资三法”关注的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这三种利用外资的组织形式。《外国投资法》不再关注这些具体形式，不再按照注册地标准，而是转到投资的本质，即是否由外国投资者控制。杨立强介绍，以往就有外企操作注册地，以规避对外资的行业准入限制。

《外国投资法》还将中国投资者到海外注册的公司定义为内资，并不再享受外商优惠政策，政府对外资的统计口径也将进行调整。

对各界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该法引入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将其上升为法律。

“但审查决定应该允许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只要不公开审理即可，这也可以彰显中国对法治的自信心。”刘俊海提议。

本次修法虽然对外资的审批事项大大缩减，但对外资活动的透明度提出更高要求，包括行业准入、股权架构、税收监管等敏感领域信息，外资企业均须向主管部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

《外国投资法》还建立、健全了有关的法律责任制度。明确了在禁止领域投资、违反许可条件在限制领域投资、违反信息报告制度、违反国家安全

**《外国投资法》还将中国投资者到海外注册的公司定义为内资，并不再享受外商优惠政策，政府对外资的统计口径也将进行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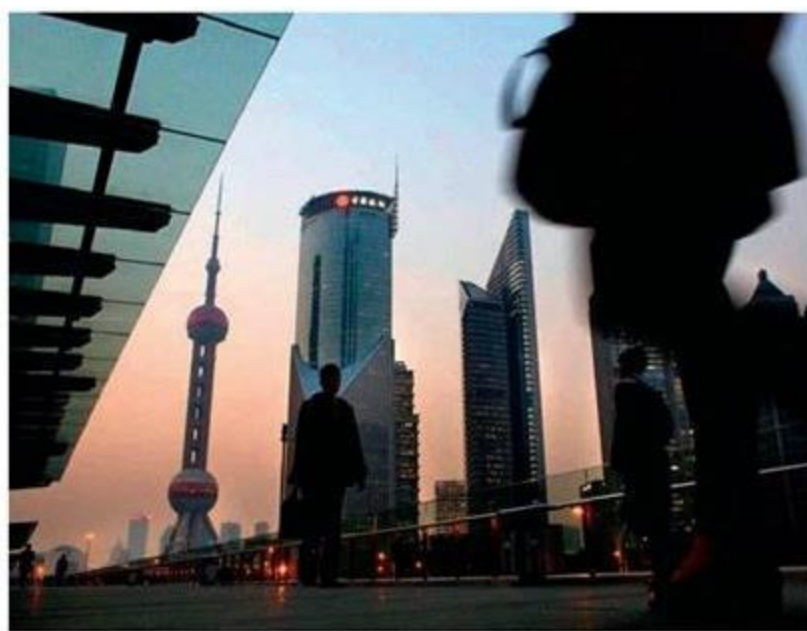
审查规定等各类情形的法律责任，从而提升了法律执行的透明度、预期性和稳定性。

## 后续影响深远

《外国投资法》从放宽外资准入、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诉处理等方面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预示中国大陆的外资管理体制将向法治化、市场化、规范化继续迈进，并进一步和国际接轨。李洪涛就认为，“‘外资三法’的修订表明中国将继续重视吸引外资，外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会不断创新，更加成熟。”

谈及《外国投资法》对外资的具体影响，杨立强表示，该法对未来新增投资会产生正面影响，因为未来投资环境更为自由、透明、规范。“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的，都会一视同仁。”

至于《外国投资法》与近期中国政府展开反垄断审查是否传递矛盾信号，杨立强认为两者并不冲突，他指出，本轮



反垄断调查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所以显得比较频密，跟中国大陆对外资的态度没有关系，反垄断调查对内资、外资都是一视同仁。

当外资企业因为《外国投资法》即将出台而欢欣鼓舞之时，中国大陆本土企业不免忧虑“狼来了”。李洪涛预计，《外国投资法》一旦生效，随着负面清单的实施，外资企业将不断进入新开放领域，短期内将促进国外投资，并对国内企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长远看，真正充分而公平的竞争将提升中国经济活力。

同时，李洪涛提醒，《外国投资法》将对以

“新浪模式”进行海外上市的大批企业，其结果未定。

所谓“新浪模式”是指，在开曼群岛等离岸港设立离岸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到中国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最后用合同的形式控制内资企业，然后以该外资所控制的内资企业的资产或权益进行海外上市。因新浪公司首先在中国利用这种方

式实现境内重组和境外上市而得名。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和阿里巴巴均采取了“新浪模式”。

现在《外国投资法》规定“受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境内企业，视同外国投资者”。而根据中国法规，外资公司不能经营网络信息服务。这可能对通过“新浪模式”进行海外上市公司的业务造成很大影响。对此，刘俊海建议，应当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政策，即《外国投资法》实施划线，加以区别对待。

对于《外国投资法》的后续影响，刘俊海认为，其将在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解释，在“外资三法”下，外企有一套独特的与内企不同的决策机制、治理结构、审批制度等，三者混改的交易成本极高。

《外国投资法》也将倒逼政府部门转变职能，提高监管水平，消除监管盲区，提升对外企监管和服务的公信力。并促进实现平等监管与平等保护。

□ 编辑 王华强 □ 美编 虎妹



## 链接

### 北京市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4年2月视察北京时,对北京的核心功能做出过明确的城市战略定位,要求坚持和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此,北京市将通过“禁、关、控、转、调”五种方式来完成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目标。

#### “禁”

禁止新建、扩建首都不宜发展的工业项目,尤其是明确全市范围内不再新增一般制造业。

#### “关”

就地关停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全面治理镇村工业大院,加快清理小散乱企业。

#### “转”

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一般制造业实施整体转移。

#### “调”

对高端产业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实施调整,主动在京津冀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 “控”

对城市废弃物处理、炼油、食品加工等保障城市运行及民生的行业实行总量控制。

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 解读

### 首都核心功能包括什么内容?

【本刊综合】去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曾提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谈到2015年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时称,该疏解的必须坚决疏解,该退出的必须坚决退出,要守住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底线,不符合功能定位的项目一个也不能上。同时,又要从坚持城市战略定位、完善城市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要求出发,该推进的工作就得积极推进,该核准的规划就得核准,该建设的项目就得建设。北京市有关学者表示,经济、教育、金融等是基于首都核心功能的延伸功能,应予保留。

### 哪些功能要疏解出北京?

【本刊综合】北京需要疏解哪些非首都功能?在今年的北京两会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做出了说明:疏解清单将按照“几个一批”对核心区和中心城区进行疏解,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其中,“一批教育功能”指疏解一些院校,“一批医疗卫生功能”则指中心城区不再新增综合性医院。数据显示,北京市现有以动物园、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为代表的一批有形市场1386个,经营人员超过41万人,其中外地来京人员占八成。截至2013年底,以“小百货、小洗浴、再生资源回收”等为主的17类待提升业态总数为23.47万户,这些业态中许多是流动人口的自我循环、自我服务,造成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城市运行压力和社会管理压力,应予坚决清理。此外,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的职能也与首都关联不大。

23.47  
万户

## 焦点

### 习近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本刊综合】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对此,习近平提出了三个“明确”。一是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二是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三是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国家发改委有关学者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根本的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目前核心的问题是,承接首都产业转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形成反磁力中心,能吸引北京的产业过去,“但是这个难度还很大”。参照深圳、浦东等地的发展轨迹,其快速发展取决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各种政策比较优惠,管理水平较高,目前河北还需要解决类似的问题。

此前,2014年1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津召开,此次会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提出要抓紧修改完善规划纲要,加快编制相关领域专项规划,确保在一个目标下协同、一张蓝图下推进。

为此要深入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开展试点示范等重大问题,优先启动一批有共识、看得准、能见效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项目,加快推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抓紧确定2015年的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清单。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殉难记

台湾方面发布了“勇士国魂”的纪念月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被收录其中，成为两岸都认可的中共殉国将领。

文/王戡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台湾“国防部”发布了名为“勇士国魂”的纪念月历。从“抗战前期：整军经武，蓄积国力”到“日本宣布投降：光荣胜利，永载史册”，以精美图片重现抗战历程。

翻开月历附页，在“抗战殉国将领”的“国军少将”一栏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名字赫然在目。台湾军方回应媒体采访称：“为客观忠于文献及史实，故未刻意将左权自名单中删除”。大陆各界对此颇多好评，有学者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两岸之间，终于有了第一位公认的共产党抗战殉国将领。

## “彭已突围，左阵亡”

1942年5月下旬，山西辽县东南山区出现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部队，他们身穿灰色土布军装，头戴缀着纽扣的军帽，打着绑腿，买东西照价付款，歇脚时不忘帮忙打扫房屋。在当地农民看来，这就是一支八路军，只是不爱说话。

沉默是为了掩饰。这支部队是日军第36师团派出的“特别挺进斩入队”，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领，化装潜入八路军控制区，目标是位于此地的八路军前方总部。

1940年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和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前方总部进驻辽县东南麻田地区，在此指挥华北八路军作战。这道山沟还驻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社等机关，一时有“太行小延安”之誉。

日军注意到了八路军的活跃，多次发动驱逐扫荡，均未奏效。1942年5月下旬，日



留苏时的左权还不是后来沉默的形象，而是一个热心又八卦的青年。但是，这段经历却使他在后来十余年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阴影之下。

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启动“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打击活动于太行、太岳山区的彭德怀、刘伯承所部八路军。益子挺进队正是负责“捕捉敌首脑、扰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的撒手锏。

当时，左权兼任总部情报处长，直接处理各方送来的日军动态。5月22日，他获悉日军有从西、南两个方向合围麻田地区的企图，经请示彭德怀，决定率领各机关向东突围。但他不知道，益子挺进队已经潜入附近，正在寻找他们的行踪。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多属非战斗人员，行动比较迟缓。5月24日东进到辽县与河北涉县交界的十字岭下时，与后勤部队、掩护部队拥挤到了一起。左权认为后勤

部队骡马多，一旦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后果不堪设想，便要他们单独向东北行动，其他人员待查明情况后再决定行止。

谁料，次日天亮后出现的不仅有日军飞机，还有地面部队——益子挺进队追击到了十字岭以西，而负责掩护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769团主力都在外围准备阻击日军大部队。短暂商议后，几位负责人决定分路行动，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翻过十字岭向西北突围，罗瑞卿率领野战政治部向东奔往武安。

此时，益子挺进队已经开始攻击据守十字岭西麓的掩护部队，并以火力封锁突围道路。彭德怀率先策马冲上十字岭，闯过火线冲出山口向北奔去，后面的人跟着涌上山岭。左权在半山坡指挥，鼓舞人群：“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得知彭德怀已经突围后，左权也向山口走去。途中，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左权被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时年37岁。

各机关在突围中也遭受很大损失。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被俘，政策研究室11人全部阵亡。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以下阵亡失踪40余人。罗瑞卿一路也遭到日军阻击，靠朝鲜义勇军拼死突击才打开生路。

左权的遗体被匆匆掩埋。日军战斗报告中附有一具据称是左权遗体的照片，但已无法辨认。数日后，总部特务团一部返回十字岭，在一条沟里找到了左权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匆忙盖上的”。他们将遗体清洗干净，换上新军装，盖上红旗安葬在岭顶。

5月26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



小平向延安汇报了“彭已突围，左阵亡”的消息。次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表示“殊深哀悼”。同年8月26日，共产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左权县以资纪念，左权牺牲的十字岭也被改称为左权岭。10月，左权遗体移葬河北涉县石门村。8年后，迁至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袭击十字岭的益子中尉因战功得到了日第1军颁发的奖状，升任师团参谋，后随部队在太平洋新几内亚岛投降。他回到日本后曾任町议员、町长等职务，死于2010年。

### 来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专才

左权阵亡后，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称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称之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回顾左权一生，确实被共产党作为军事专才培养和使用。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3月，19岁时进入湘军宿将程潜在广州开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这所学校招来的学生颇富造反精神。先有陈赓、宋希濂等人未等开学便转考黄埔军校，后有陈明仁等人里应外合，闹学潮要求并入黄埔，最终如愿以偿。

在闹事的学生中没有左权的身影，可能和他是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明灏的表弟有关。但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他很快被共产党所注意，于1925年1月由同学陈赓、周逸群介绍入党。

从黄埔毕业后，左权被选派到莫斯科深造，先进中山大学，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学。两人回忆左权“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非常注重军事学习，“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0年夏左权回国，被任命为闽西红



▶ 留存在日本防卫厅史料中的被认为是左权将军殉国后的遗体照片。

18cA  
参谋长左权的死体

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负责培养下级指挥员。年底又改任红军新12军军长。后历任红一方面军总部参谋处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等职务，参加了整编宁都暴动第26路军和围攻赣州、漳州诸役。

此后，左权在政治上遭到打压，但始终被控制使用于参谋、教育岗位。红军长征期间，他担任红1军团长林彪的参谋长，后曾代理军团长职务。1936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邀请红军派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城防事宜，也由左权出马负责。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他的“少将”并非国民政府授予，而是比照职务自行确定。因参谋长叶剑英长期留守后方，左权成为八路军前方参谋部的实际首脑，参与从平型关战斗到百团大战历次主要作战的谋划指挥和总结检讨。

时人回忆起左权，多用沉毅寡言、勤劳周密形容，常是“一手拿着电话机说话，另一只手拿着笔在写”的形象。他为人和善、真诚，连一贯被认为淡薄的林彪也感念不已，在其死后罕见地写长诗缅怀。身为参谋人员，左权在作战指挥中的建议和判断，已经汇入林彪、彭德怀等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决策当中，难以逐一辨明，但仅存的片羽吉光，也能反映其人特点。

1940年10月，八路军集结重兵围攻据守关家垴的日军冈崎支队，左权到特务团坐镇督战，提出“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战死于十字岭前，他曾对担任外围阻击任务部队嘱咐“要记住，不要死打硬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立即回头接应彭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作为接受过苏联军事教育的指挥员，左权对正规化建设极其重视，在指挥作战之余笔耕不辍，撰写《新战士的军事教育》、《埋伏战术》、《战术问题》、《建军问题》等专题文章，指导部队作战和训练。

1938年冬，左权召集八路军参谋长会议，着手起草司令部工作条例。1939年起，又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一道陆续翻译了苏联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作为八路军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周恩来评论，左权“习于游击战争，但他也不忘正规战术，所以他在军队正规化的口号下，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多年后彭德怀主持国防部，力主推进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与当年左权的影响不无关系。

### “托派”阴影

对台湾民众来说，左权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媒体上。早在2007年，台湾公共电视备受瞩目的纪录片《寻找蒋经国》中，引述蒋经国留苏时期写给女友、冯玉祥女儿冯弗能的信时便有左权登场：“我看你给屈武写的信说，左权说你得了相思病，你可在相思谁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你呢？左权他真是好玩极了”。

是的，留苏时的左权还不是后来沉默的形象，而是一个热心又八卦的青年。但是，这段经历却使他在后来十余年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阴影之下。

1927年间，蒋经国、左权和同在苏联留学的孙冶方（日后成为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朱茂臻（后任国民党军少将，参加过第一次远征缅甸）等人时常往来，还曾发起聚餐。敏感于派系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和中山大学校长翻译王



明,将这些人罗织为“江浙同乡会”,定性为反党组织,要求共产国际“立即消灭”。左权是湖南人,不算江浙同乡,却被定性为“同乡会卫士”,一同裹挟在案。

卷入其中的留苏学生奋起反抗,纷纷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反映情况。左权也写信称只是聚餐而已:“至于说吃中国饭有政治作用,在我们每一个明了的共产党员看来,自然可以说他们是神经过敏”,“我们不独是保证自己没有参加过任何小组织,将来我们也不会有这党外行动”。

经过一年多波折妥协,反党组织的指责无疾而终,但在“同乡会分子”和王明等人之间却结下了梁子。1929年,王明借审查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的机会,指称左权有同托洛茨基派分子来往的嫌疑,给予党内劝告处理。

厄运并未到此为止。左权回国担任红

军新12军军长不久,所部一名团政委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当即上交左权。左对此未作任何处理,但革命阵营容不得温情和息事宁人。1932年5月,此事被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此时正逢王明的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左权立即被中央局组织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召至瑞金审查,而后以托派分子嫌疑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撤销时任的红15军军长兼政委职务,调红军学校任教员。施简则被处以五年徒刑,在红军长征前被拉出监狱杀掉。

“托派”在共产党政治语境中的意义和影响,从领袖讲话中可见一斑。1937年10月,长征干部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女学生刘茜被处决后,张闻天在讲话中将托派与敌寇、汉奸并列,称黄克功如果杀的是这些人,“我们无判他死刑的理由”。左权若在现场,心情可想而知。据其女儿左太北回忆:“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

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曾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诉,表示:“虽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直到阵亡前也没有得到回应。

1979年8月,左权遗孀刘志兰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为左权平反,得到的回复是:“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此时距离37岁的左权阵亡,又是37年了。

□ 编辑 陈祥、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中世纪欧洲农村集市。

##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伙食

14世纪是英国农村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世纪，这一百年里，出现了肆虐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不断上涨，英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加速提升，吃细粮、吃肉、喝酒，对他们而言不再是太过奢侈的享受。

一处名为塞吉福德的庄园保留着这时期收割雇工的伙食记录。这份记录显示，13

世纪到14世纪初，雇工的面包还基本是大麦烤制的；此后，小麦和黑麦的比例逐渐增高，到1387年，大麦就完全地消失了；接着，小麦又开始挤占黑麦的成分，直到1407年，面包完全由小麦烤制，账单上外购的面包也被称作了“白面包”。

肉的地位也与日俱增。13世纪，庄园为雇工提供的荤食还以乳制品为主，肉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是腌肉。进入14世纪，肉的花销从不足10%增加到了30%左右，新鲜肉也出

现在雇工的餐桌上；相应地，乳制品所占比例则越来越小。不过，到15世纪初，肉的花销比例又开始下降，因为酒变成了伙食里最花钱的东西，记录的最后一年1424年，41%的费用是用于雇工喝酒，刚好跟记录的第一年1256年的面包费用占比相同。

黑死病往往被认为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原因，但塞吉福德的记录显示，改善在那之前就已开始，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锐减只是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

## 谁编造了元朝初夜权的传说

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各种元末农民起义的传说被编造出来作为反清宣传。“以月饼密传反元讯息”、“除夕杀鞑子”、“十家养一鞑”的传说都成形于这一时期。然而，比较令人发指的说法，如“剥掉汉人男婴的右手拇指使之不能挽弓”和“蒙古人享有汉族女子初夜权”这两种，则是清朝后期

的蒙古人自己发明的。

这两个传说的最早文字版本见诸天主教传教士、蒙古学家田清波在鄂尔多斯的记录。在蒙古人的民间故事里，奴役、压榨汉人的是蒙古喇嘛而非军人，“每十个汉人的家庭都安插一位喇嘛”，这十户人娶新媳妇时，得先把她送到喇嘛那里过一夜，而后才归她丈夫。这样的耻辱和伤痛成了汉人奋起反抗的动机，而喇嘛的头颅和肝脏则

最终被汉人拿去祭拜了月亮。

这套说法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元明两代官私史志随笔均无记载。不过，它也不算凭空捏造，喇嘛教和婆罗门教曾将童贞视为邪恶之物，西藏、西夏、印度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婚前需请僧侣挑损处女膜去邪的习俗。这虽然是神圣的宗教仪式，但也不乏僧侣违规行交媾之事的流言。处女权一说，即是蒙古人附会这类流言，又将它安到了汉人的头上。





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 乾隆皇帝咏玻璃

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有一首题为《镜喻》，咏诵玻璃镜：“青铜摩以旃，照形已无遗。近代泰西法，玻璃更新奇。然均藉人工，水银涂抹资。其未涂水银，素片玻璃辉。可以施窗棂，外物了然窥。……”这里的“玻璃”即玻璃，玻璃镜的原理在诗中都讲明了。

当时，玻璃生产尚不普遍，是皇室、贵胄才用得起的珍贵玩物。好写诗的乾隆，没有少为玻璃施展雅兴，他咏过玻璃盘、玻璃瓶，但最厚待的还是玻璃镜，为之写过好几首诗。皇帝很喜欢拿水晶、云母来对比玻璃的光亮透明，如“水精（晶）云母羞精华”，又如“一般皎洁羞云母，四射光芒突水精（晶）”。他用的镜子是西洋进口的数尺大穿衣镜，价格不菲，诗中写道：“梯陵度索万里遥，价重京华等球璧。”

至于能分隔室内外又不碍视线的玻璃窗，乾隆更是非常喜欢，因为“西窗糊玻璃，全湖俯几席”，极利于室内观景。为此，他有一首题为《玻璃窗》的诗写道：“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内外洞达称我心，虚明映物随所受。风霾日射浑不觉，几筵朗彻无尘垢。”

## 早期美国的铸币失败

1792年，《铸币法》规定在费城建立一座铸币厂，并规定美国从此以金银复本位制为基础发行金属货币：十美元面额的金币、一美元的银币以及更小面额的辅币，金银比价被规定为1:15。

因为忽视经济规律，《铸币法》几乎是一推行就失败了。1796年，欧洲黄金相对白银的价格上升了，美国的金币一铸造出来，马上就被运到欧洲套利。而美国的银币因为铸造质量较高，也被装箱运往加勒比地区，在那里换成不规则的、失去光泽的、更加笨重的西班牙银币，接着又运回美国换取黄金或新的银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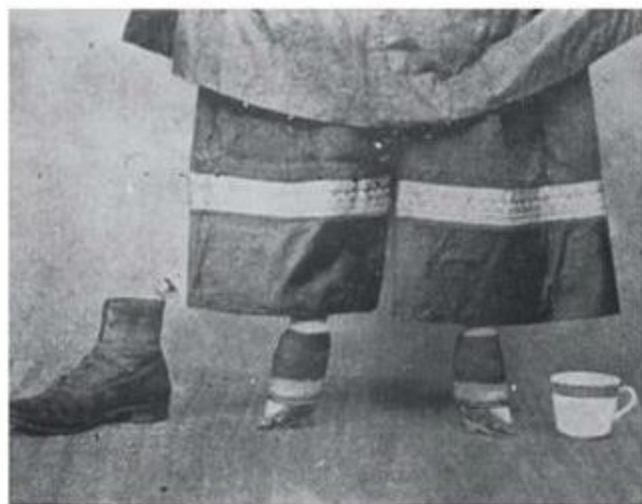
PHILADELPHIA AND FAIRMOUNT PARK

CENTENNIAL VIEWS

费城铸币厂冶炼室

## 晚清教会如何反缠足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泛滥的吸鸦片、缠足、赌博、溺婴、养婢女、嫖娼、纳妾等陋俗多抱有强烈的批判心理，他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及其前身《教会新报》，也成了他们鼓吹社会改良的舆论阵地。有趣的是，这些教会报纸在宣扬陋俗之弊时，往往会入乡随俗，创造许多符合中国人心理的说辞。其中，对女子缠足的反尤为典型。



《万国公报》搬出形形色色的理由来证明缠足有百害而无一利。除了引用儒家经典进行新解，还广泛使用中医理论。如谓缠足不利生育：“心怀伊郁，饮食未能消化，动转未得快然，加之寒暑不调，就冷贪凉，则白带经闭，与经血妄行，诸症因之又渐而入，安能受孕成胎？”说缠足女子纵然生子也难健康，因她们“多坐而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甚难，其身多软弱，生子女亦软弱。”

迎合传统之外，《万国公报》也迎合了正在萌生的中国民族主义。如将中西对比，“今中国男不得女助，他国男女皆口勉同心”，称缠足女子无法为国家奋起出力。华人基督徒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符合汉民族主义的传说，将妇女缠足归咎于“辽金元等北寇掠掠”，汉人“不得已而举爱女之双足忍苦缠之，谓犹胜于被掠北行”。

□ 文 赵新宇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她

下杂志  
XIAZAZHI.COM

也门的女兵、印度的妓女、美国的少女、瑞典的原住民女子，这是《国家地理》策划的“女性视角 (Women of Vision)”摄影展出。11位杰出的女摄影师以其热情和雄心，从世界各洲的各个角落，记录了她们镜头下的多彩故事。

“女性通常更关注这些话题，如童养媳、性侵犯、产妇死亡率，她们也更容易深入这类话题，”策展人伊丽莎白·克里斯特 (Elizabeth Krist) 说。同为女性，当镜头所及乃至四目交投之际，女性摄影师往往更难以回避对方的遭遇，甚至自然而然代入她们的处境。

部分展览照片展示了女性在不公制度下的挣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冲突边缘地区，女性权益遭受剥夺已是常态。也门女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孟加拉女子被硫酸所伤、阿富汗等多地的童婚。女摄影师视角下的记录也并不止于悲惨本身。性别在记录的方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身份能为摄影提供极大便利。在也门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只有女摄影师才能进入女子反恐部队军营。在游牧女子的身旁，女摄影师更容易与之深入交流。也只有年纪相仿的女摄影师，才能轻易捕捉到同龄少女情感释放的一瞬。

女性摄影视角强调从自身经验、想象和欲望出发，创造了不同





1	2
---	---

于男性的个人化感觉，以及对女性独特品质的记录。这是在向世界认知方式或观察视角上，与男性构筑的差异。《纽约时报》评价，女摄影师们独特的智慧和语言，呈现了世界的无限丰富性。

女性视角或许还有更意想不到的现实意义。伊丽莎白认为，摄影展的意义在于，“年轻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我的路。当她们看到女性摄影师也可以在零下环境里、在疫区

或偷偷潜入到性奴的住所进行拍摄，她们可以从中获得勇气，从而打破禁锢她们的世俗的枷锁。”（曾鼎）

1. 也门女孩Nujood Ali不同的世界。2008年，年仅10岁的Ali与丈夫离婚，震惊了全世界。这个女孩的反抗，让世人了解到也门的包办婚姻。摄影师斯蒂芬妮·辛克莱（Stephanie Sinclair）回忆，在她拍摄的也门等多个国家，女童年仅6岁就会被送给年长男性为妻。这常常被当做帮助家族偿债的一种方式。“如果自己出生于这样的环境，又会有怎样的童年？”辛克莱说，“这个年纪的纯真让我共鸣强烈。我很生气，没人保护她们。”

2. 也门军营中巡视的女子反恐部队中尉。军营里都是像她这样的反恐专家，男性无法进入女子军营，为了反恐，需要对伪装成女性的男性嫌犯搜身，也门政府打破传统，建立了这支女子反恐部队。但在这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年轻女孩参加部队并不容易。有些女兵没有告诉她们的朋友实情，只说是在行政部门做文职工作。还有人甚至为成为女兵付出沉重的代价：婚约被取消，乃至被逐出家门……





阿富汗喀布尔，一群女子正接受射击训练，她们中大部分是寡妇。这张照片由摄影师林赛·阿达里奥(Lynsey Addario)拍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分子有时会用罩袍伪装自己，而按照习俗，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男性不能与女性说话，更不用说搜身。因此，喀布尔每座政府大楼都会配备女性安全官员。此外，在阿富汗这个充满暴力和性别歧视的国家，也需要更多女警察来保护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



女孩的“出格”。一名年轻的女生迫于周围好友的压力也打上了舌环。此刻的她，被同样年轻的女性摄影师基特拉·卡阿纳(Kitra Cahana)抓拍到“既刺激又害怕”的状态。“人们能够看得出来，你是否真的跟拍摄对象发展了深层关系”，卡阿纳说，让一个老男人摄影师混进年轻女孩的生活圈不太适合，但作为年轻女孩，她去做这项拍摄工作更容易。她第一次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照片时年仅17岁。





委内瑞拉西北部地区，在陷入冥想状态后，一名男子纵身跳过熊熊燃烧的火堆。这张照片收获了众多赞誉。除了女性议题，女摄影师们也能在其他主题和领域拍出绝好的照片。《纽约时报》在评价“女性视角”展出时说，你未必看得出来一幅照片是否出自女性摄影师之手，但摄影界的女性确实人数偏少，且面临独特挑战。



占卜小把戏。一名吉尔吉斯人正在向一位巫师占卜吉凶，吉尔吉斯人习惯在做决定前寻找占卜师预测未来。这张照片由摄影师卡罗琳·德雷克 (Carolyn Drake) 拍摄。



伊拉克巴格达，战乱过后，影迷们重新回到了3D电影院，体验摇晃的座椅和吹来的风。观影者中有多名女士，她们面露笑容，看得出非常愉快。这是摄影师林赛·阿达里奥 (Lynsey Addario) 捕捉到的画面，它记录了伊拉克战火之外的另一面。



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小镇，当地的维吾尔族年轻人在夜总会跳舞。这是摄影师卡罗琳·德雷克 (Carolyn Drake) 拍摄到的场景，画面柔和，色彩绚丽丰富。他和她迈着舞步，灯光打在两人的身上，散发出古典动人的美感。





难以言说的萨米女人，摄影师埃丽卡·拉森(Erika Larsen)作品。瑞典境内的萨米人是这里的原住民，以放牧驯鹿为生。这名萨米女子正站在两头驯鹿尸体前哀悼，为她的驯鹿悲伤不已。它们因争夺领地打架，却不料鹿角卡在一起，最后双双饿死。摄影师拉森在北极圈的萨米人中间断续待了约四年，此作品于2011年发表在《国家地理》。



孟买街上的妓女，她们被称为“盒子女孩”，常常沦为性奴。在这张摄影师乔迪·科布(Jodi Cobb)拍摄的照片中，两名妓女正在街旁的小屋门口招揽客人。印度一些地区，女孩们年轻时可能被家人当做“性奴”卖掉，她们最后被迫辗转在孟买、新德里等地从业，还要把自己的卖淫收入交给家里。





#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

记者/陈祥

**复**兴门临长安街的一栋老式高层，一个50平方米的一居室，康国雄在此住了30年左右，直至2015年1月30日去世，享年86岁。他父亲康心如是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银行家，他年幼时与蒋介石散步多次，日后被人戴上“蒋介石的干儿子”的帽子。

康国雄的身世和经历，一直是大陆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素材。他本人性格开朗，喜欢找不同年龄、任何职业的人闲聊，斗室的访客络绎不绝。《凤凰周刊》记者曾在2013年拜访过康国雄，那天他喊来了在北京开面包店的陈立夫侄子陈泽祯，古今中外言谈甚欢。

## 与蒋介石成忘年交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年迈的康国雄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1941年，12岁的重庆男孩康国雄在家门口撞见了蒋介石夫妇。从此，他和蒋介石维持了一段忘年友谊。

蒋介石的官邸是在重庆长江南岸的黄山，康家别墅建在就近的汪山马路边上。日军飞机轰炸过黄山，但炸弹没投准，掉在了汪山。相遇的那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康家后山坡野餐，康家仆人看到后兴奋地告诉全家，家里人纷纷从远处观望。

年幼的康国雄带着妹妹悄然通过树林摸到蒋氏夫妇近处，侍卫官吆喝住冲两个孩子吠叫的警犬，蒋介石夫妇见到孩子后很好奇，热情招呼过来。当时蒋介石夫妇席地



而坐，地上铺着一块白桌布，上有点心和饮料。蒋介石询问康国雄的名字、住哪里、在哪儿上学等日常问题。告别时，蒋介石叮嘱“下次再来找你们玩”。

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如果宋美龄陪同散步，则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康国雄回忆，每次蒋介石前来，都会用很重的浙江口音喊“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屋找康国雄。很快，他摸熟了蒋介石的散步规律，只要一看到宪兵在马路两侧布岗，就意味着蒋介石要开始散步。

一来二去，这些站岗的宪兵都认识了这孩子，不会阻挡他接近蒋介石。有一次康家花园前站岗的恰好是一个新来的宪兵，两次警告康国雄禁止接近蒋介石、禁止向

蒋介石喊话打招呼。孩子脾气发作的康国雄赌气从此躲在家里不出，直到一侍卫官来问何因，他小小地报复了那位严肃的宪兵，最终换回了康国雄熟悉的宪兵军人。

老少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闲聊中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就一一告知。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

终于，蒋介石邀请康国雄来黄山官邸进晚餐。蒋纬国先接待了他，笑呵呵告诉康国雄：“就叫我蒋二哥吧。”蒋纬国带着康国雄继续上山，来到蒋介石的楼房，蒋氏父子和一个小孩，三人享用了一桌简单的四菜一汤。多年后，康国雄只记得一盘入口即化的煮蚕豆。蒋介石是出了名的清淡口味，自然



很不对这位重庆孩子的重口味。他回到家后就说蒋家的饭菜不好吃。多年后他在台湾见到姐夫，大家还以此逗乐他。

蒋介石并不在意康国雄家的背景，散步多次后，才问起家庭情况：“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康心如正是康国雄的父亲，他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银行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

1945年抗战末期，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他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当他看每隔两三百米的站岗宪兵出现时，知道表现一番的机会到了。康国雄立马向同学炫耀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没人相信。未几，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深受空军热影响的他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几天后，一个侍卫官带着他们四人去空幼招生处报到和填表。

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他文革中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即由此而来。

银行家父亲反对儿子从军，希望他子承父业，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康心如先写一封长信骂康国雄不认真读书，居然找蒋介石疏通关系。他随后回重庆，对康国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成功说服。

1946年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见到“国民大会”代表康心如时，说自己去空幼三次查了名单，没有国雄的名字。康心如临时撒谎说，因儿子体检不合格被淘汰。蒋介石问康国雄最新情况，康心如编造说已经在大学念经济。蒋介石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1950年，康国雄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康心如很欣慰。

## 身处时代剧变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当时中国最高领袖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土豪”，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仪式是由于右任主持的。

辛亥革命后，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康心如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

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如监察院长于右任经常带着监察院的人来康家玩，康国雄经常抚摸于右任的大胡子并开玩笑；杜聿明和关麟征等陕西籍（康家祖籍陕西）高级将领也来过康家，杜聿明送一把日军指挥刀给康心如；杜月笙常来打牌，康国雄响应学校号召为抗战募捐时找杜月笙开支票，募捐成绩全校第一；张群在他家住过；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是他家的常客。从小浸泡在这般社交圈子里，康国雄见到蒋介石如同见一个邻家大叔。

国共战争期间，康国雄在重庆上中学。他热衷于参加话剧团表演，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演出过曹禺的《北京人》、据高尔基原著改编的《夜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节目。康国雄不认为自己的演技有多好，倒是发现自己的组织能力非常优异。他经常参加足球、垒球比赛，还因组织能力突出被老师招募到校合唱团任副团长，尽管唱歌常走调。

顺着英雄崇拜心结，他还建立了“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铁血”二字来自他的崇拜对象“铁血宰相”俾斯麦。同社的学生因故走人后，该社自动解散，他另成立“新芽社”，意为中国新生的幼芽，升入高一后他建立“新苗社”，之后又建“中国青年复兴社”。

这些全是孩子闹着玩的小圈子游戏，但在随后的阵阵政治运动中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当然，与蒋介石的交情、大资本家出身，给他带来的麻烦更大。

康国雄凭借自己的组织能力，以及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在中学期间多次组织学生反抗学校的条条框框。待国统区学潮高峰到来时，他也不甘落后，被人推举为“四一血案后援会”主席，组织重庆学生罢课、印发传单以支持南京的“四一”学运。当军警围紧他所在的巴蜀中学后，学生在校园内组织营火晚会，又唱歌又跳舞，其中不乏红色歌曲如《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

在军警的压力前，多数人胆战心惊，康



► 儿时的康国雄与其胞妹合影。



►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为著名银行家。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国雄凭借家庭背景无丝毫惧色。闹了几次，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一个姨太太打电话给康国雄母亲，劝诫她管住儿子，否则不得已要抓人了。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因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康心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很快的，康国雄因为出身而遭到学校打压，他被同学隔离了，并一直遭批评。

1951年，他去北京考大学，终于离开故乡，闯入新奇的天地。但是，巴蜀中学送上的材料一直没放过他：“父亲是官僚资产阶级，康国雄在四二一运动期间，有特嫌表现，有严重的政治背景问题”，甚至“组织第三党”。

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在1950年破产，因为国有化是必然趋势，不过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7年，他成为右派。1961年，他托关系来北京治病，并把户口迁到北京，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文革时，康家自然受到冲击。

## 对人生不服输

康国雄是南开大学第一批按马列主义教学计划培养出的经济学人才。因肃反导致天津的中学教师匮乏，毕业时，全班被分配在天津各中学教书，课程包括地理、历史、美术、体育。康国雄则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文革初期，康国雄就被当做“蒋介石的干儿子”在学校大礼堂批斗。这个罪名很引人注目，许多人来围观批斗会，人数超过了院长、党委书记被批斗的大会。康心如为给儿子洗脱罪名，写信给沈醉求一份证明。

沈醉回信说：“蒋贼住在重庆南岸时，偶尔外出散步，曾携带过您的孩子。当时在蒋贼身边担任警卫的特务，大多和我熟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告诉我曾收康国雄做干儿子的事。”沈醉根据自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六七年工作经验，



▶ 2012年11月18日，在陪都重庆美丰联谊会上，康国雄（右）与久违的童年好友、王缙绪第五子王泽东，喜极重逢。王泽东于黄埔二十二期毕业后，分配到台湾长官公署。1949年临上飞机前放弃去台湾，后串联黄埔同学与国军未降余部游击到云南边境，欲与缅甸孤军汇合，被围而败，发配到阿坝州龙日坝劳动改造30年。

断定没人在回忆史料里提及这件事，“可见完全是一种误传而没有什么根据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造。这是旧式大家庭里，彼此勾心斗角的常见一幕。康心如得知一切后心痛欲绝，立遗嘱与这个儿子及两个孙子断绝关系。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去世。1981年，康心如获得平反。文革期间，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

文革后，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神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19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几经周折，他想到去香港闯荡，他家还有着海外关系。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康国雄在申请书里希望自己能为两岸“三通”做贡献。

1987年10月，58岁、不会英语和粤语的康国

雄拖着两个箱子来到本港，他是占用了统战部的名额赴港定居。

康国雄最初一切不顺，连住宿都成为问题，拼搏几年，转换多份工作，才在本港站稳脚跟。不过他在港时间并不长，1991年即回北京治病。“我58岁闯香港，凭的是什，是不服输这口气。因为我是资本家出身，他们认定我除了接受‘劳动改造’外什么也不能做，我从未低头屈服过。压制越大，反弹力越强。”康国雄口述往事时指出。

1997年1月，通过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官文强的介绍，蒋纬国来信邀请康国雄赴台旅游。康国雄此行有两个目的：看望二姐和表兄；探望蒋纬国和陈立夫，尽可能与父辈的故旧建立联系。康国雄还去慈湖参观了蒋介石陵园，感慨万千。

告别工作后，康国雄借助他的口述自传《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以及在诸多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中亮相，为历史爱好者们所熟悉，旁观者皆觉得这是一个无比有趣的人。●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 中国外宣的困境与出路

专访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主持人库恩

记者/徐伟

一位年过七旬的美国学者，在中国行走二十余年，遍访农民、农民工、留守儿童、教师、医生、公务员、艺术家、企业家和高层领导，谈论中国最为紧迫的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环境污染、福利民生等话题，并在近年参与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面临的挑战》的系列专题纪录片。

该片第一季于2012年在国内播出后，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却在海外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强势登陆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德国北威州电视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在美国的189家电视台累计播出了1323次，覆盖了超过67%的收视市场，覆盖时段达到76%，这是中国大陆制作的电视节目第一次达到如此广泛的影响力，该纪录片因此摘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14年10月，制作方上海外语频道（ICS）再次推出《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季）》中英文版，分别在东方卫视、上海纪实频道、艺术人文和外语频道多个平台播出，并将在2015年初再度登陆美国公共电视网等海外主流媒体。

纪录片中的这位美国学者，是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有着银行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而真正让他蜚声海内外的，是他在十年前出版的畅销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此后，他又出版了谈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三十年》等作品，并长期在CNN、BBC、彭博社担任中国问题嘉宾。

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西方人；而在西方人眼中，他一直在为中国说话。在《中

国面临的挑战》中，库恩秉持着“帮助国际社会理解当今中国”的理念，全片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观察、研究、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第一季共五集，分别聚焦中国经济、民生、创新、政治和价值观五大领域，第二季则以同样篇幅提出五大命题，“中国能实现和谐吗？”“中国能变得更美丽吗？”“中国，文明依旧重要吗？”“中国，你富强了吗？”和“中国，你怎样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形象宣传方面投入不断加大，比如在全球123个国家建立起近500所孔子学院，斥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循环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这些举措投入成本巨大，却并未收到理想效果，甚至受到非议。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将国家形象宣传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在2014年末的外交工作会议上，他更是作出表态，“中国要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这被库恩阐述为中国政府正在提出一种新的外交观，从以前的“跟跑者”变为“领跑者”。

然而，传统“一边倒”的赞歌式宣传，片面宣扬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伟大进步”，很难入西方主流社会法眼，

**传统“一边倒”的赞歌式宣传，片面宣扬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伟大进步”，很难入西方主流社会法眼，甚至会招致反感。**

甚至会招致反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始终占据着西方舆论市场，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外宣工作必须调整思路，走出传播误区。

上海外语频道总监孙伟向《凤凰周刊》记者分析，此片在制作之初，便将目光瞄准了海外市场，之所以能在海外赢得市场认可，关键在于叙事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官方“宣传”模式，主动揭露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和遇到的挑战，通过故事和人物挖掘一个复杂多元和行进中的中国。“从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出发，这样海外受众更容易接受。”孙伟这样解释操作思路的源起。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西方电视媒体颇受认可，直视过去故意回避的诸多问题，让西方观众看到制作者的真诚态度。

孙伟强调《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操作方法，只是遵循了国际市场的基本传播规律，不回避中国发展中的困难和矛盾，也不自设禁区，敢于触碰民主法治、基层治理等“敏感”、却备受西方社会重视的话题，并以符合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向西方观众讲述中国故事，这是外宣模式的一种新尝试。

孙伟坦言，过去中国政府在外宣方面的投入与回报不对等，从政府来说，应该为国际传播创造更好的条件，“倒不一定是投入多少钱，而是对于所有在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给予更多实在的支持，最好的支持就是开放的心态，特别是负责对外传播的政府官员，他们要成为中国公关形象最好的树立者和维护者。他们要多接受负责国际传播的媒体的采访，帮助这些媒体提高权威性。”





► 库恩在《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季)的拍摄现场。

## 让世界了解中国

**记者:**为什么会接受ICS的邀请,来制作《中国面临的挑战》这部纪录片?从“挑战”的角度切入中国现实,这种操作思路从何而来?

**库恩:**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一些长期的误解,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解是完全错的,而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只是看到了某些局部。我希望能更综合地、动态地、变化地看中国,这对于理解中国很重要。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需要真实以对,而不是官方所习惯的宣传方式。中国越是能够用世界的眼光看待自己,越有助于自身持续的改革和发展。过去,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比如在世界主流媒体BBC、CNN发表评论,为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写

传记,也有制作电视纪录片。这次我们提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要批评中国,而是向世界呈现中国面临的真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与ICS合作,我在很多年前就知道他们,他们的团队很专业,观点犀利,在媒体沟通方面也很出色。他们最初是希望能够更多地呈现中国的成绩,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因为首先世界没有兴趣了解中国取得的成绩,其次我自己本意也不喜欢这种方式,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谈谈中国面临的问题,为新一代领导人呈现出他们的挑战,这将是世界乃至中国感兴趣的话题,因为这是面向未来的。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挑战和缺点,人们才更加相信你所说的内容。

**记者:**《中国面临的挑战》以“帮助国际社会理解当今中国”为主旨,针对的是所谓对中国“不理解”的现象,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某些报道存在偏差或误解,那么导

致这种偏差和误解的原因是什么?

**库恩:**外媒的误解是很微妙的,因为他们不只是针对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外媒是不喜欢中国的,那另当别论。大多数西方媒体并不是有意针对中国,他们针对的只是中国的一些具体事实,不论这个事实发生在哪个国家,比如滥用权力,尤其当权力威胁到公民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作出揭露与批评,这不是对中国的偏见。

这些问题在今日中国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指出来了。而误解的产生,则是源于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其他部分,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在人权方面、经济民生、社会自由度方面的进步,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在这些成就上,这是认知顺序的问题。

## 只要真理,不要平衡

**记者:**你经常在西方媒体上为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辩护”,还积极地向西方阐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这是否是为了取得某种平衡?

**库恩:**我并不是为中国政府辩护,也不是为美国政府说话,我是从科学与哲学的角度发言。我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不同意我的观点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在想什么。通过研究“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或者这个时代看法,这些执政理念都表达出他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现状的愿望,这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启发性,我也想西方媒体和世界都能理解。

很多西方媒体忽视了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我想在这中间做一个双面的讲解员,我喜欢分析并传播这些思想。我在努力向西方媒体做两件事,第一,我在向他们描述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并不加入我自己的观点。我经常同中国领导人对话,最近我与两位中国高层领导做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谈话,我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也就可以向世界准确



地传播他们的思想；第二，我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即我的批评或评论，我将这两点区分得很清楚。

我在传达的准确性上做了很大努力，但这并不是在平衡，我并不喜欢平衡，因为平衡意味着中间路线。我只要真理，真理并不一定是中间地带的。比如评价文革，我并不会做出所谓的“平衡”，说它哪里好、哪里不好，我不会这样，文革是全面错误的，这就是平衡与真实的区别。

**记者：**你一直强调“讲述真实的中国”，你眼中的“真实”是什么？纪录片从选材到剪辑都是有所取舍的，你如何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库恩：**没有人可以描述全部真实，我也只能描述我所看到的“真实”。我有很多的指导者，有高层领导，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人，我向他们收集大量的意见，再从这些意见中提取共同点，比如中国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冲突性以及个体性。

每个个体重视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有人关心医疗保障，有人关心环境污染，有人重视教育平等，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也乐于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我想找到可以展现中国多样化的方法，但我只可以展现众多方面中的一面，那就是我眼中的真实中国。

对我而言，了解中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写文章、写书、参加访谈节目、制作纪录片——向世人展示中国。我生活中的乐趣就是了解

新鲜事物，我想要理解中国，理解她的复杂性，理解不同的文明和历史，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而且有些人很欣赏也感激我所做出的努力，我乐于这样坚持做下去。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做出一些让别人可以看到的東西，能做出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理解。

## 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对自身的国际形象越来越重视，在外宣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比如建孔子学院、拍国家形象片，但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受到许多质疑，这是否是中国的外宣工作陷入了某种误区？

**库恩：**近年来，中国政府确实在塑造国际形象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很多都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其实很简单，举个极端的例子，朝鲜极力向世界打造“人民幸福安康”的形象，但是外界看到的都是相反的现实。如果把一个事物描绘得百分之百的完美，其实适得其反，人们完全不会相信；但如果把一个事物描绘得90%是有问题的，只有10%是好的，人们或许会相信那10%，这就是认知的悖论。

过去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就陷入了这样的误区，总喜欢将自己打扮得非常正面，“报喜不报忧”，认为谈负面问题就会陷入麻烦，是给自己抹黑。实际上，大家更愿意看到中国以诚实的态度讲述自己面临的问题。

题，敢于直面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记者：**具体而言该如何改进？

**库恩：**首先尽可能地展现中国的现实，不要矫饰，也不要忽视中国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一些西方媒体倾向于夸大中国的负面新闻，所以中国政府倾向于宣传好的方面，认为这样就起到了“中和”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不必在意评论家如何说，或者西方媒体如何说，只管讲述真实就可以了。其次是要作出改变，有些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有些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有些是可以改变的。做到以上两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会随之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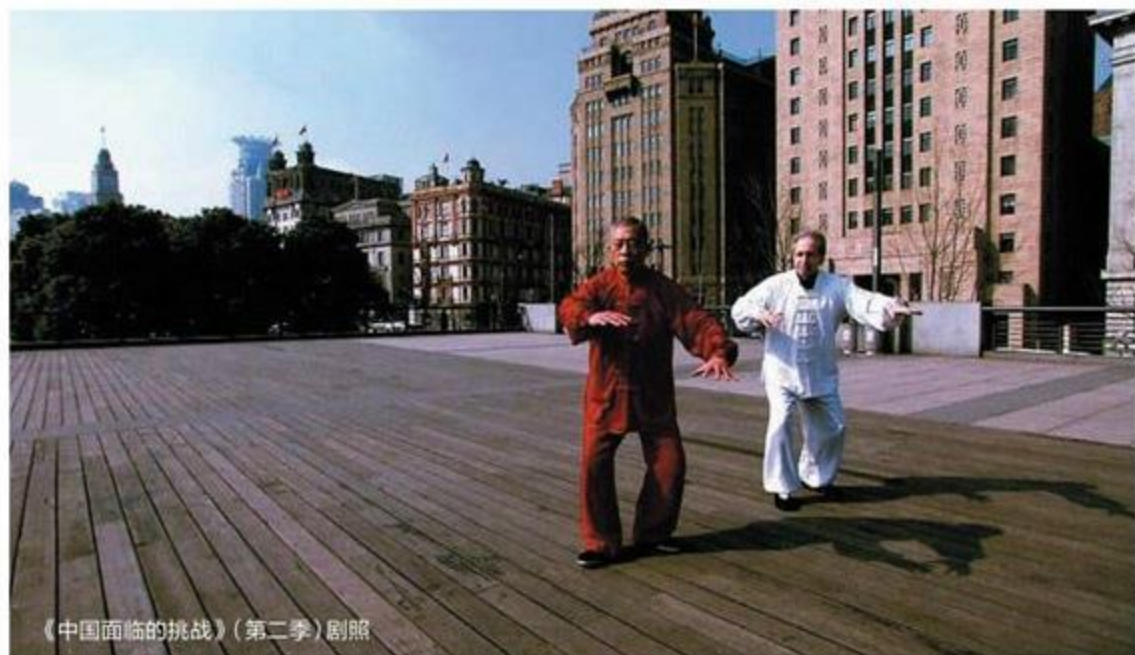
**记者：**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如何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库恩：**从宏观而言，当前中国外交正出现重大“拐点”，在国际事务上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过去的中国倾向于自己发展，通过改革解决问题，只有当面临压力的时候，不得不向外界开放的时候才会转而出外，正应了邓小平的那句经典论述——中国需要韬光养晦。

而本届政府开始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政策，2014年末，习近平在外交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要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把更多的中国元素纳入到国际规则中，努力从外国获得更多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显然，中国正从一个“跟跑者”变成“领跑者”，而且势不可挡。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传统，有时候确实不容易互相理解。中国的儒家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产生的背景、哲学、理念完全不同，但我认为它们在某些普世的价值观上并没有根本差异。具体而言，每个人都想给子女最好的未来，身体健康、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做理想的职业等等，这在各个文明圈都是一致的，这是人性的共通点。所以，最好的讲故事的方法，是从个体的遭遇和想法出发，尽可能减少假、大、空的宏大叙事，与世界进行坦诚的沟通，这才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最佳方式。

□ 编辑 晓波 □ 美编 黄静



《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季)剧照



# 为什么必须取消高考加分？

对一个学生的学业状况如何进行专业评价，不仅不能靠行政权力作判断，还应该尽可能清除行政权力在对专业评价过程中的干扰，减少加分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文/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14年末，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从2015年起将取消奥赛等6项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只保留“烈士子女”“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等5类加分项目，并要求各省市不得擅自扩大全国性加分项目使用范围。

此外，有关部门要对加分资格进行复核复测。涉及体育类特长生加分的考试，体育部门要按照二级运动员标准进行严格测试，确保加分资格真实可信。由此，中国高考将进入一个加分收缩阶段。

## 历史上的加分与照顾

中国在高考中真正有“加分照顾”含义的第一份文件是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出的《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明确提出“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得从宽录取。”

次年，基于当时工农青年和干部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进入高校学习，而非工农干部达到相应的文化水平却进不了的两难，招生规定中从宽录取的条件中增加“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5年以上者”从宽录取的折中办法。

1954年教育部在高校招生文件中，首次提出“优先录取”的概念。次年，由于生源数量不足，高教部和教育部的招生规定，“对政治、健康条件合格，考试成绩稍低于录取标准的学生，学校有缺额时，可录取为试读生。”次年，再将高招优先录取对象增加了“烈士子女”和“香港、澳门学生”两类。

**在加分政策实施过程中，失去约束的权力总会在无孔不入地侵蚀公平，一度高考加分者占各地“状元榜”一半，学校也为了有更高的录取率而进行“萝卜”加分的造假。**

此后数年，政治标准越来越成为高校招生的首要考核内容，“大跃进”兴起的1958年，是开启高校招生只看政治标准的一年，也开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照顾大单，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26.6万人，不只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保送入学，对“优秀高中毕业生也可保送入学”，大约16万人都享受到了照顾。

“文革”前夕的1965年，阶级斗争的思想愈发高涨，这在当年的招考政策有直接体现：“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

“优先录取”的幅度对各种情况分量不一，依据大量实际案例，大都在降低10-20分的范围。这一时期照顾政策的显著特征，是采取各种途径大力提高工农成分学生在高校新生中的比例，对工农成分学生优先录取的力度越来越大。1950年大学新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仅占0.3%，1958年占55.28%，1964年上升至70.1%。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照顾政策更

是凸现“坚持政治第一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在处理政治、学业、健康三者的关系上，必须重在政治表现，要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

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事实上是一次大的系统性政策照顾，连续多年反复强调的是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婚否等条件的要求可适当放宽。1970-1976年七年间，总计招收工农兵学员94.0843万人，这一做法的整体结果是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大幅度下滑。

直到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在各方努力下，才重新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连续七年的系统性照顾划上句号，但当年的招生意见仍然通过“注意招收”的方式，对特定的学生加以照顾，其中包括“医学院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师范院校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民办教师，农业院校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农业科技积极分子”等等。

在1980年的招生文件中，首次提出“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的学生以及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成为“三好”、“优干”加分的起点。





► 2014年6月7日，  
南京某高考考场外。

而真正打开延续不断的、形式多样的照顾闸门的，是1981年的全国招生工作规定：一是文史类语文、理工农医类数学，出了计入总分附加题。语文、数学成绩达不到起码要求的，降低一个分数段供学校选择；二是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者、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以及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三是部分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学生预科班，降低分数录取，补习一年考试合格后，直接升入本科。此后，对报考农林、水利、矿业、石油、地质院校的考生，采取优先录取的政策。

1987年4月21日，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其中包含照顾的条款共十二条，包括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科技发明创造、体育竞赛、少数民族考生、归侨、退役义务兵、烈士子女等。这个《条例》尚未以加分的方式出现，但它所规定的照顾项目是此后加分的主要依据，“适当降分”内涵为降20分以内，但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常有超出。

1990年3月，当时政策执行中的漏洞已经较多，国家教委发文：“在执行《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过程中，曾发现部分地区为追求升学率，频繁举办各种名目的运动会，甚至让学生轮流取得竞赛名次，严重破坏了这项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堵塞漏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必要的补充规定，并报我委高校学生司核准后施行。”1991年，对于获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的青年，其成绩在一般本科、专科线下20分者，可由高校审查录取。此后直到2000年变化不大。

2001年后，不仅规定了降分投档的对象，还新出了加分政策，列入加分的对象有：(1)省级优秀学生；(2)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3)高中阶段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上获得者；(4)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须出具参加比赛的原始成绩)。2004年后又将加分权下放到各省，引发加分制度愈发膨胀和混乱。

有学者将中国的加分政策分为优先录取(1950-1976)、降分录取(1977-2000)与加分

录取(2001年后)三个阶段或三种方式，基本反映了几十年加分照顾政策发展的特征。

## 加分使公平失去依据

从上述六十多年的政策文本中不难看出，照顾和加分的主要依据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且采取的是一种行政权力控制的方式。高考加分政策中相对客观的部分，又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及扶持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而扶持性加分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等特殊群体。

对加分政策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加分是否偏离了学生素质的真实状况？加分是否损害教育公平？当初设立高考照顾和加分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公平，但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主观的公平，缺乏客观的依据和路径。由于加分权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在行政权力难以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衍生出大量腐败，对教育公平造成损害。

与加分政策相对应，高考中出现了不能享受任何加分的“裸考”族。

2004年起，高招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各地招生委员会拥有自己的空间，高考改革确



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最终目的是把招生自主权返还给各个高校。加分权力下放,客观上为各地自主设定高考加分名目放行,于是各地依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各种加分项目,在缺乏专业监督的行政权力作用下,一些不合理或者容易被钻空子的加分项目出现了,直接冲击公平底线。

由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确定加分的只是一些原则性政策,而非可操作的规范,加分的范围和具体分值存在不严谨性,为权力入侵预留了空间。与考试操作简便,能够抵挡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相比,几乎所有的加分政策都存在模糊空间。

在加分政策实施过程中,失去约束的权力总在无孔不入地侵蚀公平,一度高考加分者占各地“状元榜”一半,学校也有了更高的录取率而进行“萝卜”加分的造假,辽宁本溪高考加分案中,“校领导会根据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和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这些办证资格”,表明光有钱还是加不了分,有一定权力者交钱才能加分。

对加分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运动项目、省级三好学生(包括优秀学生干部)、见义勇为者等对象的高考加分政策上,理由是它们成为腐败的通道,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为少数行政权力掌控者所操纵,缺少公开透明度,损害社会公平、公正。

举例来看,2014年吉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照顾加分考生17082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比96.6%,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582人,约占加分考生人数3.4%。这其中加5分的共459人,省级三好学生225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38.7%;省级优秀团干部90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5.5%;省级优秀学生干部62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0.7%,三项共占64.9%。足见公众对这类加分影响公平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

当得益于政策加分的考生家长有较大比重为政府官员、事业单位领导与富豪,当享受加分的主要是那些考分较高的学生时,当加分的依据可以任意造假时,人们对加分政策损害教育公平的质疑就更加证据确凿了。

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阻止操纵“加分”政策的黑手,能否将高考加分中正在发挥作用的特权转化为公权,能否将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做公开透明的切割。这些特权和黑手,就是缺乏规范和约束的行政权力,阻止这类黑手和特权,要依靠规范而非简单的行政命令。

近些年来,加分年年被质疑,而又年年出问题,所出的问题还显得越来越离谱,正是灰色权力在加分环节不断膨胀,把加分逼到了墙角。在灰色权力得不到规范的情况下,加分的客观性缺乏基础,加分演变为引发不公平的陷阱。在灰色权力操控下,对加分问题的处理只是轻描淡写,从而进一步促进灰色权力的滋长。在灰色权力操控下,高考加分项目越多就越不公平,反倒是越少就越接近公平。

## 减少加分为专业评价让路

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分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

从原理上看,对一个学生的学业状况如何进行专业评价,不仅不能靠行政权力作判断,还应该尽可能清除行政权力在对考生进行专业评价过程中的干扰,减少加分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高考招生制度归根结底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各种方式都需要积极去探索,不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都应坚决消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考试招生制度和各项政策定位为专业工作,不能主观臆想,不能少数人拍脑袋,不当的考评和加分都只会制造“伪善”。

从高校招生角度看,过去长时间的高考事实上属于招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入门考试。但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建立后,高考的原有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成为它去政治化和

去道德化的原因。奖励性加分与大学教育大众化的普适化诉求恰好相反,这成为加分需要去道德化的深层原因。

2015年减少加分项目、限制加分分数,事实上就是在行政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减小行政权力在加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也使得过去教育、科协、体育、外事、民委等部门和单位享有的加分权力大为缩减。

减少加分仅是解决高考公平这一系统性问题的一小部分,大思路是对现有高校招生制度进行综合改革,废除总分录取模式,让高考招生进入法制化和专业化的轨道,用专业权力规范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减少加分又是这一大思路上关键的一步。

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运作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任何一项加分政策都会沦为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从而与初衷背道而驰,损害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已经减少的加分,依然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让加分与行政权力脱钩,完全交给第三方专业组织评定,落实这点需要政府主导的简政放权。

二是建立规范的加分公示制度,实现评价选拔过程的透明化、公开化。在阳光下制定可操作性的规则,运行可监督的程序,接受加分的考生有责任公布考生本人及父母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等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性,应作为接受加分的前提条件,做不到公开的先就别加分。

三是对身份型加分,要明确具体界定身份的条件,例如对少数民族的加分就应明确住所、母语、生活环境等条件;对残疾考生和英烈子女也应明确具体条件,以更好体现公平。

从长远来看,应破除行政机构作为招生主体的模式,由高校作为主体通过一定程序遴选的专业团队,去全面评价申请进入该校的学生,才是高校招生的常态。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 邓力群去世

邓力群与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分歧，在其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他从自己的立场、角度，记录了1987年初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批评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

记者/陈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在邓力群身后给出的定论。邓力群在2015年2月10日去世，享年100岁。

湖南人邓力群出生于1915年，1931年从湖南来到北平，进入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在校期间，大量阅读以苏俄文学为主的外国译作，以及鲁迅、茅盾、丁玲、郭沫若等中国当时最知名的左翼作家作品，这些进步倾向鲜明的书籍，对邓力群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他认定“这是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准备”。

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邓力群成为骨干，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等一串职务，并于翌年先后入团、入党。到达延安后，邓力群担负起理论工作职责，1937年，年仅22岁的邓力群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次年改任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

1949年6月，已是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跟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停留期间，遵紧急通知以特派员身份去新疆，洽谈新疆问题之最终解决。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

据悉，邓力群虽为刘少奇秘书，但由于其思想左倾，对刘少奇的思想作风并不完全认同。然而，当刘在文革中受到无端诬陷和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之反目，而作为

第三秘书的邓力群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处罚，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

邓力群真正登上中国大陆政治舞台，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牢牢控制理论和宣传工作。邓力群与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分歧，在其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他从自己的立场、角度，记录了1987年初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批评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年届72岁的邓力群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但由于其思想左倾、历史上犯过生活作风错误等原因，名声较差，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对此的态度是：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的马立诚在人民网著文回顾，“自1982年到2001年，邓力群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其左倾思想的表现，最著名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一场争论。1989年刚过，一度被边缘化的左派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来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在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为首的党媒之间兴起。

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将私营经济与自由化捆绑，矛头直指市场化改革。如《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关于计划经济与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在改革面对诸多老干部质疑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随后，《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多篇评论，与《人民日报》形成对峙，提出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1991年6月15日，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再发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平演变》，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将阶级斗争置于经济建设之前，提出“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等于是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推翻。

在邓力群的“理论支持”下，左派发动新一轮进攻，人心涣散不知所措。为了明晰未来方向，为市场化改革注入信心，1992年邓小平不顾88岁高龄，南下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持续已久的“姓社姓资”之争画上休止符，中国的改革开放坚定了向前走步伐。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 萨拉热窝：电影里的旧城

19世纪中叶，萨拉热窝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位在奥匈帝国占领期仍保持不变，因此也成为波斯尼亚人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

文 / 蔡天新（知名旅行作家、诗人）

2002年春天，我正在法国东北部的南锡大学访问。忽然一日，我接到苏黎世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与我的德文翻译托比亚斯夫妇一道，来到风景如画的高山之国瑞士。

那以后，我们挥手告别，他们返回汽车城斯图加特，我则乘火车向东，穿过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逗留了一晚。尔后，掉头南下，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依

次游历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一天，我在萨格勒布爬上一列国际列车，前往硝烟未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这个欧洲新国家的面积虽然只有浙江省的一半，人口更不足其1/10，但从北端驶入，穿过塞族人的控制区，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依然没有到达中部的首都萨拉热窝。

两侧尽是低矮的山谷和溪流，间或可见清真寺的尖塔露出村头，黄色的砖墙被绿色的庄稼和杂乱的树木环绕着。车上旅客稀少，仅有的几位也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交流。黄昏时分，火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 内战硝烟暂时停歇

一个严峻的考验随即降临，我出门旅





行向来不通过网络或电话预订旅店，即便去一个从未抵达且没有熟人的国度。

很快，乘客们便没了踪影，车站广场上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都是来拉旅客投宿的。当我发现车站上的游客问讯处已经关门以后，只好把目光转向他们。那男的落落大方，气质上佳，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一开始我就被他吸引。而那女

的只会说点德语，其外貌酷似前网球明星格拉芙，只是脸上皱纹要多许多，且说话行事全然没有一点风度。可是，正当我准备跟那位男士去他的旅店时，“格拉芙”突然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格拉芙”已经打开她的笔记本，里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文字。原来，这是一本旅客登记簿，我翻到最新的一页，居然有头一天登记的一位日本游客。我旋即转身看着那位男士，他耸了耸肩，眨了眨眼睛，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在那一瞬间，我作出了选择，跟着“格拉芙”走了。出门在外，我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安全。我们一起搭乘沿着河岸行走的唯一的有轨电车，去城西她的家。当我听到车头铃铛的声音，两旁的路灯亮了，感觉世界突然温暖了许多。可不，虽然萨拉热窝海拔有点高，毕竟春天已经到了尽头。

萨拉热窝位于狭窄的特雷贝维奇山谷，中间有一条叫米利亚茨的河流穿过。附近留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世纪时，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先后在此定居，随着15世纪后期土耳其人的侵入，萨拉热窝发展成为贸易商人和穆斯林文化的堡垒。不过，来自亚德里亚海对岸的商人们也在此建立了拉丁区。因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仍只有一半，不过由于穆斯林文化的特点鲜明，他们的建筑、装饰特别引人注目。

19世纪中叶，萨拉热窝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位在奥匈帝国占领期仍保持不变，因此也成为波斯尼亚人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及其妻子，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波斯尼亚议会宣布加入南斯拉夫联盟，直到1992年，才再次独立出来。没想到的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内战。我抵达的时候，正值内战硝烟暂时停歇。

## 记忆中的南斯拉夫电影

尽管如此，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部少年时代反复观看的南斯拉夫电影《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片子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德国驻巴尔干半岛部队准备撤退，被游击队拦截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已被苏联红军攻克，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撤退的德军，绕经马其顿和波斯尼亚返回德国，途中必须要得到萨拉热窝油库的给养，瓦尔特领导的游击队却没让这个阴谋得逞。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的镜头并没有对准市容。

影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一群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游击队员被德军拦截，一名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对德军说，我是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告诉德军，他混在真正的游击队中，准备把这些人诱骗至德军所在地，任何人都不准拦截他们。德军军官表示，“你把我们的人名单列出来，我把游击队员全部逮捕”。当“游击队员”把党卫军名单交给德军时，他这样说道：“拿去吧，除了这五个人之外，全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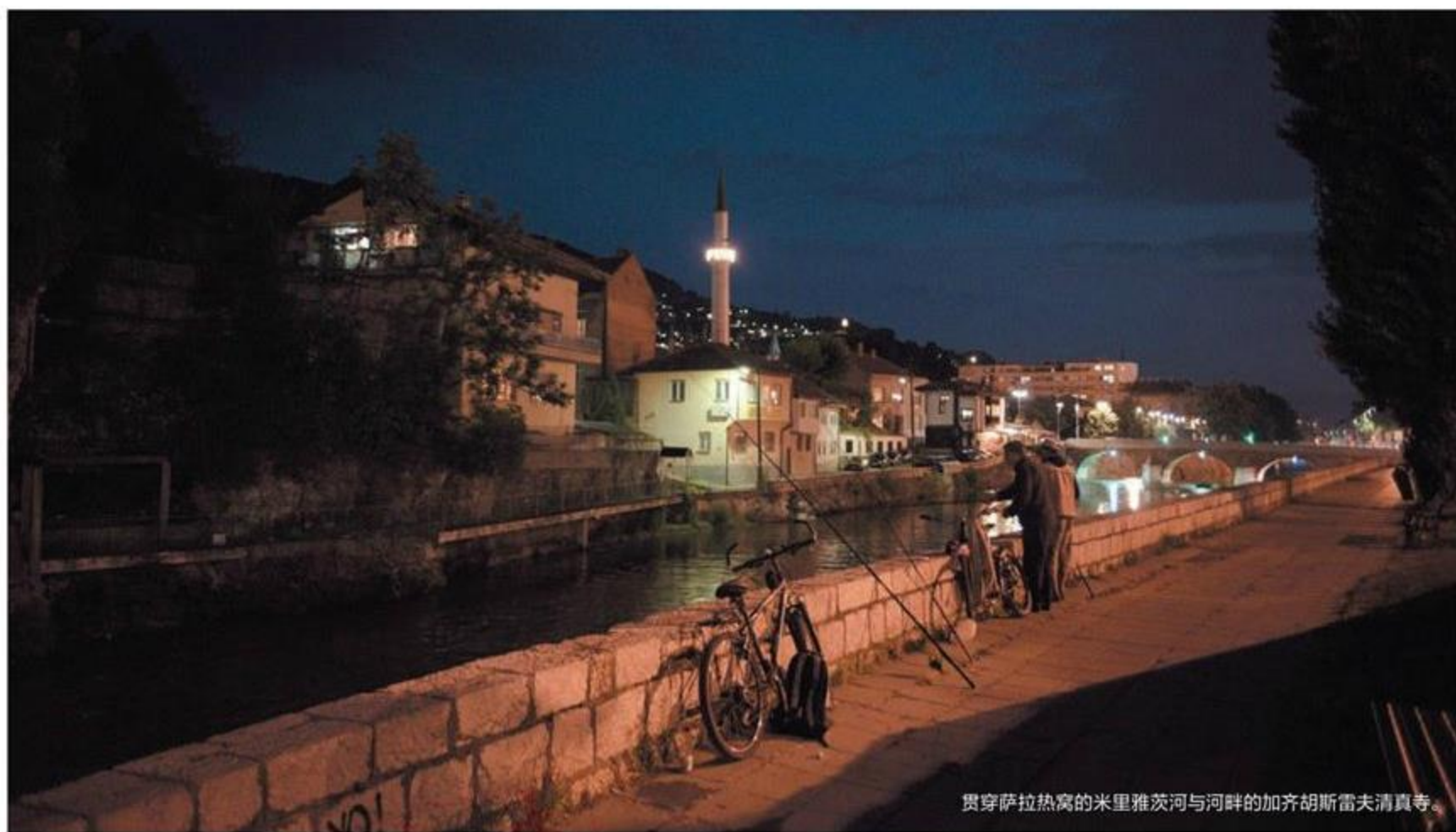
“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原来，所谓的“德军”是游击队员假扮的，游击队知道内部出了叛徒，故意将计就计，泄露假情报给敌人，而敌人，果然中计！当假扮“德军”的游击队员说出那句“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时，中国观众心里真是太舒坦了！临了，他还说道：“你们到解放区去吧，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了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遗憾的是，由于正处在战后，百废待兴，且战争的内因并未消除，故而仍保留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外国游客，自然也难以找到那部我年少时喜欢看的老电影的纪念物。

## 难以弥合的宗教矛盾

新落成的假日酒店周围保安林立，这座建筑正对着那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市区难得的一座高楼千疮百孔，可口可乐不失时机地在旁边竖起一座红色的巨型广告牌。说到这场内战，一方是穆斯林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另一方是信仰东正教





贯穿萨拉热窝的米里雅茨河与河畔的加齐胡斯雷夫清真寺。

的塞尔维亚人。前者要求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后者则反对独立，因此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与我逗留过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谷中的是非之地——麦德林相比，萨拉热窝要小得多。事实上，麦德林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波黑共和国的总和。可是，由于地处欧洲，更由于历史原因，萨拉热窝知名度极高，一点也不逊色于前南首都贝尔格莱德（后者拥有少量世界级的体育明星，堪与前者出产的美女媲美）。以至于1984年，萨拉热窝还成功地举办了第14届冬奥会，那是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冬奥会。直到30年以后，俄罗斯的索契才得以举办2014年冬奥会。

“格拉芙”住在一套二居室里，家里只有她和穆斯林的母亲两人，客厅里的两张沙发就成为她的出租床。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知道她的职业。我到达那天，那位日本青年还在，可是由于他不讲英语，我们也无法交流，他属于成千上万孤独的日本旅行者之一。第二天一早，这位日本青年已背起行囊出发了，目的地我已经无法记起，不是波德戈里察（如今

的黑山共和国首都），就是普里什蒂纳（不久前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的首府）。

日本人走后，我也没再睡着，而是起身在窗台上观察附近的民居。由于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塞族人和穆斯林-克族人分居在两侧山坡上。“格拉芙”家附近则没有那么明确，她本人是无神论者，而她的母亲是穆斯林，因此这附近也有清真寺，也能听到晨祷的声音。据说在萨拉热窝，汽车站也分成两个，以免引发冲突。后来，我来到一座建于16世纪的大清真寺，发现地上跪拜着无数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他们用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这个异乡人，用目光把我驱赶到大厅之外。

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在萨格勒布的一家酒吧，两个妙龄克族女郎与老板说说笑笑，酒吧里还有一个戴小帽的穆斯林老头。在老板的唆使下，女郎亲热地搂着老头，那老头一副木然的表情。由此可见，克族人和穆斯林虽然是盟友，但他们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我又想起当年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而他

本人又长期在塞族人的土地上闹革命，因此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这也为他死后内战的爆发提供了机会。

萨拉热窝之旅不仅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旧梦，也了解了欧洲的另一面。在堪称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巴尔干半岛，如今不仅经济落后，且动荡和内乱不止，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小国家。在土耳其语里，“巴尔干”的本意是“山脉”，同时它又三面环海，一面靠着两条大河——多瑙河和萨瓦河。可以说，这是一片被蓝色包围的黄土地，等待着再次崛起的时机到来。

2014年岁末，在我初次访问十二年之后，萨拉热窝的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波黑语版诗集《回想之翼》，由定居在波斯尼亚、数度到访中国的克罗地亚作家扎寇从英文转译，封面上印着黑白的西湖船照。在此以前，一部分诗作连同两篇随笔已经刊发在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上。至此，我与萨拉热窝终于有了某种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轻易消失。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 余秀华是中国的什么人？

人们需要从诗歌中获得感动，而余秀华的诗歌提供了这种可能。不明白这两点，谈论余秀华的诗歌是徒劳的。

文/曾园（诗人、资深媒体人）

## 作为普世价值的诗

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刚出版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真正值得奇怪的，是中国读者对自由体诗歌的厌腻情绪在1990年代之后，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就结束了。

普通读者对诗歌的厌腻也许是对的。诗歌在传播中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再到富裕阶层的种种变形，这种种变形大多因诗人的生存引发，未必考虑过大多数读者的感受。

只有文学成为产业，普通读者的闲暇与审美饥渴到达了某个点，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出现。到了90年代，人们放弃了闲暇，也受够了发现诗歌的困难（再也读不到北岛、舒婷、海子了），人们便放弃了阅读诗歌。

诗歌界有没有振作呢？没有。从那时开始诗歌生产的诸多环节，从写作—编辑—出版—评论—大学文学课程—再生产这些链条就开始松动、锈蚀、朽坏。既然阅读诗歌是活受罪，人们当然不太相信会有很多人真正喜欢诗。

“诗刊社”微信号2014年11月10日发出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阅读数很快到了5万。微信在这个时代是注意力中心，接下来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搅动了媒体就不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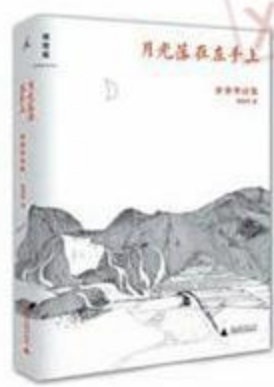
余秀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朗诵，接受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采访。有人断定余秀华的热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这个预言失败了。起初，关于余秀华的谈论中，绝大多数

都是错的。诗歌，再一次成为了不为人知的新鲜事物。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诗歌虽然被认定多数人不需要，但中国人仍然在与诗歌及其衍生品打交道——比如我们会被一首歌打动。2014年，很多中国观众奇怪地发现自己被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很不好懂的诗歌《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打动。我们总算明白过来，诗歌其实是有普世价值的。一个人被诗歌打动，是正常的。

人们最开始被余秀华的诗歌打动，当然是因为《诗刊》编发的那一组诗歌中出现的“脑瘫”、“暴力”、“贫穷”等词汇与诗人良好的修辞之间的张力。是的，一开始大多数人同情她。但接下来，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震动了微信上50万读者。爱挑剔的人这次说“睡”这个字有问题，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诗人写诗，从来不是为了传播道德。

无论我们多么喜欢在理解事情之前下



○《月亮落在左手上》  
○余秀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判断，我们都应该先搁置余秀华诗歌质量的好坏来承认两点：一、人们需要从诗歌中获得感动；二、余秀华的诗歌提供了这种可能。不明白这两点，谈论余秀华的诗歌是徒劳的。

现在《月光落在左手上》静静躺在每个读者的手上，等待着我们阅读。这批诗歌与我们读几首诗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符合。这次，它们谈得更多，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残疾、狗、暴力、血、乡村……在这些诗里，她沉思自己身体里面的奇幻世界，她有时听到身体里的火车，有时发现身体变成了酒瓶，最珍贵的青春已像酒一样被挥洒一空，而墓园近在咫尺……

## 她的分身与魔术

余秀华的诗歌能够打动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们往往急于想知道余秀华的诗歌到底好不好。

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首先，要将余秀华放进当代诗歌的框架里去，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当代诗歌框架。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我们至少得有张“杰出诗人”的名单，但很遗憾，这个名单经过当代诗人多年的争吵，仍然没有产生出来。

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说过，读诗的艺术的初阶，是掌握具体诗篇中从简单到极复杂的用典。这个过程极为复杂，需要评论者的勇气和细心。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有一句“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这一句来自迪兰·托马斯的名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



朵的力》。这首诗北岛非常喜欢，专门写过评论文字，由此我们还可以想起北岛在《峭壁上的窗户》一诗中写下的诗句：“黄蜂用危险的姿势催开花朵。”

余秀华对我说过她不喜欢北岛，也不喜欢外国诗人，但这些都不妨碍她与北岛、迪兰·托马斯在面对一朵怒放的花朵时共享一种玄思：谁，用了什么样的创造力，凭空捏造并催开一朵花？

在这本诗集里，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她一直认定身体里有某物，这种手法一直在创造着不同的新意义。

在《月光》里的最后一句：“它们都黑了/如一副棺材横在她的身体里”。另外一首诗的题目就是《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为什么有个“也”字？因为另外一个诗人已经写过一首《身体里有一列火车》。《在湖边散步的女人》里，她说“身体里没有酒杯”。

身体里有各种物体，明显是超现实主义的写法，但在她这里呈现为质朴而有效的情绪，读者不需要任何诗歌阅读经验，就能读懂她的修辞。

她的身体还能再变。在《梦见雪》这首诗里，她梦见“八千里雪”。“从我的省到你的省，从我的窗口/到你客居的小旅馆”她凝视那人：“你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徒步向南”，然后这时，她的手段是没人能够想到的：“此刻我有多个分身，一个在梦里看你飘动/一个在梦里的梦里随你飘动/还有一个，耐心地把这飘动按住”。

拥有多种能力的余秀华在描写自己身体的时候，用的几乎全是日常用语。海德格尔说过，“诗从来不是日常语言的较高的样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被用罄了的诗。”那怎么办？布鲁姆发现，英语诗歌修辞的秘密之一可以说是在字源上做文章，去更新沃尔特·佩特所说的词语的“更锋利的棱角”。

但我们所读到的汉语自由体白话诗，没有办法从字源上做文章，而且也无法常常去“用典”——白话诗的历史太短，经典诗歌

并不多。所以，想用白话写诗去感动人，简直就是在玩一种极可能失败的魔术。

余秀华的“魔术”的秘密是令人沮丧的：她有残疾，她移动困难。她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因此发现的是微观世界：“露水在清风里发呆/茅草屋很低，炊烟摇摇晃晃的/那个小男孩低头，逆光而坐，泪水未干/手里的一朵花瞪大眼睛/看着他”。

## 诗歌的血污

横店村在余秀华看来只是轮回之所：“认祖归宗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这个不生长月亮的村庄，尚需要一场大雨/和浮出河流的冤魂”。

2014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自边缘归来》，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农村年轻妇女的自杀率高得惊人。

农妇余秀华似乎有种一辈子待在横店村的恐惧感，在这里她不幸福。

波兰（那曾经也是个自杀率很高的国度）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古希腊神话里有个被人遗忘的阿特拉斯，他被罚一动不动肩负苍天。他的痛苦是沉重的，但他的痛苦不为人知——这仅仅因为他是静止的。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说，尽管人物可以没有个性，但没有行动就没有悲剧。

同样，余秀华的痛苦就是一动不动地困在“这鄂中深处的村庄里”。她的反抗也只是虚拟的：“我喜欢被诗句围困，再呕心沥血找一条出路”。

从诗歌的品质来看，布鲁姆归纳出两个表面上看似相近的特点：“不可避免”和“可以预料”。不用说，余秀华的诗歌我们是无法预料的，但又是必然的：在我们这个GDP增速令人目眩的野心时代，她是悲观的。

因此，在《经过墓园6》这首痛苦的诗里，我们惊讶地发现痛苦并没有被我们穷尽：“如同星子在黄昏，一闪。在墓园里走动，被点燃的我/秘密在身体里不断扩大”。活人被磷火点燃的可怖意象，以及后面强有

力的沉思与顿悟“他们与我隔土相望。站在时间前列的人/先替我沉眠，替我把半截人世含进土里”让读者在颤栗中冰冷无言。

这一切都源于她的计算方式。

她至少有两首诗写宿命感，《我知道结果是这样的》中有一句，“如果我在一条河里去向不明/我希望你保持沉默，在预定的时间里/掏出黎明”。

在《一只水蜘蛛游过池塘》这首诗里，她发现这种特别的小动物在水面快速爬过时“如同扒在一块玻璃上/嵌进了天空，云朵，树影的玻璃”，这个比喻的表现力很强。最后，她发现这种小动物渺小的躯体里面隐藏的宿命感：“已经来回多遍/——连什么时候无风都是计算好了的”。

肩扛苍天的阿特拉斯无法移动，被嵌入鄂中深处小平原的余秀华也是无法动弹的。她计算自己的命运，似乎计算结果越精确就越成功——结果其实只能是越悲哀吧。

我们可以说余秀华是中国的阿特拉斯吗，在沈睿说她是中国的“狄金森”之后？我们似乎在重复余秀华的事务，她确定自己命运悲凉有多少种形式，我们在确定她是谁，如果中国没有相似的人，全世界范围内有吗？如果找到了，我们再读她的诗，就更好理解一些。

在余秀华出名之前，其实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她的诗歌。去年《延安技术学院学报》发表了刘云峰的论文，精确地预言她是在“民间”有着广泛影响并逐步走向全国的诗人。论文重点讨论她的诗歌与《诗经》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余秀华的确是爱从《诗经》来引发诗思的。

从寻找余秀华诗歌的编辑刘年，到默默探讨余秀华用典习惯的刘云峰，诗歌生产链条其实一直是有人维护的。现在看来，最开始仓促浮躁的评论与言说也是好的。小孩子当诞生的时候，身上的污血其实很正常。这么多读者开始阅读诗歌，仿佛诗歌的再一次诞生。一切都是好的！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門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新都酒店)



(深圳马哥罗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四川峨山饭店)



(云南天恒大酒店)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丽江官房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广东富盈酒店)



(杭州华辰旅业集团)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深圳维景酒店)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上海市虹桥宾馆)



# SUBSCRIPTION

## 征订 2015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微信号: sjycdl

一本具有全球视野，专注研究世界遗产与遗产地人文地理关系的专业杂志  
一本致力于发掘、推广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大刊  
一本以震撼摄影、时尚元素、专业报道呈现世界文明与生态多样性的读物

### 联系方式 广告总代理

深圳市遗产地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06室 | 电话：0755-22913940 | 传真：0755-25935510

### 广告代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电话：0755-25580179  
北京凤凰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电话：010-85112779

### 订阅方式

电话订阅：服务热线：0755-22913940 传真：0755-25935510  
邮局订阅：全国邮局网点统一征订热线：11185 | 邮发代号：28-216

### 汇款方式

银行汇款：户名：深圳市遗产地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账号：11014673645009  
邮局汇款：收款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06室 收款人：深圳市遗产地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 世界遗产地理

为遗产预约未来

RESERVE FUTURE FOR HERITAGE